

献给  
我父亲的母亲  
与  
我女儿的女儿

——玛·米德

## 现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盛平

副主编：肖金泉

编 委：邓正来 王 伟 杨玉生 王志刚 于 沛  
于 硕 马在新 王 波 白若冰 孙立平  
刘再平 刘尔铎 吕 朴 朱青生 吴儆深  
张 猛 金成基 陆瑞君 杨 全 范 进  
周 星 周振想 桑思奋 贾 洪 顾 昕  
曾 胡 黄正篱 程方平 焦宏昌 黎 鸣  
缪晓非

# 目 录

作者简介.....	1
作者序(修订版).....	3
<b>上篇 六十年代概览</b> .....	9
第一章 六十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11
第二章 后象征文化与熟悉的祖先.....	20
第三章 互象征文化和熟悉的同代人.....	43
第四章 前象征文化与未知的儿童.....	67
<b>下篇 七十年代概览</b> .....	93
第五章 代沟的无害化.....	95
第六章 代沟的无法预期的反响.....	108
第七章 新的义务形式.....	120
第八章 技术带来的希望.....	132
第九章 确保多样性.....	144
译后记.....	153

##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米德于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就学于伯纳德学院(Bernard College)和哥伦比亚大学。她在二十三岁时，完成了人类学的学业，并和与世隔绝的美洲萨摩亚人一起生活了九个月，进行研究工作。她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萨摩亚人的时代》一书，该书第一版于1928年问世。1926年，她就业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长期从事对大西洋各地区文化的研究。1925—1926年间，她对萨摩亚人的青少年进行了研究；1928—1929年间，她研究了马努斯人(Manus)的童年，接着，又对几内亚三个部落的男女差别和婴儿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她的发现载入了《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格》(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和《男性与女性》(Male and Female)两本书中。1936—1939年期间，她在巴厘岛从事了类似的研究。

她的女儿于1939年出生，此后的十年中，米德应用人类学对战时的一些问题和当代文化进行了研究。1953年，她又去了一次马努斯群岛，并记录了战后那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写成了《古老社会的新生活：马努斯的文化转变，1928—1953年》(New Lives for Ol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Manus, 1928—1953)一书。1965年和1966年，她又到马努斯岛作过几次短期旅行，并于1967年参加了“国家教育电视节目”的摄制工作，该片题目为《玛格丽特·米德新几内亚之行》。

由于米德在人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她赢得了许多荣誉。1949年，她被美国新闻协会提名为科学界杰出妇女；1965年，她被全美女编辑协会推选为二十世纪杰出妇女之一；1977年，被授予教育界的“奥米加奖”。她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1960年），世界精神健康联盟主席（1956—1957年），世界城市与区域计划学会主席（1969—1971年），综合系统研究会主席（1972—1973年）及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主席（1975年）。从1945年起，她就是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学院的理事。

1969年7月，玛格丽特·米德成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荣誉馆长。她是辛辛那提医学院精神病系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她还是堪萨斯州托皮卡的曼宁哥基金会的客座教授。米德博士除了自己著书立说外，还与年轻的同事们合著过许多书，她每月还要为《红皮书杂志》(Redbook Magazine)写专栏。

## 作者序(修订版)

在过去五十年中，我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时，对原始文化进入现代世界进行了观察，了解人类文化是如何传播与改变的，本书就是以此为依据而写成的。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我到太平洋地区旅行过三次，重访了马努斯人（我第一次对他们的研究是在1928年），并且重访了其他四个处于不同过渡阶段的部落。其间，我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与来自许多国家的人们一起讨论了诸如食物与人口，过渡与变化等世界性的问题。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曾教过各类的学生，给全国各地的学生作学术报告，举行讨论会，并仔细思考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的论述就是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家，我很关心从文化角度来看待代沟，代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正是出于这种关注，我写下了本书原有的那些文字，并且又增补了新的章节。

构成本书的那些思想，随着世界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我们对自身的思考方式与新知识和新风俗一样迅速地演变着。我于本书的1970年版又细细重读，想搞清哪些论述仍然能准确地表达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东西，哪些论述已经过时；这使我憬然而悟，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而我自己从1968年以来的认识的变化也是如此之大。那时我头一次为1969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办《人与自然》的系列讲座作准备，讲座的基础便是本书的第一

版。我一向重视我的同事们的三言两语、有分寸的赞扬，而不是轻而易举即可得到的荣誉，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举办这三次学术报告。1965年，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 (Jacob Bronowski) 作了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我匆匆忙忙从华盛顿赶回，穿着晚礼服溜进了旧礼堂中的那间满是灰尘、很少使用的绿色房间，聆听他那使听众如醉如痴的报告；由于他的报告字字句句徐缓清晰，在报告结束时，听众觉得从头至尾都听懂了。

但是，我却希望听众明确地认识到我所讲的是新鲜的东西，正如布朗诺夫斯基希望他的话使人人都能明白那样。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也就是从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发生暴乱到1968年5月巴黎的暴乱以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许多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人们对问题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美国面临着越战问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而闹得不可开交；资本主义的没落；共产主义的兴起；毒品的影响；二次大战的后果，它在德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录式的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人们又周期性地提到了“代沟”，它甚至出现在电视广告上了：“嘿，爸，你取块人造黄油吧？”早餐桌旁放荡不羁、披着长发的儿子道。“好，就这么取，”满肚子不高兴的父親一边回答，一边将刀子往黄油盘里一插！

每当我思考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各种各样通常是彼此对立的答案时，我就会想起颇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 (Eugene McCarthy) 于1968年2月在《纽约时报》上的那幅政治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是和一群漂亮而又充满渴望的儿童在一起的男主人，说明词写着：“你的孩子已回到你身边”。它向父母们展示了这样的希望：皮德·皮珀再也不会把孩子从他们身边夺走

了<sup>①</sup>。我开始意识到，世上正在发生某种非常新奇的事情。它不再是前已有之的那种老派的父母与现代的子女之间的一条代沟，而是应当用大写字母来拼写的一种独特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以如此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的事件。还有许多小的断沟，如在农村的父母与在城市的子女之间；一个新国家中的先进分子与土生土长的孩子之间，他们听到的新调子是他们的父母在童年时闻所未闻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惬意而又志得意满的天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与那些在欧洲的明灯纷纷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会点燃”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那些生长于对宗教教条笃信不疑的社会中的一代，与他们那些纷纷信奉各种富于挑战性学说的子女之间。所有这些人所熟知的事情都可以用大写字母的“代沟”一词来称呼。人们莫名其妙地感到事情大不如往昔了；更多的孩子疏远了他们的父母。原以为一群前途可疑的子孙中有一匹害群之马，但突然间这整整一群——所有高等学校毕业的一层人——似乎都有变成害群之马的危险了。

有些事情很奇怪，人们或是隐约地觉得事情不一样了，或是顽固地打定主意，执意不去尽力理解那些他们不予理睬的正常而又合理的争论。过去，严厉的禁酒主义者威胁要取消他们子女的继承权，如果他们抽烟或喝酒的话。清教徒集团曾打算通过使每一个人都力戒寻欢作乐来造就宗教信仰的民主化，他们通过立法反对销售烟酒，反对赌博，甚至反对在星期天吻自己的妻子；而孩子们的命运与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新现象：那些并非严厉的禁酒主义者的父母们，那些

---

① 皮德·皮珀是德国传说中的巨人，他曾把普鲁士的哈默尔恩城从鼠灾中拯救出来，但当这个城镇拒绝报答他时，他便把城里的儿童掠走了。——译注



本人喝酒、抽烟，在所不禁的父母们，不但禁止自己的子女过放纵的生活，尤其是吸大麻，而且威胁，倘若他们抽大麻的话，就杀死他们。那些心烦意乱的父母们说，这样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绝对不准他们吸大麻叶。气势汹汹的父母们站在那里，一手拿着马提尼酒，一手拿着香烟，在酒精、尼古丁和大麻之间进行对比：“我看不出马提尼酒有什么坏处。”这番情景真是又新鲜，又荒谬至极。

在孩子那方面，同样也有一些表面上令人费解的变化迹象：既成权力机构的说教和声明不仅遇到了革命口号或宗教信仰的改变（这些是年轻人反叛的老办法），而且还遇到了污言秽语的痛骂和放大的电声音乐；污言秽语是对成年人单调的评论的厌恶，电声音乐则保护年轻人免受成年人的打扰。

一场新的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开始了：有新美国人（“白色种族”[white ethnic]这个词还没发明出来）；有“黑人”（“黑色是美丽的”成了全国性的口号）；有厌恶过早结婚和做家长所带来的责任的中年丈夫；有受过教育但却不受重视的妇女；有在这个充斥着一次性用品的社会的垃圾堆上，无人照料、听凭其死去、腐烂的老年人。

正当每一个人——不管是年轻的，中年的还是老年的；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出生在欧洲的、非洲的还是亚洲的；不管是语调平淡的老派新英格兰人还是说话慢吞吞的老派东南部人——都在关心认同，义务成了年轻人的一个中心问题。

我开始明白，认同与义务的无常是同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即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法国人把“代沟”中的“沟”字译为fosse，即一条沟壑，这个词

要好得多。“Gap”（即沟——译注）很含糊，缺乏明确性，它可以作所有语言把戏的宾语；因此，人们可以问：“代沟在变窄吗？代沟在弥合吗？”但是一条深深的、人工的沟壑是人类亲手所挖，它发明了一种技术把四十年代中期以前成长起来的人与此后成长起来的人分开了；这样的沟是不会弥合，不会变窄的。可以想象有一段深如美国大峡谷的深沟，它与大西洋平行，并缓慢地向大西洋运动，人们就站在两边。在这条大代沟的我的这一侧，人数在逐年减少——姑妄言之吧，当它到达大西洋时，四十年代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最后一个成员就已经放去，此时，也只有在此时，这条代沟才能成为历史。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当新一代人中的第一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时，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极为孤立的。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认识到，不会再有象我们这样的人了。我们这些人是在一个多少处于探索中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没有原子弹，因而也没有全部毁灭的危险，没有电视和人造卫星在数秒之内把信息传遍全球，没有登上月球的可能性，没有计算机能把一生的计算量压缩到几秒之中。在代沟的我们这一侧，我们都是第二次大萧条之前出生和长大成人的，我们没有摧毁整个人类的能力，我们对现在加于我们的可怕的责任一无所知。古老的父母之道使此前数百代的男人和女人生儿育女，辛勤劳作，以便后代亦能象他们一样活下去。这种父母之道的魅力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这一代莫名其妙地走入穷途末路，将不会有继承人。我们曾以为宇宙航行是决不可能的，新一代不会象我们这样惶惑不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天空中的月亮与阿波罗号航行发回的无线电信号联系在一起。

站在代沟另一侧的年轻人面对着一个没有楷模和先例可援的

世界。自从我们成人以来就依靠着我们的年轻人现在谁都不会或不可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人了。父母、老师、律师、医生、熟练工人、发明家、传教士或预言家都不能成为那些有着如此不同的童年的人们的楷模。年轻人与老年人同样孤独，六十年代在人类历史上是独特的，因为我们第一次明白，在我们的国家、社会 and 阶层中，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就是整个世界的现实。我们不能再幻想，在这个星球上的某个地方，在太阳系的某个地方，还有其他生物能躲过我们所经历的兴衰变迁。人人都在内，谁都躲不过；无线电波包围了全世界。在我们的太阳系内没有答案。

当新一代跨进了大学校门时，全世界的学生暴乱使他们与其四十岁上下的父母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和判断，去审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世界。这是一个全体青年人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

这个时刻就象是一次影响到我们大家的大痉挛。我以为，只有我们理解了它，我们才能富于建设性地承受它。这条沟是不会变窄的，然而，当这些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年轻人变老，而他们的那些目瞪口呆、怒气冲天的长者对事实习以为常时，也许两代人就有可能隔沟交谈了。但这需要人们理解这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玛格丽特·米德

1977年9月于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 上 篇

## 六十年代概览



# 第一章

## 六十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我们现阶段(六十年代)的一个基本的而又非同寻常的问题，就是正当我们在探索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探讨在二十世纪末自觉地成为世界公民的可能性时，我们又第一次同时采纳着人类在过去五万年中每一个阶段的生活方式：原始时代的猎人和渔夫，仍然用挖掘棒耕种着贫瘠土地的人们，居住在城市中的、仍然受神权和君权统治的人们，生活方式千年来毫无变化的农民与城市文化不通音问，失去了古老而复杂的文化、在新的时代采取了简朴、粗野的无产者生活方式的人们，某些民族抛弃了数千年的文化，长驱直入现代世界。新几内亚的土人望着一堆土豆，把它们说成是“一大堆”，因为他不会计数；与此同时，为了使阿波罗飞船进入月球轨道而改变航程，肯尼迪角的工作人员正在以秒为单位进行精确的计算。在日本，制作特殊典礼陶器的第十三代陶工仍然不许触摸陶轮或制作其他形制的陶器。在某些地方，老年妇女在寻找草药，念念有词地解除怀孕少女的恐惧；而在其他地方，为了研制更好的避孕药，研究实验室正在探讨生育的各个阶段的秘密。二十名野蛮人组成的武装团体到野地里，从有五百年世仇的对头那里抓来一名牺牲者时，各种国际会议却在认真地分析着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大约五万年的历史在我们的面前展开，在这短暂的一刻中供我们同时检验。

这种局面是此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唯其如此，它也决不会重现。因为我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星球走遍，故此在任何地方都已不存在我们应该了解而又未了解的民族了。我们已经永远地揭开了地球的秘密，进一步的探索要在其他行星和星球上进行。我们具备与全球所有分散民族联系的手段，我们掌握了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各种理论武器。世界各民族共享着一种世界性的、以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因此，他们能够倾听我们的声音，与我们交谈。早年搞单方面探险的人类学家记录了异族的奇特的亲族系统，在这些异族人的眼中，这些人类学家被视为不可理解的人。如今，当飞机能飞越最边远的山区，当最偏僻地方的原始居民也能使用半导体收音机或录音机的时候，我们已可以在同一块天空的下面随便交谈了。技术最落后的民族大部分都不了解各种文明所组成的古代文化。他们不知道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伟大的中东文明以及孕育了现代科学的希腊和罗马传统。他们几步并作一步地从他们的过去跨进了我们的现在，但他们却与我们共享着一个世界，而他们对所有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的要求现在却成为沟通双方的基础。

在世界上其他许多事情正在发生之时，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旧日的殖民帝国已崩溃。很多地方凭着十来个大学生便组成了国家，新近刚被组织起来的民族有了政治上的要求，要求别人承认他们的国家。世界各地那些曾默不作声、遭受压迫的人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了。四年级的学生会静坐示威，在校的大学生要求挑选教授的权利。强者与弱者，占有者与被占有者，老人与年轻人，有知识和技术的人与没有知识和技术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知者高于无知者的牢固信念被动摇了。

尽管这些变化意义深远，但我认为，倘若我们不同时发展一种世界性的文化，那些代表着外来和原始文化的成员就不容易在我们的各种学术团体中充分作出贡献。

1967年，我回到了阔别二十九年的新几内亚塞皮克河畔的坦布南村。在那里，许多方面并无显著的进步。尽管一个慈善机构已被准许进村向孩子们提供教育，宗教仪式已受到限制，战火已熄灭，大人物的房子被迁走，但人们仍然象以往那样修建自己漂亮的住宅，生产西谷，用老方法打鱼。然而变化还是有的。在三十年代，人们来到一个新几内亚村庄时，当地人首先就是索要药品，有的人是带着溃烂或深深的伤口来的；接着就是要求易货——保险刀片、鱼钩、盐、手斧和布匹。人们对欧洲人的期望是从外部世界带来物质用品，如果他留下来，村民们就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了。但是在1967年，刚一见面的谈话是这样的：

“你带录音机了吗？”

“带了。怎么？”

“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其他民族的歌声，我们也希望他们听听我们的。”

一个了不起的变化。通过一种收音机的世界文化和每一个小文化都有其价值的民主理论的传播，坦布南人听到了新几内亚的音乐（现在它是根据澳大利亚与联合国合作的一项政府政策而广播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平等地加入这个新的广播世界。这还不是全部变化。当我的同事罗达·迈特劳开始录制他们的音乐时，他们都变成了熟练的批评家和监制人了；他们学会了如何分辨狗吠、孩子哭这些干扰声，在没有录音机以前，他们从未注意到村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是如此刺耳，如何破坏了他们的表演。当他们听到了把一切声音都照收不误的录音后，他们又有了一些新



的自我认识。现在，他们在考虑如何取得最佳音乐效果时，想到了风向，并学会根据不同歌唱者的音色来调整打击乐器的音量。他们通过新见解、新技术获得了这种觉醒，这是培养参与社会科学能力的第一步。他们与我们分享着我们的世界，并能够以新的方式为它作出贡献。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我们要正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我们到一所慈坛社<sup>①</sup>医院去探望被烧伤的儿童，可以发现那里有一支由受过高度训练的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阵容整齐、富于献身精神。他们贡献出数千小时的时间照料严重烧伤的儿童，耐心地为他们移植皮肤，修整面容，使这些勇敢而又乐观的儿童恢复原来的面貌。这种忙于复原、造皮、制假手的真诚的献身精神使人对未来满怀希望。然而，就在这同一家医院里，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些儿童，他们无法获得这种乐观精神，脸上带着对未来的绝望，就象那些不得不活下去的残废、断肢的动物；但他们仍然天真地渴望这个挽救了乐观的同室小病友的系统使他们重新生活，恢复部分功能。然而，这些出钱、出时间、出技术搞出了这些奇迹的人，却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通常都是不太持异议的公民），这个国家进行着一场战争，每天都要用凝固汽油弹烧伤比这家医院一年能拯救的还要多的儿童；每念及此，不由使人顿生踌躇。人们不得不问，难道我们不能自拔了吗？我们之所以不能自拔，是由于我们有一套一成不变的本能，决定了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一强大就要转而侵略和剥削别人；只要一虚弱，同样能搬出一套振振有词的理论。难道不是这样吗？要么就是我们陷入了一整套被称之为“文

---

① 慈坛社(Shriner)成立于1872年，它原是法国的一个叫作“神秘圣坛”(the Mystic Shrine)的教派。该社的医院是专门治疗伤残儿童的。——译注

明”的发明之中，现在，这种“文明”得到了技术和人口扩张的有力支持，以致我们必须象所有早期文明所遭逢的那样，沿着一条通向毁灭的既定道路走下去。而这一次毁灭将是全球范围的，它将结束太阳骄子上的居民的历史。

人类发明、精心创造和传递复杂文化的能力愈强，人类就肯定愈要陷入一种终将导致毁灭和恐惧的文化泥淖（尽管它产生了伟大的成就）；倘若我相信这一点的话，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只有预言家自己都不相信末日的预言时，预言家才是有用的。除非是为了提出某种对未来的选择方案（不管是禳灾解难的步骤也罢，还是作好下阴曹地府的准备也罢），否则谁耐烦警告末日的到来呢？越是起劲地鼓吹世界末日，人们就越是要造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那种把地球毁灭后人们可以移居到另一个行星上去的承诺，也许是个不能兑现的承诺。另一种选择则是完全超自然的，即认为上帝已经厌弃我们了，因而允许我们搞一场大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上帝喜欢的人将升入天堂，被上帝抛弃的人将被地狱的之火所焚烧。

当人们不理解大灾大难的原因时，那么上帝用火与洪水净化人世，但为了地球的未来会拯救一些人的想法就能站住脚；其实，这不过是那些相信能在最可怕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一种信念罢了。这一信念能使人们生活下去，有力量和乐观来抗拒可怕的局势，坚信上帝所宠爱的人将幸存下来。因此，人们一再地返回火山坡上建设家园；在堪萨斯州，每一个从未受过龙卷风之害的小镇居民都继续相信他们比别人运气好，决不会罹难。而在某些美国社区，科学家们参加了当地民众的抗议活动，反对危险的设施建立在他们的城市附近；他们完全清楚，如果抗议成功了，这些导弹基地势必建立在别人城市的附近。对人类信心不足，而

其本人又是人类的一位杰出成员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提出了一项建议:在美国和苏联确定一些互惠牺牲的目标城市,这样,被确定为自保的城市便可免受核战争之灾了。

这些各执一端的见解有时遭到谴责,有时受到欢迎。然而,不管它们采取的是世俗的形式还是宗教的形式,在我们目前这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世界范围的既定模式中,都是站不住脚的。开发宇宙寻求逃生之路的许诺是虚幻的,上帝将毁灭多数拯救少数的教义是信口雌黄,坚持盲目的乐观是不够的。那些既提不出经得起推敲的选择方案,却又要预言世界末日的预言家们是作茧自缚。他们不仅在描绘我们是怎样被罩进一张人造的或上帝造的天罗地网里,毫无出路,而且我们还得天天听他们说,这张网是如何无情地靠近了。对这些预言家来说,在目前的环境中成长、受教育和生存的人类还不具备听他们预言的能力。所以,有的人狂歌乱舞、醉生梦死;有的人吸毒,有的人靠乱涂乱画发泄他们的创造力。关心者太少,无法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拯救我们。除非有足够的男人和女人来关心此事,否则我们将注定灭亡。因此,我站在这里并不是当卡珊德拉<sup>①</sup>的,而是以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难中活过来的人的身份出现的。在那次大战中,在灾难似乎不可避免的压力下,作为人民我们曾集中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躲过了灾难。现在我相信,躲避一次无比危险的灾难,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运用我们现在所具备的全部意志;当然,我们要永远清醒,我们的知识是不够的。当年,局势曾十分险恶。我们曾预言我们所了解的科学和人类文化会死亡,曾预言西方世界将被一种邪恶的文化所吞没,这种文化不仅能够运用科学的邪恶的那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译注

一面所发展的技术，而且也能够阻止使科学本身成为解放人性的手段。我们曾预言会出现一百年的“黑暗时代”。我们的时空观是那样有限，当时觉得欧美文化要蒙尘一百年是太可怕了，简直不敢细想。也许，正因为这种局限性，才使我们能够面对它。反之，整个人类、生命本身从这个行星上消失的可能性几乎无人能够想象。运用神学或科学幻想的想象力，人类可以看到一切被毁灭，只是除了自己。有一回，当我坐的汽车突然打弯，有可能车毁人亡时，我也曾有过同样愚不可及的乐观。我想，这位司机的子女马上就要成为孤儿了，我对自己说：“我会照顾他们的。”

这种乐观精神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一个孩子所表现出的这种乐观能照亮全世界，他证明了我们对个人关心的程度在增加。但整个社会的成员把房子重建在活火山的山坡上，就会导致世界性的毁灭。我们要在个人的乐观和集体性的固执的盲目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也许，获得这种平衡的方法之一就是发现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由于个人和集体的、历史的缘故而具有超常的乐观能力。随后，我们向他们提供观察和预见的手段，使他们去寻找比熟悉的活火山坡更好的新址和城市。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把过去所有的伟大文明和我们当代历史各个成功的阶段视为一连串兴衰的重复，是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不够。当年的建筑如今已成高耸的废墟，我们不知道那里的人曾是如何生活的，正如我们无法重复当年给婴儿唱的歌那样，更何况那些未曾歌唱过的穷人和无产者的生活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就是人类的幻想和绝望赖以驰骋的历史大空缺。在历史上犹如在科学上一样，大而空的设想会动摇对核心问题的信心与信赖。达尔文理论刚一出现时，只会使相信上帝的人感到痛心疾

首，而在不信上帝的人中则证明损人利己是正当的。

然而，对这种幸存机制每一次深入细致的探讨——如经过复杂的调整，可以使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艳丽的鱼集中在特殊的恰当处所，使那些本来并不特别挑剔环境的生物从一个栖息地迁往另一个栖息地——都会修正原来对“适者生存”概念的敏感反应。对于旅鼠有死亡本能的理论，我们可以用一种对数量过多或食物短缺的复杂反应来加以解释。

每一种在理论上粗糙、夸张的世界观都会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踏入陷阱。因为我们或是把人类社会的本质视为弱肉强食，或是把宇宙视为人类可以学会控制的机器，或是把人类本身视为一种类似机械的过程，不久便可以大量复制生产。但是，理论的下一步发展，新仪器及更精确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的采用，却把这些粗糙的、探讨性的观念和这种神经过敏的观念所引起绝望搞得更加复杂了。

旧日的理论只会无限地夸大一个可变因素或几个可变因素，认为失会由得来加以平衡，而得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体系中的某处会有所失。人类能采取的适当行动已经不再用这种粗率的语言来表达，只有在那种粮食的增产是以耗尽地力和污染河流为代价的地方，或一国的经济进步是以另一国不可避免的损失为代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才能找到这种无限夸大的理论模式。我们可以用一种生物学模式，尤其是一种生态学模式（其理论基础是许多生物与一个单一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综合系统），来代替那种在一个机械的系统中以单一的、孤立的生物体作为物理单位的理论模式。在新的模式中，系统的一部分之所得亦即其他部分之所得。寄生虫与寄主互为条件；当内部平衡被破坏时，就会发生变化，新的调整就必须做出。旧式的得与失的算计被被动的一致性所替

代，信息的集中将扭转瓦解的趋向。倘若人类想既利用以前的科学见解，而又不受其束缚，就必须走这条道路。这样，人类通过对其居住的宇宙的了解，便可以在这宇宙中成为最充分运用这种被动一致性的典范和执行者。

从粗疏的、天生悲观的表述和概念到容许革新、觉悟和拯救的所有转变，都是有关的新研究的结果。数学、电子学和一般性技术所提供的种种手段可以愈来愈精确地探讨各种事件，这些事件的规模与结构迄今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它们被当作一个更大的系统的构成单元，从而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特点。在新的水平上对宇宙本质（也包括人类）进行科学研究，每一个新发现都带来了希望的新曙光。

但是，仅仅应用物理科学是不够的，不管这对保护这个星球或培养人的价值有多么直接的作用。人类在探讨其本身时，通过一些古老的方法已经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可能性，我们也只有同时运用这些方法，才有希望为信仰与希望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 第 二 章

### 后象征文化与熟悉的祖先

在过去对文化传播方式的研究中，我发现，有的文化变化十分缓慢，似乎这种文化一出现就可以断定它不过是一种幼稚的文化；有的文化则变化很快，以致年轻人乃至成年人不是向老一辈学习，而是向同辈人学习；对文化进行这种区别是很有用的。现在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世界的成年人都认识到，所有孩子们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不同了。为了区分这三种文化类型，我使用三个词：当论及“未来重复过去”型时，我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这个词；论及“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时，我用“互象征”（Cofigurative）这个词；在论及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种文化类型时，我就用“前象征”（Prefigurative）这个词。原始社会和小的宗教及意识形态飞地基本上属于后象征型，它们接受过去的权威。一些为了体现变化而必须发展技术的伟大文明，其基本特点就是采取某种向同辈人，向游戏伙伴、同学和一起学艺的人学习的互象征形式。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年轻人对依然未知的将来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因而他们有了新的权威。

后象征文化是一种变化迟缓、难以觉察的文化。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

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

在后象征文化中，老年人无法想象变化，所以只能把这种持续不变的意识传给他们的子孙。根据现有的证据，这种文化具有那种已有千年历史或可回溯到文明起源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特点。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或碑录，因此，每一次变化都必须与已知的东西相似，都必须根据每一代老年人的记忆和运动模式进行。孩子的基本训练开始得很早，这种训练难以言传，但却十分确定。他们的长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事情就该是这样。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兹事体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识和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只有外来的暴力事件的冲击，如天灾或军事征服，才能改变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意识的接触根本无法改变这种永恒的意识，反而会加强自己的独特意识和根深蒂固的一致性。甚至在极端的条件下，如被迫移民，在未有海图指引的海洋中向着未定的目的地进行长途跋涉，最终来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反而会加强这种延续的意识。

所有文化的延续至少要靠三代人的生存，这是毋庸置疑的。后象征文化的基本特点是这样一种假设：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其本身也许已包含了许多变化）是不可改变的，永远如此的。这种假设是老一辈的成员以一言一行来表达的。过去，在现有的生活继续向前迈进之前，活着的曾祖辈是屈指可数的，祖父辈的人也不多。但这些人却体现了文化的源远流长，他们是年轻人的榜样而不是自己的榜样；他们的一动一静都包含着对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认，他们人不多，但却“横”得很。他们那敏锐的目光、结



实的四肢和不知疲倦的勤奋不但代表着文化的遗留，而且代表着物质的遗留。为了这样一种文化能垂之久远，老年人不但要在饥馑之岁带领族人前往难以找到的避难地，而且还要树立完美的生活榜样。当死之将至时，当丧曲即将唱起来的时候，根据垂死者的年龄、性别，智慧与气质，人们将为他们制作祭品，葬身之地也已指定；这一切都体现了全部文化。

在这类文化中，每一件器物的形制和使用方法是被采纳还是被拒绝，是被滥用还是被打破，抑或是受到了不恰当的崇敬，凡此种种都会在其所有物品的制作和使用方式上被引为成例。每一个姿态都是其他所有姿态的加强、回忆、和反射，或提供一个范例，或是其他姿势的反响；对其它姿势来说，它或多或少是个完整的变体。每一个语调都包含着可在其他语调中发现的方式。任何一部分文化行为经过分析后，都能找出同样的潜在模式，或与那种文化中其他模式同类的变体模式。与其他民族相隔绝的那种十分简单的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但那些十分复杂的文化也可能是后象征型的，所以也会表现出其他后象征文化的全部特点：对变化缺少认识，每一代儿童都能不走样地复制文化形式。

当然，变化的条件永远是绝对存在的，即使在仅仅是重复传统程序的过程中变化亦难免。然而，世上的事谁也不说不准，故此，某些程序，某些习俗，某些信念在重复过几千次之后，总是有可能升华为自觉意识的。当一个后象征文化的民族与其他文化类型的民族有了密切接触时，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便增加了。他们会更强烈地意识到真正构成其文化的是什么。

1925年，萨摩亚人在与现代的欧美文化接触一百年后，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起萨摩亚和萨摩亚风俗，连骂孩子都不忘说明是萨

摩亚孩子。这其中包含着对波利西尼亚特征的回忆和对他们与殖民者之间强烈对比的意识。在四十年代的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外仅数英里的地方，印第安人仍然用弓箭狩猎，他们与欧洲人毫无交往，但却用从欧洲人那里偷来的铝锅做饭。而在六十年代，住在国外的欧美军队及其家属仍然象是住在飞地里，他们以同样不解和不接受的眼光看待那些“本地人”——德国人、马来人或越南人——这些人就住在他们的围墙外边。这种对比的经验只能使人对本种群不变的特征因素的意识得到提高。

尽管后象征文化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与其生存地有关的，但生存地不必仅是一块二十代人耕作过的地区。在一年两迁的游牧民族中，在美国人和犹太人这样爱散居国外的群体中，在印度的某些喜欢三三两两地散居在其他种姓村落中的种姓家族里，也能发现这种文化。在一些小的贵族群体中或贱民阶层中也能发现这种文化。那些一度曾是复杂社会一部分的人也许在外国的土地上会失去一种动态反应，即忘记那些导致自己移民的原因，但他们新的地方还是会聚集在一起，坚持他们祖先的不变的特性。

要被这些群体所接纳很可能需要改变宗教信仰，履行加入仪式，或者割包皮；但所有这类行为都是传达绝对的信仰和不可变更性，就如同他们的祖辈在后象征文化中向孙儿们所传达的那样。成员资格通常是与生俱来的，但有时也是通过选举而获得的。这种资格是一种全面的、无可置疑的义务。

后象征文化有赖于三代人的实际存在。因此，后象征文化完全是代代相传的。它的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而这种复制的能力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它靠的是成年人能够理解养育他们的父母，正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子女那样。在这样的社会里，父母辈并不具备神话

式的身份，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这些父母们常常凭着幻想来证明自己发号施令的正当性——“我的父亲决不会做这种事或那种事，或这两种事都不会做的。”然而，祖父一旦坐在那里，这种话就说不得了。祖孙之间是有着和谐的联盟的，由于父子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规矩，作父亲的与祖孙二者同时处于对立的地位。整个社会系统就是这样存在的：人们从降生之日就耳闻目睹的老规矩必须照遵不误，因此，人们也必须把它作为现实而加以体验，社会系统的存在端赖于此。“我是谁？作为我的文化的一名成员，我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怎样言？怎样行？怎样吃和睡？怎样做爱？怎样谋生？怎样作父母？怎样去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也许有的孩子不象他们的祖辈言传身教的那样勇敢，那样会作父母，那样勤奋，那样慷慨；但是，尽管他们不成功，他们和那些成功的人一样，仍然是他们文化的成员。如果自杀是可能的，少数人或许多人也许会自杀；若自杀是不可能的，自我毁灭的冲动就会采取其他形式。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共有的驱动力与有效的人类防卫机制的结合，将会看到认识与触类旁通的变化过程，认识与回忆的变化过程和更新重建的变化过程。但所有这些过程的组合方式将完全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

我对形形色色的大西洋民族作过四十年的研究工作，可以举出许多种类的后象征文化。新几内亚的山地阿拉巴什人 (Mountain Arapesh) 的生活方式与1932年毫无二致。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有确切的含意——用脚从地上拾起某物或把编席的叶子打下来的方式——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姿势都适用于所有的人。它们反映了过去，不管这种过去本身曾有多少次变化，但它毕竟是已经逝去的过去了。对阿拉巴什人来说，除了由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孙及子孙的子孙所体现的过去外，就不存在其他的过去了。尽管那里

有过变化，但变化已完全被吸收，由于人们的理解和要求，较早的风俗与较晚的风俗间的差别消失了。

随着阿拉巴什人的孩子被喂养、搂抱、洗浴和打扮，无数含糊而又难以言喻的知识就这样通过操持他的双手和周围的交谈、催眠曲与挽歌的节奏被灌输给他。在村内和村与村之间，小孩起初是被抱着，随后是自己在熟悉的道路上行走，那双脚就连路面上最不起眼的障碍都认得清。新房一建成，每一个路过那里的人都会向被抱着的孩子讲清：这儿有了新东西，是几天以前所没有的东西，不必感到吃惊、意外。这种反应是微不足道的，就象阳光穿过疏密不同的树叶后在盲人身上所引起的差别那样，反正阳光还在就行。陌生人出现在村里会引起同样精确的反应。人们一想到手头还有多少食物能安慰危险的来访者以及也许正呆在村外某处的来访者的同伙时，就不由得肌肉紧张。当一个新的婴儿即将在悬崖边出生时，尽管没有沿街报信的人宣布这件事，但却会有成千的小标识将此事通知村人。悬崖被视为“邪恶的地方”，凡来月经和分娩的女人都要被送到那儿去；那是一个度过经期，解大便和生孩子的地方。

阿拉巴什人相信，他们自古以来一直过的那种日子就是生活，唯一的过去是传说中的时代，是离他们无限遥远的时代；那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树木都被用来确证那亘古不变的过去；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所接受和传授的都是同一套信息：身为一个人，身为男孩或女孩，身为长子或幼子，身为长兄家庭的一员或辈份较低的家族成员，都各有其位，各有其责。有的人属于村中的这一部分：他们的保护神是鹰隼，将来要成为宴会上高谈阔论的人物；如果一个人生在村子的另一部分里，则将成为白鸮式的人物，讲话只能三言两语；而这两部分人也是各有位，各有其责的。

同样，孩子认识到，许多孩子是不会活到大的。他或她知道，生命是一个脆弱的东西，新生的小生命可能会因为出生性别不对而遭抛弃；也可能因为母亲奶水不足而死于襁褓之中；也可能因为一位男性亲属在一怒之下把孩子身体的某一致命器官偷给敌方的男巫而丧生。孩子们也知道，人们支配周围土地的能力是很小的；在森林里有无人居住的荒村；有些薯类植物徒留其名，它们的种子和使它们生长的咒语都已失传。这种损失并不被视为一种变化，而是被视为大千世界中天道循环的一个可以预期的阶段。在这个世界中，一切知识都是转瞬即逝，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别的民族所制作，必须从他们那里进口。二十年前引进的舞蹈现在已传到了更加内地的村落；那些站在这个系统之外或偶尔成为邻近部落成员的人类学家对山地民族的落后有深刻的了解，并在寻找一种表述这种落后的方法——也许只有这些人类学家才能评论他们在这种舞蹈中保留了哪些部分，失去了哪些部分。

阿拉巴什人有些过分强调一种绝望情绪和恐惧，认为知识将会永远丧失，似乎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类也许确实要灭绝了。尽管如此，我在他们中间发现的那种时间不可穷尽的意识和无所不在的风俗是比较惊人的，因为他们与偏僻海岛上的居民不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和其他民族隔绝。他们的村落散布在一条山脉上，从海边延伸到平原。他们与其他语言不同但风俗相似的民族互相交易，互相走动，宴筵往还。这种已知的过去与可知的将来间同一性的意识更加令人吃惊，尽管小的变化和交流始终不断。在一个领域中许多东西都是可以交换的——罐子、提包、矛枪、弓箭、歌曲、舞蹈，种子和咒语，这种现象亦颇惊人。妇女可以从一个部落逃到另一个部落。村里总会有一两个陌生的女人，她们不得不学说那些把他们称为妻子的男人们的语言。她们总是每月来一

次，躲藏在棚屋里。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孩子们知道，日后也会有其他女人逃走的；男孩们知道，他们的妻子有朝一日也许会逃走；姑娘们知道，她们自己也可能会逃走，不得不学习另一种风俗和语言。这也是那种不变社会的一部分。

其他的岛民（如波利西尼亚人）是散居在数百英里以外的边远岛屿上的。一个小群体经过几个星期的航海后便登陆，定居下来，有些财产永远丧失了，许多人丧了命。但他们仍然能重建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注入一种特殊的因素——即保存这种文化的决心。家谱和往日被神话传说所肯定的父母之道有力地维系着这一文化。相反，新几内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数千年来都是散居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其居住地各有特色。他们珍视和强调小的差别，坚持认为词汇的微小变化，语言速度的改变和辅音的转移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方言。他们是在允许不断的交换和风俗的微小的、非累积性的多样化的范围内保持其特点不变意识的。

我们发现，只有在那些经历过历史巨变，并以某种方式记住了这些历史巨变的民族之中，后象征文化才能幸存并重建。巴厘岛上的人在数百年中曾受过一些意义深远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如中国、印度教和佛教，以及另一种后期形式的印度教——它是那些逃避伊斯兰征服者的爪哇人带来的。在三十年代的巴厘岛上，从巴厘的雕塑和舞蹈中，从中国硬币被当作流通货币的现象中，从西部的那种来自马来亚的杂技舞中，从卖冰淇淋小贩的自行车和捆在车把上的冰桶中，都可以看到古老的东西与现代的东西并存的现象。外来人和少数受过教育的巴厘人可以分辨出东方和西方发达文化的影响，能够区分不同时期宗教影响的礼仪因素，能够指出源自印度教仪式的婆罗门以及源自佛教的婆罗门。在巴厘的村子里，一位低等庙宇的头脑简单的看守人也能办到这一点。

他可以,把村神的名字习惯地称作“巴塔拉·德萨”(Betara Desa,即“村神”之意),这个名字既简单又妥贴,但若有一位高级客人在场,他也能够用印度教高级神的名字来称呼这些神。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自己的庙宇,自己的宗教仪式和自己的舞蹈,由一个贵族集团统治的村庄与由另一些贵族集团统治的村庄是不同的。然而,这两个村子都坚定地拥保散布在全巴厘岛的观念,即:“每一个巴厘的村庄都是不一样的,”“整个巴厘是一样的。”这些观念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没完没了、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尽管他们有记录岁月流逝的方法,纪念碑上偶尔也署明日期,但他们使用的却是一种日与星期循环的历法,某些日子的再次重合是由节日来表明的。一本棕榈叶的新书一旦完成,就在上面署上日和星期,但不署年份,因为新书都是照抄其他很久以前的书。在美拉尼西亚,变化会使一群人区别于他们的邻居;在波利尼西亚,变化则是被否定和被削弱的;而在一个追求变化与进步的文化中,变化会被当作真正的革新。但是,在巴厘这个往复循环、基本不变的天地里,变化不过是一种时髦把戏而已。在这个天地里,个人是在家族的范围内再生产的,他们的生活只有运气好和运气糟的差别。

巴厘人具有悠久、丰富和摇曳多姿的历史,这是一个扩散、移民和贸易的历史,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厘文化肯定象原始的阿拉巴什文化一样是一种后象征性的文化。生死婚嫁的仪式重复着同样的主题。仪式上的演出描绘的是龙与巫婆之间的斗争,龙代表生与宗教仪式,巫婆则代表死与恐惧。这种演出就如同母亲们千百年来逗弄怀中的孩子的游戏一样,巫婆象母亲抱孩子似地抱着布匹,龙则有一条火红的舌头(龙通常都是这种装扮的),用它那不伤人的嘴保护着它的追随者,因为它表现的是爱耍笑的巴厘人的父亲角色。老年人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验之间

没有突破。当婴儿在母亲的怀中由于恐惧和喜悦而紧张或放松时，人们并不期望婴儿体验到变化或差别。因此，当母亲看着巫婆将魔布懒洋洋地抛向袭击者，使他们昏昏睡去时，便会回忆起自己早年在母亲怀中时的感受。

有的民族的祖先属于伟大的文明，其成员对变化的可能性有充分的意识；然而，即使在这些民族中也发现这种永久的素质。某些从欧洲到北美去的移民，尤其是那些有着共同迷信观念的移民，一旦在新大陆定居下来以后，便有目的地建立社区，他们在这些社区中又重新确立了永久意识和无可逃避的、代代认同的意识。哈特莱教派、阿门教派、敦卡教派、锡克教徒和杜霍波尔教派都表现出了这样的素质。即使在今天，这些教区的孩子们还是这样受教育的——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榜样。这种教育几乎是不可能摆脱的。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突破这种教育，那就意味着这种认同和连续意识的一次更新——更新为一种新的文化。

人们会要求与其他非后象征文化或既是后象征又是传播性的文化接触，在这种压力下，由于对本身文化认同性有所认识，有的人也许会离开自己的文化而转入另一种文化。但他们带着文化认同性的意识走进另一种文化时，他们仍然会象在旧文化中那样在新的文化中为认同而奋斗。在许多实例中，他们仅仅是在平行的意义上发展；讲着新语言，用的却是旧句法；住宅是可以交换的，然而在新的社会中装饰和进入房屋的方式却与旧的社会中是一样的。这就是成年的移民从一个象征文化进入一个陌生社会时所作出的人们所熟悉的调整类型之一。他们内在的整合性并未变化。这种整合性极为牢固，致使许多人仅仅是在不失去认同的情况下，改换了一些东西而已。但大多数成年移民都有过这样的时刻：



随着这种交换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认同性就会发生变化。

对那些从没有变化概念的文化中来的人，这种变化是否可能尚不得而知。那些生在美国，但被送回日本接受长期教育后又返回美国的日本人——也就是在二次大战的艰难岁月被称为“基比”(Kibei)的那些日本人——在选择忠诚对象的关头来临时，几乎没有什么内心冲突。他们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忠诚，但他们也认识到，社会成员资格是可以失去的，忠诚也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曾忠于和感激日本的事实说明，他们也能够变成忠诚的美国人。他们的那种后象征性的灌输已经包含了完全转向另一个社会的可能性。

通过这种变化过程，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原始时代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妇女的生活是什么样了。根据乱伦可以多生育的规矩，她们不能和说同样语言的本公社的人结婚，而是作为陌生人到公社之外的、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去生活。在无法数计的年代里，他们在同一群体中发展了一种女人的语言和一种男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极大差异和父母所共有的文化变成了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一个人是在祖母的歌声和妇女特有的语言环境中出生并接受后象征教育的。一个新娘来到一个部落前，就已经从她的母亲或祖母那里得知女人讲的是一种不同于男人的语言，而她要嫁的男人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他只讲男人的语言。这种状况使那种不同语言的种族之间的互婚成为可能。

正如后象征文化可能含有成员离去、进入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那样，它们也可能含有使这种调整变得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教育。伊希是1911年被人们发现的一个孤零零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他是整个部落被白人追杀后的唯一幸存者，他正在等待死亡

的降临。他以前没有接受过能在白人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教育，他仍然保持着雅纳印第安人 (Yana Indian) 的认同性。他曾在一群如饥似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学生面前表演雅纳人是如何造箭头的。他的早期教育和十年来躲避掠夺成性的白人的惨痛经历，使得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原来群体的身份。

里查德·古尔德最近对居住在沙漠中的澳大利亚土著进行了研究。这些土著对他们所居住的沙漠的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意。但他们现在却被迁到了离他们的“故乡”数百英里远的一块定居区去了，在这里还住着其他已被同化的土著人。这些沙漠人引进了一种方法，澳大利亚的土著在与他们相邻的部落发生联系时曾代代使用过这个方法——他们试图使自己的婚姻系统去适应那些被同化程度更深的人。但那些被同化程度更深的人却对这种交换有所警惕。他们尽管部分丧失了其特性，不再狩猎，不再举行神秘仪式，但他们却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到头来似乎还是抵制同化。他们过去的失败使他们屈服于白人的文化。澳大利亚的土著并不反对另一个部落的男人与他们的女人姘居，只要他遵守婚姻等级中的戒律。但白人并没有婚姻等级，他们有的是深深的、过激的优越感。对白人来说，土著妇女可以从性欲上加以利用是土著人那抹不掉的低下地位的标志。土著人有一种复杂的、屡试不爽的方法，即使他们特有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交错相处，这种相处所导致的麻痹状态将会制止同化过程。但在与白人接触时，这一招失灵了。

如同成年人一样，孩子们从年长者那里学习语言的方式将决定他们学习新语言的能力。在一个使变化成为可能的可比较系统内，他们可以互相学习新的语言。被其他种族所包围的新几内亚人就可以讲其他的语言，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是这样。要是他

们处在一个矫正系统中，他们就学习自己的语言，因为这种系统能极完美地把其他所有系统的东西转化过来。比如年轻的美国入学的就是美式英语，因为教他们的老师拒绝了他们先辈的母语。

因此，千百年来孩子都是被文化演变的方式教育起来的，大部分（并非全部）降生在社会中的儿童都能适应这些方式。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个人差异来看，差别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这些差别被视为不同的范畴，所有儿童必须以某种方式去适当它们。巴厘人把孩子分成两类，一类是天生顽劣的，一类是天生有理智的、善良的。一个巴厘的儿童很早便被断定他或她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不管这种属性是否合适，一个人都要把它带到老。萨摩亚人则象法国人，是以年龄为基础进行这种区分的，这一年龄定在孩子有能力理解社会上的事情的时候。但是，能够具备各种可能性以适应所有儿童的文化系统尚没有记载。有时，过于不符合人们期望的孩子会丧生；有时，他们会变得茫然不知所措，愤愤不平，或被迫以异性心理自居。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对周围的人有不正常的反应，如果我们将他们视为抚育系统的失败，则已知的所有社会中都会有精神神经病发生。

在所有的抚育系统中，必须有某种措施来理处孩子性意识的出现、身体的矮小、地位的低下及不成熟之间的矛盾。有时，文化形式基本上能适应儿童的早熟。如在渔猎社会中，男孩在五、六岁时便学习父母的生存技巧，一进入青春期便结婚。有时，要求很小的男孩具备非凡的勇气，如新几内亚的蒙都古莫人（Mundugumor）就把孩子作为人质送到暂时结盟的部落中去。这些孩子被要求在作人质期间尽可能多听多看，以便日后能指挥一次对该村的袭击，斩取对方的头颅。然而，在比较复杂的社会里，要远远超过六、七岁、甚至要到十六岁才能担任成人的角色，这种社会就

得采取其他方法来适应儿童成熟期的延迟。父母必须防止自己童年时长期压抑的性欲被重新唤起。这种预防措施也许会集中表现在对孩子的纵容上，如在巴厘人中，允许男孩在各部落间游荡，头发蓬乱、邋遢肮脏、无法无天；在巴松加人(Bathonga)中，小男孩被送到舅舅处抚养，以代替他们严厉的父亲；在祖尼人(Zuni)中，父母避免与子女发生冲突，而是秘密地把“恐吓舞蹈者”(scare dancers)请来，由他们来揍那些顽劣的孩子。

因此，在每一个后象征社会中，每一代男孩中都会出现对男性权威的恋母性的挑战，如果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应付这种挑战。它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也许有生物性的功效，但在一切已知的文化中，儿童过早生育、承担责任都是不恰当的。儿童早熟的性敏感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利用，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有反对乱伦的规定。与此同时，必须防止儿童在成年人身上诱发回忆、恐惧、敌意和绝望，否则将会导致儿童被抛弃、被毁掉。

每个社会系统也得产生某些巧妙的意外——接二连三的事使某些儿童产生一种运气甚佳的意识或被选择参与其次伴无法企及的大事。这些也许会被制度化，如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的文化中，青少年和成年人都追求想象力，具备远见卓识的人就成为领袖。这种允许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一旦个人身心成熟的时机到来，他们就会利用这种远见卓识（或梦想）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而所谓天才乃是才干与气质的特殊结合，强调天生的禀赋与环境，能力与幸运的相互适应是文化本身的一种功能。在一个缺少创新思想和变化的文化中，即使是一次很小的变化，如现存艺术风格的微小变化、一种新原料的使用、或战斗团体规模的扩大，也需要出现一位象伽利略或牛顿那样伟大的天才（他们是在科学知识发展的伟大传统的背景中进行他们的工作的）。

对于这种保持着整体性和复制性的系统中，巧妙的突破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尚知之甚少。在那些压制和束缚自主行为的系统中，我们不知道某些儿童是怎样保持其自主行为的，某些儿童在得到所有既定的答案后是怎样学会把疑惑压在心头的，或在面对饥饿与绝望是家常便饭的条件时，他们又是怎样保存着过份的希冀。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对那种死死伤伤的事已耳熟能详，婴儿或儿童无法或无力被抚养的事也披露甚多，但我们对那些极不幸的人依然了解甚少。这就是年轻人常常提出诘问的状况之一。

后象征社会中的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那么平静。在某些社会中，每一代都有造反的可能——蔑视老人所表达的愿望，从上面一代人的手中夺权。童年时期的经历也许是极为痛苦的，小男孩们害怕被年长的叔伯婶姨之辈所控制，年长者为了使他们害怕常常举行恐怖的宗教仪式。可是，当这些小男孩长大成人后，也希望他们的兄弟姊妹用同样的仪式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这些仪式使孩子们极为恐惧、深受伤害。事实上，某些最稳定的后象征文化——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或新几内亚柯拉姆河流域（Keram River）的巴那罗人（Banaro）——就是这种典型的社会，全体居民都得参加折磨性的仪式和入会式，或不同的共妻和性生活的人会式；这些仪式的许多内容被称为折磨是再恰当不过了，它们使参加者感到羞耻和恐怖。

人类顽固坚持的似乎是通过受苦受难所获得的文化特性，而不是通过幸福快乐所获得的文化特性。就好象一个多年来睡硬床而又梦想睡软床的囚徒，一旦出狱后，他发现自己只能睡硬床；又好象忍饥挨饿的人搬到一个食物较好的地方后，发现自己仍然愿意吃那种从童年时吃惯的、营养较差而又毫不诱人的食物。比起那些早期教育是痛苦而又可怕的儿童，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成

长的儿童在新环境中会更安全，适应性更强。奇怪的是，惩罚和被彻底抛弃的威胁所训练出来的文化特性很有持久性。由磨难或经受磨难的能力，以及对祖先早年英雄般磨难的自豪所培养出的民族特性的意识可以在新的环境中保存下来，而人们本以为这种新的环境能使那种民族意识消亡。在少数忍耐力极强的社团中——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社团——经过数百年的迫害和放逐，仍然能表现出顽强的民族特性。

但是，典型的后象征文化却是与世隔绝的、原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只有靠调节其成员的回忆才能保存过去的故事。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没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书来为修改过去的历史圆谎。但无言的石头——即使人的双手曾在上边刻凿过——却能轻而易举地被用来证实经过修正的历史。修家谱的人毫不尴尬地利用文献记载来浓缩历史，这样，神话时代和最近的历史便能贯通一气了。“那个凯撒嘛！他曾经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到大路上去干活儿呢！”

“开天辟地之初，世上一切皆无。”为了摧毁过去的记忆，或为了固圉与古不同的现实而仅保存某一种形式，是原始民族一直在采用的极有效的调整方法，即使那些最有历史头脑的人也概莫能外，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小群体就是起源于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人类学家为了了解这种社会而致力于发展文化概念。这种文化的特点是明显的稳定性和统一的不变的意识。它们已被纳入了一种“文化”模式，人类学家不但自己使用这种模式，而且将它提供给那些希望利用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不过，人类学家对小的、原始的、同种族的、发展缓慢的社会的描述方式，与曾居住在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区的原始部落中的多样性

的描述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显然，尽管有些民族的技术水平大体相等，但他们之中必定发生过大变动。有的民族相互阻隔，语言不同。有的民族语言相同，但却相距数百英里。有的群体在体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却同操一种语言或同享一种文化。

我以为，有一点强调得不够，即在没有书面语言和历史文献的情况下，新观念会迅速被旧观念吞没。老年人有对文化进行修改的权力，他们把这种神秘化的、否定变化的文化传给年轻人。一个在美国大平原的圆锥顶帐篷中仅住过三四代的民族本来是从其他部落那里借用这种帐篷式样的，但他们却会说他们的祖先是如何模仿卷起的树叶而造出这种帐篷的。在萨摩亚，年长者能够彬彬有礼地听一位从新西兰来的波利尼西亚客人台·兰奇·希洛亚(Te Rangi Hiroa)讲述波利尼西亚祖先的长途航行，波利尼西亚人保存着一张代代相传的早年的航海圣图。接着，他的主人便会断然答道：“很有意思，但萨摩亚人是起源于费蒂乌塔(Fitiuta)这地方的。”这位一半波利尼西亚血统，一半欧洲血统的来访者大为光火，他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草，竟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伊甸园！

为了利用遥远的过去来模糊和同化变革，有关已知一切的记忆的可靠性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发现，一个对发生在相对稳定时期的事能说头头是道的人，对发生在较近的、极为不稳定时期的事的叙述却是矛盾百出。那些必须适应不熟悉的背景的事件被说得虚无飘渺，但这些事件会及时地(如果还能记得住的话)被重新赋以熟悉的形式，而事件细节(如变化的过程)则被忘掉了事。连续性得以保存下来是由于压制那些干扰连续性和认同意识的记忆的结果。

即使在那些变革的观念已经得到体现的文化中，为了使记忆

变得生动而利用细节(不管是遥远的事还是最近的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存一种历久不衰的连续性意识。虽然这种技巧有可能会与对待认同性和连续性的态度一起失去,但它还是可以失而复得的。具有持久力的、无可置疑的认同意识和已知生活的每一方面的普遍正确性是后象征文化的特点,它们会在文化复合体的每一层面上出现或重建。

有的移民来自有数千年文字历史的国家,那里的每一座城镇都因有代表一系列历史变革的建筑而光彩大增,但是,当这些移民来到北美或澳大利亚这样的新大陆后,也许会失去其特有的变化观念。在没有古老的记录和古老标志的情况下,如没有历史赖以发生的市场、树木或山峰,过去就会被浓缩。新国家(在那里,大部分过去的东西都被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其特有的。人们继续讲着古老的语言,从事着一些古老的职业,如在相似的土地上种葡萄,在同样相似的土地上种小麦,修建保留着古老比例的房屋,以致眼前风光甚至夜间同样旋转在北半球天空的北斗七星,都能使移民社会得到一种牢不可破的连续意识。只要人们一结群而居,这种意识便会保留下来。在那里,祖辈的人仍然被当作权威,他们照料庄稼和保存食物的诀窍,妥善处理逆境的方法都会被坚持下去。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团中,人们迄今仍然继续着这种生活方式,保存了大量自己的文化。

倘若人们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教育,而他们与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又甚少、并充满敌意或鲜明对比,则他们的深刻的认同意识就几乎是无法改变的。有个别的人也许会长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工作、吃饭甚至有时会结婚、生儿育女,而他们既不对自己的身份提出疑问,也不追求新的身份,则他们那里便不会出现认同问题。或者,整个群体会建立起有限移



民的习惯，如在希腊或中国。所有的男子长大成人后就到海上去，或到其他国家的矿山、葡萄园和工厂去干活，把女人和孩子留在家里。经过几代人后，对父亲不在的状况便有了新的适应，但文化虽然有了变化，却仍然能连贯地传下去。

但是，当一个群体迁移到另一个环境中时，变化的可能性便会增加。在那种环境中，三代人一起离开故乡，来到了一个地方，新的风景与旧地风光很相似——河水照样流淌，海浪照样发出轰鸣声——大部分旧的生活方式被保存下来，于是，老年人的记忆与儿童的体验便合流了。在新的国度里，九月初天就凉了，而人们在旧家园时曾经能在阳光下坐到十月份的；这里没有向日葵子来做小饼；初夏采集的浆果是黑色的，不是红色的；秋天采集的坚果虽然名称依旧，但形状却不一样了——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在祖辈的评论中增加一种新的因素：“老家”可不是这样啊。

这种对差别的意识为孩子打开了通往新选择的道路。由于地方不同了，他们可以倾听和吸收此处和彼处的意识，并把移民和变化的事实变成他们意识的一部分。这样，他们也许会珍视这种对比，以充满钟爱之情的眼光看待先前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少数纪念物；或许，他们会发现这些祖先的记忆颇有些沉重或毫无魅力，从而一股脑地拒绝它们。新国家的政府也许会坚持让移民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放弃旧日的生活习惯，给他们的孩子种牛痘，要他们纳税，让他们的年轻人服兵役，让他们的儿童上学，学习本国语言。即便没有这些要求，也有其他的压力使人们不听老年人的话。要是老年人的故事过于怀旧——要是他们象也门的犹太人被送到以色列后那样，谈起他们曾住过多层房屋，或者象爱尔兰人那样，身居城市的公寓，却把舒适的旧农舍浪漫化——那么，祖辈们的故事只会引起不满。往日的崇高伟大填不满空粮罐，

也抵挡不住在裂罅中呼啸的寒风。

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迁居的土地上，在他们自己的社团中聚居在一起，但却拒绝把自己侷促的生活与移民前的富裕联系起来，就不足为怪了。那些曾共享（尽管三心二意）作为农民和无产者的过去历史的人，现在已经任凭那过去的学问和历史残迹消亡，安心地过着眼下这种清淡的日子了。美国东南部那些讲英语的山民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文化无疑是几代前源自英国的爱尔兰人的，但是，这些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才被发现。他们从未离开过阿巴拉契亚的山谷，对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国家一无所知——甚至连最近的大城镇的名字都不知道。然而，他们却曾是一个传统的一部分，在那个传统中，国王和贵族的斗争曾是举世瞩目的。这些人是由于宗教信仰和政治原因迁居到新大陆来的。

对不同的栖息地的适应，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一群异化了的人——这就是较古老文化的一种衰变，这种现象遍及全世界。南美的印第安人懂得纺纱，然而他们只纺用来装饰身体的线，而不是为了织布。有些民族的亲族关系已演化为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祖先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帝国的成员。有些象玛雅人和克里特人这样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同一个聚居地上也是四分五裂的，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祖先固有的文化。

所有这些变化都改变了文化的性质。我想，如果对变化的本质加以区别，对变化的突破点加以区别——即在某一点上人们就不能再说某一种文化是后象征文化，而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一个后象征文化，或各方面都保持着后象征文化的特点但正处于语言和忠诚大变革之中的文化，其唯一基本的、明确的特点就是一个群体中至少有三代人信奉这一文化。故此，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周围的人所毫无疑

义地接受的一切也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在这种环境里，文化的模式以及必须学习的、具有内在连续性的举止有着重大的价值。但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人们所意识到：人们注意和品评的只是圣诞节糕饼，但马铃薯上的盐有多少却被忽略了；人们只注意了谷仓上防止牛奶变酸的彩色魔环，却忽视了干草堆和牛奶棚。对于男人与某些牲畜的优待，男人和女人之间细微的差别，起床和睡觉的习惯，攒钱与花钱的方式，对快乐与痛苦的反应——这些都是重要的遗传行为，对它们进行分析就能表明其连续性和普遍性。但它们都处于无意识状态，正是这种叫不上名字的、难以言喻的、无意识的特性才使后象征文化或所有文化中后象征的方面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那些在成年时期才学习一种新文化的人也具有大量的后象征型的专门知识。实际上，谁都没有教过那些从另一个国家来的移民怎样走路，但是，当一个女人在新的国度里去买衣服并学着穿它们时，起初她是按照在街上看到的其他妇女的着装方式硬把它穿上去的，随后，她便调整了穿衣的方式，也就是必须把衣服从头上往下套，而不是从脚下往上套——她开始学得了新国度中妇女的姿势和态度。其他妇女对此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渐渐不再把新来者当作陌生人，而是当作自己人了，带她到自己的卧室去，互相推心置腹。正如男人穿上奇怪的新衣服后，便学会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两手插在口袋里站着，以避免引起议论和反感。这个过程是累进性的，在许多方面都象处于某种文化中的儿童学会怎样做才不会触犯规矩、才不会引起议论那样，这个过程显然是毫不费力地、下意识地完成的。在一群人中倘若只住着一个生人，那么这些人正如一辈子都在一个单一文化中生活的老年人那样，几乎不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有什么疑问。

缺少疑问，缺少觉悟，这是保存后象征文化的两个关键条件。后象征文化在经过自我意识的混乱与反抗后重新建立的频率使人想到，这是一种我们仍然能够利用的形式，就象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利用它那样。文学记载与历史，档案与法典中的所有不一致的地方都能被系统重新吸收。由于它们是不容置疑的，是处于意识面以下的，故此不会受到分析的威胁。

这种无法分析的文化行为离观察者愈近，就愈难辨认，即使是有实践经验的、受过充分训练的观察者亦概莫能外。在第二次大战中，对日本、中国、缅甸或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阻力相对变小了，但不包括那些采用不同观察方法的观察家（即所谓“老中国通”）。不过，这些愿意接受对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分析结果的知识分子却令人不解地，颇动感情地反对把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同样包含许多无法分析因素的欧洲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分析的反感使任何一个欧美文化的成员认为自己是一个行动自由、没有文化约束的人，反对对有关的文化特点（如德国的、俄国的或英国的）进行分析。

突然认识到在自己的环境中，在那些教育水平与自己相同的人里，也有一种既定的后象征文化行为，这是极有启发性的。不管人们如何强调自己相信与种族和阶级有关的行为是后天所学，而非先天遗传的科学论断，但有一种未经分析的信念却根深蒂固，即认为体型与自己差别甚大或在不同社会层面生活的其他民族，其遗传方式与自己也有深刻的差别。只要在一致性方面的差别范围过大，人们就求助于遗传的解释。大部分人都觉得那些与自己差别甚大的人，其差别一定是继承而来的。因此，当人们最终承认，体型相同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行为中的令人费解的各种因素应该从文化角度加以解释时，那种从遗传角度理解文化差异的认

识竟然就被当真了。

如果想使对文化的了解能成为人类学智慧手段的一部分，成为能使人类学蓬勃发展的流行看法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对那些深藏的、未经分析的、难以言喻的连续性行为进行分析。这种连续性行为是从无可置疑的长者那里学来的，或是转入一个新文化后，从那些无可置疑的成员那里学来的。人一旦认识到他们讲的语言与邻人的语言不一样，而邻人的语言已经被孩子学会，生人也能学会，那么，他们就会学习第二种和第三种语言，创造语法，并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语言。就此而言，人们早已认识到语言是文化中与遗传没有关系的部分。全面地了解另一种文化，了解感情的最深层组织，了解态度与姿态中最不引人注意的差别，这与了解另一种语言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要作全面的分析需要不同的工具——运用天生具有分析力的眼睛和耳朵，即照像机、录音机和分析仪器。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各种形式的后象征文化和代表了渔猎时代至今的各个文化历史的成功阶段的民族。我们已具备了对它们进行研究的理论和手段。原始人、不善言词的农民、边远农村和城市贫民窟里的被剥夺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虽然不能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还是可以把照像机交到他们手里，以便他们帮助我们记录下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的東西。可认识的过去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在千余年的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之后——在此期间，人类向父母学习旧事物，向同辈人学习新事物——我们已达到了人类文化演变中的一个新阶段。

## 第 三 章

### 互象征文化和熟悉的同代人

互象征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社会成员的主要模式是同代人的行为。不过，只在极少数的社会中，互象征性才能成为唯一的文化传播形式。这种模式在已知的社会中没有一个能保存几代人以上。在一个只有互象征模式的社会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同样认为新一代人的行为有别于前一代是“很自然的”。

在所有互象征文化中，老年人仍然处于支配的地位，他们树立典范，规定限制范围，年轻人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互象征性不得超出这些范围。在有些社会中，对于新行为是否被接受，老年人的认可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对变革的最后赞同，年轻人不仅要注重自己的同辈的态度，而且要看老年人的脸色。但与此同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一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要以他的行为给同代人作出榜样，尤其是给青少年作出榜样；他们的行为应不同于他们的父母和祖辈，当每一个人成功地表现出一种新风格时，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己那一代人的典范。

互象征性起初是对后象征系统的突破。这种突破可以有许多方式：或是经过一场大动乱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地位十分关键的老年人死伤惨重；或是新形式的技术发展的结果，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不在行；或是由于迁徙到一个永远把老年人视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国度；或是一次军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

不得不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结果，成年的皈依者试图培养儿童去体现新的观念，而他们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未曾有过这种经历；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为年轻人引进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经过高度文明的发展后，一个互象征型文化中进行变革的条件变得越来越有优势，一旦具有较丰富的资源，就可能使一个社会的成员对其他社会的成员进行吞并、征服、收编、奴役或使其改变宗教信仰，并能对更年轻的一代的行为进行控制或指导。然而，互象征作为一种类型常常只能持续一个短时期。在统治群体的文化类型是后象征性的情况下，新群体的第二代成员（其父母除了同辈人的模式之外，没有特定的模式）也许会完全被一个不同的、但仍然完全是后象征的文化所吸收，出生在以色列集体农庄的儿童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大量初期教育不同、对期望的东西也不同的成年人进入一个社会，会使这个社会的文化发生重大变化。倘若这是一个显然是靠继承而不是靠学习的社会，那么行为与生来便有的成员资格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牢固了。此外，如果被较老的居民所吸收，新群体仍然保留着自己文化的某些部分，那就有可能区分出哪些是生来就有成员资格的儿童，哪些是刚被吸收进来的儿童。那种认为大量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被同化的观念也许会为差别提供新的灵活性和余地，但这也会刺激反措施的发展，如会为特权阶层划出一个更严格的范围，以防新来者获得生来便有成员资格的特权。

故而，对不同的文化吸收加以比较是有益的。若吸收采取的是奴役的形式，则通常大群的成年人将被暴力胁迫，离开故乡。他们遵从大部分自己的习惯的权力被否定，他们的行为将受到奴

役他们的人的控制。原始非洲人的社会就大规模地采用奴役方式。在社会内部，奴役被当作一种惩罚性的措施。但即使是来自其他群体的奴隶在文化和体型上都与奴役他们的人相似，在许多情况下，奴隶也有使自己不遭忽视的权利。在一个相对的短时期内，被奴役的家庭及其子孙便被吸收进自由的社会了。曾遭奴役的耻辱仍然是家族史上的污点，人们会采用各种花招作为逃避过去的手段，但是，文化或外貌的差异并不能限制出生在该文化之中的奴隶后代加入到该文化之中去。

有的吸收则要求年轻移民的行为方式与他们的祖先要有明显的不同，美国和以色列就是这种吸收的典型。在以色列，从东欧来的移民把老年人（即与成年子女同住的祖父母）甩在一边。他们对老年人越来越不尊重，把老年人归到不再有权力并遭到某种忽视的一类人中；这种现象突出地表明，老年人不再是年轻人行为的智慧或典范的守护人了。

在后象征文化中，年轻人也许会在不堪一击的老年人面前颤栗战栗，也许会对老年人所代表的智慧与权力艳羡不已，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终将获得老年人现在所具有的一切。但是，对移民的后代来说，不管这种迁移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老年人对穷困与压迫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还是盼望过一度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祖辈人毕竟是代表着已被抛在身后的过去。看到他们的祖辈，这些儿童便明白他们决不会按着这些人的脚印走下去，而通过与自己父母的联系，他们也明白，这些老年人在另一个环境会是什么样子。

在变化缓慢的社会中，微小的但可辨认的行为变化使一代人有别于上一代人，但这种变化可以被处理成方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使之成为无足轻重的革新，如年轻人在服装、风度或不会让老



年人操心的消遣等方面的变化。在新几内亚，人们不断地借用新的方式或相互搞交换；一个部落中的所有女人无论老幼都采用一种裙子的新流行式样，前片长，后片短（或前片短，后片长）；或者老年人仍然穿着过时的裙子，坚定地把它们当作老派的标记。在主流文化形式内搞一些小花样基本上无碍大局。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少女们都知道她们将走祖母的老路。等到她们成了祖母后，她们也会赶赶新时髦，或让年轻人去试试成功的新时尚。在时髦的观念下面潜伏着连续性的观念。对时髦的强调反而会肯定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变化。

在新几内亚的文化中，分辨不出哪些变化与文化的核心有深刻的关系，哪些变化是肤浅的，一生之中会发生许多次，但不会触及核心。在整个地区中，形式的借用与抛弃基本上有一种共同的性质，许多因素从这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都是按照以前同样的线路进行的。对新几内亚文化的分析表明，表面上不断的小变化实际上会在较深的层次产生很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相反，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一代的经验与他们的父母、祖辈和社团中其他年龄较大成员的经验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在一个移民群体中，不管年轻人是第一代本土出生的，还是在新的宗教崇拜中头一批出生即有成员资格的，抑或是由一个成功的革命者群体抚养起来的第一代，他们的祖先都不能向他们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生活模式。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那些第一次进入一块新的土地或新文化类型的人的子女们所搞的革新具有适应性的特点，年长的人可以把这种特点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有目的的活动的一种继续，而他们发现自己不具备在新国家的经验，对新的宗教信仰或革命后的世界不熟悉。事实上，年长的人都是名符其实的移民。他们在森林中

伐木，开垦荒地，修建新的定居区，在这里，成长中的儿童将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这些刚刚站住脚的成年人经常地把鸟鸣和季节搞错，但他们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他们能较好地适应自己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不是成年人挑起的。相反，冲突的起因是人们发现抚养孩子的新方法对于形成一种符合第一代入愿望的成年作风是不够的或不合适的。

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或以色列去的移民发现，他们几乎无先例可循，因此，他们抚养孩子的方法无不经深思熟虑：父母应当给孩子留下多大余地？应当允许孩子走到离家多远的地方？父母怎样才能象当年父亲控制自己那样去控制孩子？拿取消继承权来威胁吗？不过，尽管年轻人是在新环境中成长的，尽管他们在自己中间逐渐形成了牢固的联系，尽管他们要在外部世界的新环境中挣扎奋斗，尽管他们的父母在头脑中已渐渐把祖先抛到九霄云外，但是，年轻人之间的榜样作用也许依然是不可言传的。在美国，一个儿子接着一个儿子，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皆由于与自己的父亲意见相左而出走西部或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去了，然而，大部分家庭中的这种循环不已的斗争却造成了正常的父子关系的出现。

有些社会中，各代人之间的对立非常激烈，并表现为坚持分居时或控制权易手时的长期冲突。这种冲突在大环境改变后仍有可能发生，而它一旦表现为文化并获得承认后，便会成为后象征文化的一部分。曾祖父离家了，祖父离家了，轮到父亲时，他又离家了。或反过来，祖父讨厌他父亲送他去的那所学校；父亲亦然，但还是照样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所学校去，尽管他完全料到儿子会讨厌那所学校。当代与当代之间的破裂出现时，缺少年长者经

验的年轻一代一定会互相交流感受。在人类历史上，这一过程是非常古老的，在任何社会中都会一再发生，其结果就是经验连续性的断裂。随后，由于年龄等级的确立，或使这种在成熟的某一阶段的反抗制度化，这种互象征性的插曲便会被吸收。

然而，由于某些其他群体——如一个取得了优势地位的团体，一个在宗教信仰或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一个长期居住在该国或该城的居民，后来者在他们中间不过是移民——的成员已经树立了行为榜样，致使家长面临子女在行为方面发生某种变化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力和他们本身愿望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他们被迫鼓励自己的子女成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让子女离开自己，去学习新语言，新习惯和新举止。从父母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意味着形成一套新的价值标准。

长者把新的传统传给了这些孩子，然而这些长者并不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也不是他们的移民团体或他们出生的那个拓居地的成员。这些孩子常常难以全面打入新文化的家庭生活中去，而他们的父母则根本没有这种机会。但是，随着孩子上学、工作或服兵役，他们就能够接触同辈人，并把自己与他们加以比较。这些同辈人给他们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这是那些长者难以做到的——那些教师、官员或军官们的过去与他们完全不一样，这些孩子将来也很难谋到他们那样的前程。

在这种情况下，新来者发现他们那些属于这个系统的同辈是最好的引路人。这种情况就象是一所公共机构（如监狱和精神病院），同住者或病人之间，掌权的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间都有着明显的断裂。人们通常都认为，在这种机构里，看守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医生和护士与囚犯或病人的差别极大。因此，新来的人就以老囚徒或老病人的行为为榜样。

在特权社会（如传统的印度）中，在一个阶层内部有灵活性，但在各阶层之间却没有。在一个基本上是后象征文化的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成员住得都很近。阶层之间的界线不得超越——即不能取得另一个阶层成员的地位、特权和行为标准——这种情况使得儿童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们的认同概念中可以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在大多数社会中，对男孩和女孩的抚养都能收到相似的效果。每一个同性别的成员都能把不同性别的人的行为视为反面的观念而加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跨越性别界线的行为——如男人选择了一个被认为是女人所从事的职业，并因此被视为有女子气，或女人企图从事一个男子气十足的职业——都会导致一种不同代人之间的混乱和冲突。

此外，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人们对灵活性的指望甚大，不同代人之间冲突的问题就成了流行病。年轻人摆脱了其父母的地位，那么，不管他们是贵族社会中的农民还是中产阶级，也不管他们是过激派组织的成员还是种族集团的成员，他们都必须摒弃其父母和祖父母为他提供的后象征模式，寻找新的模式。这一过程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在某些社会中，少数村民或农民进城去学习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这些人把城市的行为方式与农村的行为方式一视同仁，并不把城市的行为方式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的方式，他们并不割断与自己原有教养的联系纽带。在城里住若干年后，这位小官吏便退休回到自己的老家，又吃起了同样的食物，按照父亲的方式打发日子。

但在大多数有阶级的社会中，职业和地位的改变将伴之以行为的改变，也会导致性格结构的改变。通常，当父母为子女选择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和新的职业目标后，随着接受教育，子女首先会导致与父母的作风的决裂。不过，其结果是受不同情况的制约

的。当这样的青年人数量大很大时，他们就会互为榜样，拒绝新环境中的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把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当作对立面来加以哄骗，不听从他们的教诲。当新手、学生或新兵人数不多时，他们就会以大多数人的行为为榜样。有时，形单影只的青少年会紧紧依附一位在走向成年的道路上能提供几分支持和指导的老师。

青少年与良师的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联系能够对青少年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但也会使年轻人与自己的同辈人格格不入。他们不仅无法接近新同辈人的行为，而且也会放弃原来阶层或文化群体中同辈人的行为。他们无法充分适应新的环境，而且返回出生地时，也无法重建与那里的联系。相反，那些在学校中积极参与新事物，能自如地与同伴交往的少年，当他们短期返乡时，也会把这种从容感传给家乡的青少年，但一个孤独的、时刻受到成年人照料的学生返回故乡后，似乎与他的伙伴们合不来。一群男学生有了自己的风格后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弟弟们——当然也包括妹妹们——的榜样，他们发现按着长兄们的道路走下去是“理所当然的”。

具有不同的过去经验的外来者侵入任何年龄阶层都会不可避免地会在军队、学校或修道院系统中带来变革，整个年龄组常常会有与他们的军官、教师或修士们截然不同的目标。新来者会引入一种与生而有成员资格的人相反的行为方式。或许，他们引入新的俗语和新观点，发展与本地人不同的风格，成为本地同伴的榜样。互象征行为显然既不依赖过去，也不指望将来，所有行为都受派系或团体行为的控制，因而它必然是肤浅的，与童年时期的后象征经验没有关系。定期离家，有意切断青少年与其父母和地方群体的联系，已成为从事特殊职业的标准化的准备工作，而这

种分离本身已制度化。英国寄宿制学校的孩子发现自己不可能经常与父母交流自己在校的经验,即使他知道父母的经验是相同的。各自经验的高度一致性也许会成为父子间的隔阂。

青少年学生强调同龄人的共同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文化现象,一种是互象征行为制度化已有数代人的文化,如,一个年龄等级已制度化的社会;第二种正好相反,是一种大多数青少年从经验与之不同的父母那里找不到榜样的文化,他们必须极大地依赖所有能给他们以新团体成员意识的微小的外部提示。在这两种文化里,都会发生有关共同点的讨论。

在形式最简单的互象征社会中,祖辈人是不存在的。从国家的这一地区迁移到另一地区的年轻的成年人要么对他们的父母弃之不顾,要么在他们转移到新地区时,把父母留在老家。在一个现代的、流动性很强的社会中(如美国)也很可能不存在祖辈人,在这种社会里,老年人和年轻人都频繁流动;或者,在已经工业化、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富人和很穷的人都可能把老年人送进特定的住宅或区域里。

祖辈人能够回忆过去,能决定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儿童们的经验向哪个方向发展,也能以无言的行动巩固旧文化的所有价值。当这些老年人不存在的时候,向一种新生活方式——要进入这种生活方式必须学习新技巧和新的行为方式——的转化就容易得多了。不存在祖辈人也意味着不存在封闭性的、狭隘的种族社会。相反,当一个种群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社会时,如果祖辈人是这个种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则社团内部的密切联系便能使该移民社团保持完整性。

年轻的成年人一旦自己出走,并与新的生活方式取得新的联系,那么,表亲之间的联系也会被削弱。只有通过祖先团体的联

系才能使年轻一代之间保持有活力的接触。在美国，活着的叔叔阿姨通过与他们的姪甥辈保持关系，也能使表亲之间的关系保存下来。他们故去之后，表亲之间的关系也就淡漠了。

随着祖辈人的逝去——离开了抚养子女的世界，儿童们未来的经验便缩短了一代，而 they 与过去的联系也被削弱了，后象征文化的基本特征，即个人与其子女或与其父母的逆向关系便告消失。一度曾由活着的人所代表的过去变成了模糊的、易于抛弃和易于篡改的回忆。

由父母和年幼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灵活的社会团体，在这种状态下，居民中的大部分人或每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当移民或先驱者离开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年长的亲戚，被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包围时，他们就比较容易适应新国家的生活方式，比较容易采取新的措施。同样，由于所有的新来者都学会了新的语言和新的技术，接受移民的国家也能吸收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们的特殊技巧，并能彼此加强对新生活方式的信仰。

在那些必须有所变化，而且要快变的大型组织内，退休措施同样是社会需要灵活性的表现。排除年长的军官，年长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那些靠其本身、其记忆、其与年少者牢固的关系而巩固过时方式的人，与家族中排除祖辈的人有着同等的意义。

凡是在没有祖辈人或祖辈人失去控制权的地方，年轻人便会堂而皇之地蔑视成年人的标准，或采取不同于他们的态度。青少年扮演着有限的、自我标榜的角色，而比他们更年轻的团体则是他们的观众，全面的互象征性站住了脚，树立榜样的人比向他们学习的人只大几岁。

如今，在新几内亚的马努斯村庄和阿默勒尔蒂人(Admiralt-

tes)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1928年时,那些外出当非熟练契约劳工的年轻人回来后,又重新被原社会所吸收,更年轻的少年象他们一样,也想出去工作并打算再回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这些少年的榜样。不过,现在那些返乡的男女学生用他们的校服、半导体收音机、吉它和教科书为另一种生活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面。虽然村子里已经有了小学,但只有那些寄宿校的返乡学生才能给更小的孩子树立榜样。尽管已经获得了成年人的赞许,但他们几乎无法帮助更小的孩子确立激进的新行为方式。

新几内亚坦布南的伊阿特莫尔村(Iatmul)的情况有些不同,1938年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并于1967年又作过一次短期访问。那里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出外为欧洲人工作已有十五年以上的历史了。过去,他们几乎总是结成一小伙外出的,或是由招工者从洋洋得意的父母那里“带走”十来个男孩子,或是一伙朋友们不顾老人的反对而出逃。通过其他童工的介绍,他们到种植园、矿山和轮船上去干活,而介绍人也是一个临时的同龄人团体的一部分。他们全都远离自己的村子,在那里,那些被招募干三年活儿的男孩子进入了一个完全的互象征社会,这里的规矩是用一种新语言——洋泾浜英语(现在被称作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的。

他们的两重天地——童工的天地和故乡的天地——截然不同,但当他们回到故乡后,仍会重新被吸收(尽管困难很大)进故乡那个变化迟缓的生活中去。不过,他们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还能表现出那种截然不同的童工经验。在出外干活的那三年中,只消三言两语就能使他们在服饰、举止、行为等方面无一不奉行童工的方式。反之,他们一回到家,原来的生活方式的细节,包括过去他们的父亲参加猎取头颅的袭击时的回忆就会复活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大城镇里也形成了来自农村的伊阿特莫



尔人的小移民团体。现在，少数人居然把老婆孩子也带上了。年轻人不仅出外工作或出售雕刻品，而且也出游。在远处的城镇里，他们开始发现有一种可以经人介绍而加入的小社会；介绍人可以是年长者，也可以是那些与他们同样在童年时期接受后象征教育的同龄人。

坦布南是一个后象征文化的社会，那里的男人为他们的过去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为自己树立了高标准，而且也为上学的儿童树立了高标准。他们相信，这些孩子应由白人教师施教，也能象白人那样生活。每一代男人都能适应变化，但谁都没有失去连续意识。

姆班是村子里最年长的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曾当过童工。现在，他完全保留着传统的形象，他是一位传统技巧的大专家，也能讲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明确地说，他们这一代人一死，过去也就完蛋了。

汤米在三十年前就是村里的政治领袖，他却有着颇为不同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当时是德属新几内亚的地区工作过，不是在种植园当童工，而是在帕金森太太家干活。帕金森太太是《南洋三十年》(*Dreissig Jahre in der Sudsee*)的作者理查德·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的妻子，她有部分萨摩亚血统。帕金森太太曾帮助建立了一种风格，即介于土著人的过去与新的德国殖民者风格之间的一种过渡性风格。汤米在她的模范家庭中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被放逐的土著，他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结婚、生活了。然而，当他返回坦布南后，却成了一位政治强人。他坚定地反对慈善机构和教会学校，但在与政府搞好关系方面却开创了先例。他不仅会讲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从他那独特的经历中也学会了从容地与白人打交道，并以管理他的事务为乐。

1938年，他是我们在村中时的主要咨询人。

1938年时，凯米·阿萨维是我们住的那个家中最小的儿子，1967年时顶替了汤米的角色，帮助我们这伙人搞家务。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凯米·阿萨维在土著警察中是一位相当负责的人，管理着被拘押的日本战俘。他是作为亲戚被汤米家收养的，他也象汤米一样，以在白人中担任一个职位为乐，然而，他却感到，他和自己的社会有着最深刻的联系。他是汤米选定的接班人。汤米死后，他担任了村里的领导人。他让孩子们排起队伍去上学，在他看来，他是属于过去的，而他们却属于未来。学校虽然不是由年轻人所创立的一种模式，然而它却是通往未来的道路。坦布南在变化中缓慢地前进，但即使是现在，老年人也并不完全自觉地支持一种过渡阶段。

我们可以把伊阿特莫尔人中的变化过程与马努斯人中的变化加以对照。马努斯人是在海上谋生的人，他们从邻人那里取来他们需要的物质用品，非常协调地用它们来改造自己的文化。当我在1928年对他们进行研究时，我以为他们不过是从广为传播的新几内亚童工文化中吸取一些走了样的东西而已。然而，在1946年，当他们在二次大战中与日本人和盟军接触过以后，便开始重新设计了自己的文化，三代人一起进入了一种经过改造的欧美式的文化。

新的马努斯文化是非同寻常的，他们通过由自己的成员所制定的规矩对社会进行改造，使整个社会一举跨越了数千年。但是，我将不把它描述为一个前象征文化，因为马努斯人认为，他们的文化是在模仿一个已经存在的文化，每一个小的变化都是按照欧美（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形式搞出来的。此外，整个社会是在同时行动，与那种老一代遭到否定、抛弃和排除的社会不一样，马努

斯人能完成一种史无前例的变革。在第一所学校创办后的十二年中，他们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教师、职员、翻译和护士，并向在莫尔斯比港新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派出了首批学生。由于在变革的规划中把祖辈人也包括在内，他们就获得了后象征文化的力量，而这是一种对变化特别适应的后象征文化。

核心家庭中排除了祖辈人，与所有亲属的联系都大大削弱了，这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已是现实。核心家庭的集中出现在移民中很典型，因为移民是大批跋山涉水而来的人，不得不去适应新的、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对核心家庭的强调，最终会在新文化中得到体现。即使祖辈人尚在，他们的影响也被降到最低程度了，人们不再指望祖辈人成为孙辈人的楷模，也不再指望父母能牢牢地控制成年子女的婚姻或前程。期望孩子离开或走出父母的范围之外——正如父母已经做的那样——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当迁移到城里或另一个国家的人全都是一种文化的成员时，权力就不再集中在长者手中（他们遭到了忽视），而是集中在年龄较小的团体手中，而第一代的归化儿童确立的生活方式中也许会永远保存着旧文化的淡淡的影子。在这种互象征性中，祖辈人所丧失的东西不会得到补偿。当过渡阶段的成年人进入老龄后，不会重新构成不知所措的三世同堂的组织，除非是在与世隔绝的迷信团体或贵族阶层中才有可能。新的文化常常缺乏深度和多样性，这种状况可能会达到这种程度：例如，美国或阿根廷的许多少数民族的飞地比后象征文化还缺少灵活性，对适应性变化缺少开明的态度。保留老式的方言，在代与代之间恢复亲属间的联系，排斥陌生人等，都是这方面的证据。

在古老的、非常复杂的社会中，尽管出现了激烈的变革，后

象征性的迷信或宗派仍然会生存下来。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竹马崇拜”(Hobbyhorse cult)。在这种崇拜中，参加者带的面具使人想到了最原始的文化。数百年中，这种活动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这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二十世纪中期的风俗习惯同时存在着。

在新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使某一种文化稳定不变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祖辈人的存在将永远不会消失，但人们终将发现那些漠视长者的新方式。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讲究的礼仪就不需要老年人的知识和神秘的睿智。爱斯基摩式的长途跋涉和家庭间的互访对于发展那些迅速而有效的手段(它们适用于到新地区狩猎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学习的方式有赖于对某个地区的长期了解，并把这一地区赋予超自然的意义。而爱斯基摩人与他们不同，他们发展的是一种迅速交流信息以便能自由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一个新地区的学习方式。他们不需要让老年人当作知识的储藏库。爱斯基摩社会是建立在二世同堂的基础上的。老年人成为负担、威胁到年青人的生存时，就选择死。在美国或英国，青春期已过的煤矿工人在他们的只居住着矿工的、局限甚大、控制甚严的社团中就不能再扮演活跃的角色了，这是一个照搬爱斯基摩人方式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有些地方的农民会把土地转交给已婚的儿子，其意在于让儿子保证一辈子照料自己的双亲。但这种保证有时却并无约束力，老两口可能会成为流落街头的乞丐。

许多第二代或第三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不履行对老人的所有责任，这与制裁手段的丧失有关。至死都能控制财产的老人一旦亲手破坏了制裁手段，那么，他们的老人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恢复

了。同样，那些由于医疗条件较好而意外长寿的老人也可能会面临下一代人放弃责任的局面，那样，他们就得作好更糟的准备。所有适应性的转变都伴随着可能性的变化和后象征文化特点的深度的缩减。

在新国家中或新局势下，由于条件的迅速变化，男人和女人都可能会发生极端不同的变化。对那些从一个农民社会中或从狭隘的佃农生活中进入纷杂的城市干粗活的人来说，新的谋生方式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妇女由于要继续做饭、养孩子，她们的状况也许不会有什么改变。在这种环境中，由妇女传授的那部分文化会保存下来，这部分文化在儿童的早期造就了他们的特点；与男人工作条件的激烈变化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则会发生极大的改变，这部分文化也会对儿童特点的形成产生影响。

文化的区分不仅与祖辈人或其他亲属的地位的重要性有关，而且也与祖传子，子传孙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或缺少的连续性有关。譬如，凡是在生活方式转移的地方——例如，从前是一个妻子坐地招夫，因而使母女关系变得极为密切的文化，现在变成了一个女儿出嫁到男方的文化——这种文化中的手工艺的风格便会失去其连续性。反之，某些歌唱形式的极端保守性——阿兰·洛马克斯（Alan Lomax）在对世界歌曲风格进行对比研究时已发现了这种实例——可以部分归因于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唱给孩子听的摇篮曲，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这些摇篮曲却不变。

抚养孩子中的保守性也是某些文化的特点，在这些文化中，人们把儿童当作婴儿来照料，而年轻人则与刚刚离开保姆很接近。保姆对她们所照料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施加什么影响；她们愿意抱着她们所照料的孩子，有病给他们喂药，但却不

愿教他们如何自立成人。在高度复杂的文化中，农家保姆使孩子与其祖先保持密切的联系，把刺激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她们也会对孩子的个性施加保守的影响。

当学校是迈进社会的第一步，大同学成了小同学的保姆时，文化就可能以几种方式瓦解。大同学既和那种传统的、整日进行的教育方式无缘，也和老师那种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无关。当然，倘若富人家不再用农妇来照料其子女，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会出现一种新因素。有其他重任在身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偏高，但缺乏耐心，愿意让孩子保持依赖性，总爱把孩子看得很小；此外，他们给孩子树立的模式是技巧性较高的，比较复杂的。

儿童教育中的阶层或阶级成分会在不同的阶层或阶级之间带来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在美国的东南部，上层社会白人的孩子是由黑人保姆抚养的，白人孩子便获得了一种与黑人接近的意识，而保姆则学会了以不同于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对待托付给她的孩子。这两个相互影响的群体之间存在着的那种亲昵关系，在不雇用仆人的白人中和不作家仆的黑人中是不存在的。现在，使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距离增大和敌意加深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新的隔离——雇用仆人的家庭减少了，当保姆、当看守人的黑人或以前曾由白人护士、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照料的黑人也减少了，失去了与白人社会接触的机会——没有新的接触形式取代这些旧有的养育关系。

在美国，跨越阶层和跨越阶级的旧关系的那种保守的、稳定的影响正在迅速消失。自二次大战以来，新的居住格局，教育的变化，许多美国人对奴仆性工作的拒绝，从事其他职业机会的开放，都促成了那些比较陈旧的关系——即符合核心文化标准的人

与因肤色、教育、社会孤独性或个人选择等原因而不符合核心文化标准的人之间的那些关系——的崩溃。

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在抚养儿童时只重视与儿童成熟有关的时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地区的人对这些时期的选择也不同。每一地区所重视的内容反映了各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代人中不同年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重视的内容也随着占支配地位的代与代之间的格局而变化。在强调早期训练与食物有关的文化中，母亲和祖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在有的文化中，男孩的训练是控制身体和发展手工技巧，这种训练开始得很早，而且与获得男子的技巧有关。男孩一开始学走路，学说话，父亲和祖父就变得很重要了。一旦到达男性品格和女性品格开始分家的程度，男孩和女孩的训练方式也就不同了。

当新的文化形式在移民中确立起来时，当原始人或农民由政府直接加以控制时，或当新的、不同层次的文字和技术被强加给一个民族时，强制学习新方式的发展阶段与过去是不同的。新的强制点也许是在年轻人离家服役的时候，也许是在青少年离开乡村学校进入地区学校的时候，也许是在六岁的孩子进入一所以外来方式施教的乡村小学的时候。变化的最初冲击也可能随着养育婴儿方法的改进而来到，而养育婴儿的新方法是政府派遣的公共保健人员进驻很少发生什么变化的村庄时带来的。

凡是有互象征现象发生的地方——在那里，年轻人受到的训练是模仿他们的城市伙伴，学校里的男孩子是以新方式加以培养，或农村小学的学生受的是追求另一种社会模式的教育——那么，初来者的年龄和身份，以及这一群体在较老的后象征文化中的位置与身份就很重要了。如果一个群体在儿童教育中已经有了变革的意识，该群体便能在巨变中完整地生存下来，否则，该群体在

文化中的角色就会被完全颠倒过来，东欧的以色列人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况。按照欧洲的方式，乘龙快婿要由女儿的父亲去找；按照美国的方式，却是有出息的小伙子去找有钱的父亲的女儿。对变化的期望愈大，对引入破坏性的互象征文化的可能性就愈小。

随着每一个非英语移民群体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其成员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特殊的文化传统。这一过程的完成，儿童的教育是关键。父母控制不了新的学习；不过，他们在本乡本土时，也控制不了正式的教育。在美国，他们不得不任凭孩子自己去上学，不得不接受孩子们对什么是正确的美国行为的解释。孩子们只能以老师的教诲和同龄伙伴的榜样为指南。最终，移民子女的经验与全美国儿童的经验相一致，而美国儿童的经验代表了新时代的新文化。因此，他们的地位是相当权威的，树立了能与父母一代分庭抗礼的模式。

一个迅速变化的条件能产生几种类似的结果。在印度、巴基斯坦或非洲新国家这样的国度里，儿童也是新方式的权威，父母失去了判断和控制的权力。但如果变化只发生在一国的范围内，则旧文化的联合重压、文物遗迹对旧文化的恢复力和祖辈人的存在，都能对儿童所宣称的新权威加以调整。然而，在那些由多种移民组成的国家里，互象征的影响便会加倍，父母们在时空方面都被取代了，他们发现：保持任何控制的想法，甚而至于相信控制是可能的或值得一争的想法，都会遇到双倍的困难。

凡是在整个文化中，同龄人中的互象征现象已经制度化的地方，人们会发现青年文化的现象，或曰“青少年”文化。由学校系统所鼓励的年龄分层变得日益重要。在美国，到二十世纪初人们才感到了互象征现象的广泛的文化影响。核心家庭建立起来了，孙辈人不再希望与祖辈人关系密切，而父母由于失去了支配性的



地位，便把建立标准的任务拱手交给了儿童自己。到了1920年，风格的建立权开始转向了以每一代成功的青少年团体命名的群众团体，父母的约束权交给了更广阔的社团。到六十年代时，这一变化的影响就是新一代中产阶级的某部分变成了类似少数民族团伙的组织，它们相互斗殴，与大城市的警察搏斗。从文化角度讲，互象征成了流行一时的、占优势地位的模式，连少数年纪大的人也装出了与现代文化有关系的样子。父母们不管如何妒忌，还是打算满足子女的迫切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学校或其他孩子教给的，而是群众团体教给的。

有些社会有意利用互象征的各种可能性来引导青少年或成年人加入并非抚养或训练他们的团体，这样的社会对新的适应常常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引导一旦正式化——如各种类型的见习期，入会仪式、预备役的训练阶段和职业训练——就会成为集中的儿童教育的一种形式，或一种全面的后象征经验。它在教与学方面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手段。

在一个仅有两代人的核心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知道，他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不同，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会与他们不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还有一种期望，即期望儿童的训练充其量只是进入各种团体而不是进入家庭的部分准备工作。总之，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核心家庭里，以及对引入新团体的影响的体验，会使人们产生一种生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意识。对家庭中代与代之间的变化和进入新团体所导致的社会变化体会得越深，社会系统就变得越脆弱，个人的安全感就越少。但是，为不稳定局面提供了理论基础的思想的进步，使社会能够承受上述的状况。迁居美国的移民盼望他们的子女能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比他们自己更成功。正是这种盼望支撑着他们与变迁中的种种困难

进行斗争。

故此，在我们这种社会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在教育 and 生活方式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代与代之间的断裂。然而，当年轻人脱离父母的阶层后，会与上两代成年人所共有的某些价值相遇。这些被所有成年人所持有的不变信念的特点是无法分析的，就象在后象征文化中的情形一样。在与世隔绝的社会里，重建僵化的成年人舆论要相对容易，但在当今互相联系的世界里，则只有靠铁幕或竹幕才能保证表面的一致。现代社会的一个较重要的特点是后象征的早期形式的消失，与此同时，企图重建不可分析的共同民意和毫不含糊的忠诚的情况会周期性地出现。建立某种能够垂之久远的理想生活方式的途径就是作排外主义者、革命者的追随者，或依靠那种试图建立封闭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狂热。

现代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承认各代之间的断裂，承认每一代新人都将经历技术不同的世界。但这种承认不能将其范围扩大到承认各代间的变化都是一种新秩序。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两个文化群体，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抚养他们的孩子的：既希望他们流动，学习新的语言，又不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文化认同意识。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其他许多文化中，抚养孩子的方法与此基本相同，希望孩子在不变中求变化。如果承认年轻一代或他们的某些团体的价值与他们的长者的价值是不同种类的，那么，单是这一点，就会被视为一种对道德、爱国心和宗教价值的威胁；他们的父母就是用这些价值来支撑后象征性的、发自其内心的热情和刚刚以后象征方式确立的、抵御外来势力的忠诚。

成年一代总是假设各代人对真、善、美都有着一致的看法，人类的本质——即内在理解、思维、感情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永恒的。当然，这些信念与人类学的发现的全面鉴定结果是不

一致的。人类学可以用资料文献证明，技术与制度形式的革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化特征的变化。人们惊讶地看到，求变的信念是多么容易与不变的信念合流，即使在那些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成员承认历史不仅由目前的理想结构而且也是由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所构成的文化中，也会发生上述现象。

当代对人类的困境(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新机会)的论述并不能预见文化变革和文化传播的新机制的出现，而这些变革和传播与我们所熟悉的后象征和互象征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形式正在出现，我把它称之为“前象征文化”。据我看，现今的儿童面临着一个完全未知的，因而也无法掌握的未来，正如在一个稳定的、老年人控制的、以父母为榜样的、在许多方面含有后象征因素的文化中，一代人发生了互象征性的变化一样。

我相信，把先驱者的模式——即第一代先驱移民进入一个未开发的、无人居住地区的模式——应用到我们目前的局势中来，我们就能够或将能够做得更好。但是若说起向宇宙空间移民(即地理移民)的概念，我想我们还是趁早用一个新的移民概念取代原概念为好。

在两个十年中(1940年—1960年)，世事风云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计算机的发明，原子裂变与聚变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成功应用，对行星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极度增长和对这一大灾难是否会继续下去的认识，城市组织的崩溃，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的摧毁，通过喷气飞机和电视将世界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状况，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制造和人类第一次冒险进入宇宙，最近刚刚认识到的原子能和合成原料的种种可能，以及在较先进的国家中，老龄问题转化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有这些都带来了代与代之间的激烈的、不可逆转的分裂。

· 就在前不久，老人还能说：“你要知道，我曾经年轻过，可你却从来没有老过。”可现在，年轻人可以回敬说：“你从来没在我的年轻时代里度过你的年轻岁月，你也不可能了。”这是移民先驱者和他们的子女共同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些四十年代以前出生、长大的人都是现今文化的移民。我们就象第一代移民一样，我们所学过的技巧和价值在这个新时代里仅得到部分欣赏，但我们仍然在政府与权力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我们就象从被殖民化的国家来的移民那样，仍然固守着这种信念：孩子毕竟得大体与我们相似。但与这种希望相抗衡的是一种恐惧：年轻人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变成陌生人，聚集在街角的青少年就象入侵军队的先锋那样可怕。

我们用这种话给自己吃定心丸：“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互相说着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这是不稳定的年代”或“核心家庭是不稳定的”或“电视给孩子带来了许多危险的东西”。我们谈论自己的孩子就如同谈论新国家一样——那些新国家只要一站住脚，就要求有一条飞机航线，要求在各国的首都开设大使馆。“他们还年轻，还不成熟。他们会学会的。他们会长大的。”

过去，尽管有几代人的互象征文化和对迅速变化的可能性的普遍承认，但不同阶级与地区的人，任何国家中的特殊集团所了解的东西，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经验，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相对而言，变化依然是缓慢的、不稳定的。某些国家中的年轻人和—国中属于某些阶级集团的年轻人比某些国家的成年人或属于其他阶级的成年人见闻要广些。但世界上总会有比所有的青年人懂得更多(就经验而言)的成年人。

现在，由于世界上的所有人突然都成了电子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而各地的青年人都共享着一种经验，这是老年人未曾有

过的或将不会再有的经验。相反，老一代的人从年轻人生活在持续出现的变化中的、史无前例的经验里决不会再看到有重复的现象出现。这种代与代之间的断裂是全新的：它是全球性的、带有普遍性的。

现在的儿童是在他们的长者未曾经历过的世界里生活，几乎没有哪个成年人曾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人是未来的前象征文化的先驱者，而在未来的社会中前象征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不得而知了。

## 第 四 章

### 前象征文化与未知的儿童

六十年代的动乱分别是由于变化的速度快得令人目眩、家庭的崩溃、资本主义的衰败、没有灵魂的技术的昌盛以及在否定一切的浪潮中，既成权力体系的最后崩溃等原因造成的。在这些原因的背后，有着两类人之间的一种更根本性的冲突。一类人认为，目前的状态就是要强调现存的互象征文化，同辈人是比正在被取代的父母更重要的行为榜样。另一类人则坚决认为我们实际上正处于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

大部分评论家（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仍然认为将来基本上在过去的延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博士仍然认为一次核战争的后果相对而言不会超过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所造成的破坏。道德家把目前的危机与宗教系统的没落相联系，历史学家则指出，文明曾不止一次地在帝国、王朝的崩溃中幸存下来。

同样，大部分评论家把世界各种社会中持不同意见的年轻人都否定现在和过去的现象，解释为青少年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因此，受人尊重的专栏作家迈克斯·勒纳(Max Lerner)可以说：“每一个青少年都必须经历两个关键时期：一个时期是他认为有一种模式（父亲的、兄长的、老师的）作为自己的榜样，第二个时期就是他摆脱了自己的榜样，与榜样作对，再次坚持自己的人格。”勒纳的观点与社会科学家大卫·李斯曼(David Riesman)

的观点有一点儿实质性的差别，李斯曼把自主的人描述为，能够从现在脱颖而出又不与过去断然决裂的人。

也许，对年轻人的反抗有着非凡反应的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他试图让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母，以保持祖辈人所发动的革命的势头。尽管我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事只略知一二，然而，我们所了解到的东西使人想到了一种非凡的努力，即将破坏的愿望（这是全界青年人活动的共有特点）转化为一种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有效的手段。有种种迹象表明，现代中国人也许会把电子学之类的西方新技术同样予以同化，就象中国文明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同化过程那样——电子技术的重要性不会超过一种新形式的冶金术。

有的理论家在解释代沟时，强调过去与现在的平行，而忽视了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变化的不可逆性。他们在对待现代技术发展时，这一点是十分突出的，他们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的影响可以与历史上的某一文明中的技术变革如农业、印刷、灌溉或劳动与法律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加以比较。

当然，抛开变化过程的实质而讨论后象征文化和互象征文化中变化的快或慢是可以的。譬如，当农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子女第一次进工厂时，就表明了一种不可逆变化的开始。但对这种新生活方式的适应却是缓慢的，它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这意味着这样的变化不一定比由于被征服而并入罗马帝国的人所经历的变化要激烈。因此，当我们再把注意力放来各代之间的关系和文化赖以传播的模式类型上时，就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某种情况（如先前种地的开始学打鱼的技术）与现在所发生的某种情况（如美国的海地移民的子女学习计算机程序）进行充分的比较了。

人们只有搞清过程的本质，才能使过去的变化与现在的变化

之间的对比变得清晰。我相信有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搞清楚现代世界发生变化的本质，包括其速度和规模。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的变化与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之间的差别。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世界范围的代沟问题，这是很独特的，古来无之的。在许多国家中——如中国、美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或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些特殊事件不足以解释世界各地的现代青年中的躁动不安。最近的技术变革或由于缺少技术变革而产生的障碍，革命或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对古老信条忠诚的崩溃或新信条的吸引力——所有这些只能对不同国家的年轻人的反抗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方式提供部分解释。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高涨很可能发生在刚从失败中复苏的日本，或那些刚刚与过去的殖民历史告别的国家，而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一个象中国这样闭关自守的国家，由政府明令通告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比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苏联政府平息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要容易得多。家庭的崩溃在西方要比在东方更容易出现。在工业化程度最低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变化的速度比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更显著、更容易被意识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注意力集中到世界范围的青年人的反抗上时，则上述的问题就是次要的了。

把精力集中在细微末节上，只会妨碍对解释性原理的探讨。

相反，有必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产生变化的那些方面上，而不是在那些已经发生变化的方面上。



六十年代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是哪些新条件导致了全世界的青年反抗？”

这些条件中的首要一条，就是世界共同体的出现。全人类在获得别人的信息方面和对别人的反应方面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它是由共享知识和共担危险而连接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在过去的任何时期曾有过由许多小社会组成的单一共同体，其成员的互相了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意识到其他小社会不同于自己的东西都可以使每一成员的自我意识得到提高。据我们所知，在考古学能够鉴定的年代中，不曾有过这样一种单一的、互相影响的共同体。历史上由互相影响的人类集团构成的最大群体，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未知整体的碎片。最大的帝国曾把它们边界向外延伸至这样的地区，那里人民的语言、风俗和特有的外貌都是未知的。在过去那个版图四分五裂的世界里，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样意义上的人的想法，不过是幻想或是一种神秘信仰而已。人可以想象“上帝是在天之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生物学家可以就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问题进行争论，但人类共有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在继续思考和争论之中。

二十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事情使这个问题大大改观了。科学考察的成果完全使我们确信，在这个行星上除了我们这个物种外，就再也不存在具有人的特点的生物类型了。世界范围的快速航空旅行和全球的电视卫星转播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地球上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马上或同时就能够传到其他地方的人群那里。当一位领导人被刺杀或是当在月亮上插上了一面旗子之类的事发生时，艺术家或政治检查员已经来不及加以干预和编辑了。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同体，尽管它还没有组织形式和政治团体可以运用的制裁手段。

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取代了比较原始的能源形式。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使农产品的多样化成为可能，但也使整个行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危险的变化，使所有生物面临灭绝的危险。通过计算机的使用，科学已使智力成果的新的集中成为可能，它使人类开始探索太阳系，同时也为个人（尤其是在有组织的群体中工作的个人）能做出超越前人成就的努力开拓了新的道路。

发展食品资源的革命是世界范围的。到目前为止，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的医药革命使人口激增，以致食品生产的增加仅能使人类不至挨饿。但是，倘使我们能让人口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全人类将第一次达到良好的营养状态。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减少，医药革命开始将妇女从一辈子生儿育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将意味深长地改变男人和女人的未来，以及未来抚养孩子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一代人的一生中），知识变化的冲击是世界范围的。仅在昨天，一位新几内亚的土著人与现代文明的接触也许不过是买一把转了几手才到同村人手中的刀子，或看到天空中一架飞机而已；今天，当他一进入新几内亚最小的边境居民点时，就碰见了半导体收音机。昨天，村中每一位居民还与本国的城市生活相隔绝，而今天，收音机和电视机为他们送来了世界各个城市的声音和画面。

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带着各种相去甚远的文化传统在时代的同一点进入了现在。在全世界，人们似乎都聚集在相同的移民标柱前，每一个标柱上都有相同的指示牌：“您现在从一号门（或二十三号门，或二千零三号门等等）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此外，不管他们是从哪一点进入的，都是进入新时代的移民——尽管有人是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的，有人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进入

的。

他们就象以前那些进入新土地的先驱者那样，缺乏有关新环境的知识。后进入者可以以他们的同辈人为榜样。但在第一批人中间，年轻的成年人只是试验性的适应与革新这方面的榜样，因为他们的过去、造就他们理解力——即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对世界的看法——的文化对现在无法作出明确的指导；他们中间的老年人与过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无法为将来作出榜样。

现在，二次大战前出生和长大的人是时间上的移民，就象他们开疆拓土的祖先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他们挣扎着与新时代陌生的生活环境搏斗着。象所有的移民与开拓者一样，这些时间上的移民也是旧文化的携带者。今天所不同的是，他们象征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无论他们是老于世故的法国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边远的新几内亚部落的成员，无论是海地的农民还是核物理学家，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是老一代的移民。我们是在没有人造卫星的蓝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于去的见解受制于已经发生过的一切。无论我们是完全依靠世代口传的记忆、艺术、戏剧，还是依靠印刷术乃至照像和电影等手段，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一切已经被保存下来的东西改变了。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见所闻的东西、已经过改造的感觉经验和记忆，都限制了我们对眼前事物的认识。我们对未来的想法基本上是变化应被溶入更深层次的不变之中。新几内亚的土著是按照欧洲人提供的文化模式进入复杂的现代世界的，他们也期望以某种方式与欧洲人共享未来。工业或军事规划者曾设想在发明计划中再增加一项能提高人类技能的计算机。但是它只能扩大人类的能力，却未能改变未来。

人生经验甚少的青年作家于二十世纪中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在老于世故、经验丰富的人看来，不过是说假话；对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又比较乏味，不如那些既有人，又有神，还有飞来飘去的伊卡洛斯和代达罗斯<sup>①</sup>的神话故事有趣。大多数科学家与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缺乏先见之明，也没有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那些梦想。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少数人认识到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一天，对于无论伤亡多大但总会有幸存者的战争与一场人类无一幸免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大部分三十五岁的人都没有从感情的角度去理解，不管他们从理智的角度理解得有多深。他们依然不理解灭绝性科学武器的含意，仍以为一场使用更致命武器的战争不过是一场更糟糕的战争而已。甚至连组成了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也并不打算把全面取消战争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只是制止使用某些特种武器，因为这些武器使他们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特殊责任——如在越南使用落叶剂。

在进入现在这个世界时，我们在理解过去、解释目前或展望未来等方面都毫无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长的人都是先驱者，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把熟悉的世界留在了身后，居住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这个新时代的环境与我们所熟悉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思想仍然使我们留恋过去，留恋我们童年和青年时的世界。我们出生和成长在电子革命以前，我们的大多数人都搞不清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在掌权，仍然在控制着对维持秩序必不可少的资源

---

<sup>①</sup> 伊卡洛斯(Icarus)和代达罗斯(Daedalus)都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译注

和技巧，仍然在组织着我们并不懂的各种科学活动。我们控制着教育系统、训练系统和年轻人必须一步步攀登的职业阶梯。在先进国家里，老人控制着年轻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所急需的资源。然而，我们已经越过了航行临界点<sup>①</sup>。我们必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凑合着使用我们的知识。我们正在用新的材料依照老的模式修建权宜之计的房屋。

年轻一代，全世界的已有发言权的年轻反叛者正在痛斥他们所反对的控制，他们就象是在一个新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人。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如鱼得水。他们对天上的卫星是熟悉的，但对战争不会毁灭一切的时代一无所知。使用计算机的人并没有把计算机人格化，他们知道计算机是由人类编制的程序控制的。只要他们一了解事实，他们马上就懂得对空气、水和土壤的不断污染，不久就会使这个星球无法居住，并且会使这个星球的食物无法满足无限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他们知道，控制的概念是可行的、必要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共同体的成员，他们认识到种族和阶层之间的令人生厌的差别是时代的错误。他们坚持认为某种新的社会形式是极为必要的。

他们生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书本上把这些事情简化为单线发展的说法已经不能再束缚他们了。在他们的眼中，杀死一个敌人和谋杀一位邻居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不同意为了拯救我们的孩子就不择手段地用凝固汽油弹去毁灭别人的孩子。平时与战时、朋友和敌人、“我的”团体和“他们的”团体（或“外来者”，“异者”），这些老的区分方式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知道，仅靠一国

---

① 航行临界点指的是，在长途航行时，因所需燃料不足以返回原地而必须继续前进的地点。——译注

人民是不能拯救自己的孩子的；每个人对种他人的孩子都有责任。

虽然我说过“他们懂得”这些事，不过，我也许该说这是他们的感觉。就象一个新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那样，他们只是半懂不懂地听父母讲述过去。正如先驱者的孩子们对那些能使他们父母落泪的记忆无动于衷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些能够使父母深深感动的往事也不会有同样的反应。通过观察使他们明白，他们的长者正在摸索前进，在新的条件下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时，他们总是笨手笨脚、总是常常不能胜任的。早期移民的子女对父母在远方度过的日子，对用不同的工具对付不同的木材有什么差别或锄头在不同的土地会有什么不同都缺少第一手的知识。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老年人使用的工具很蹩脚，既不好用，工作成果也不稳定。年轻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但却觉得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

一位十五岁的德克萨斯州少年香农·迪克森 (Shannon Dickson) 写的一篇随笔，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感觉：

为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寻找出路时，我这一代人的脑子里是一团混乱。

我们把世界看成一只巨大的滚筒，带着战争、贫穷和偏见飞快地转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缺乏了解。

于是，我们停下来思考着：一定还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必须找到它。我们看到，争吵不休的人每天忙个不停，就是为了把与他们相同的人打垮。这些行动集中在一起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宁和国内的不宁。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象机器一样被使用着。我们有责任确立标准，

争取更好的教育，以便能够循着长者的路走下去。可为什么耍这样？要是我们成为照搬前人的一代，事情就会更糟。可是我们怎么变呢？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巨大的爱，我们需要人与人的普遍理解，我们需要思考自身，表达我们的感情，可是这一切都不存在。我试图寻找我们还需要什么，然而我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寻找。因为我刚这样做，就受到长辈和那些既不想听也不愿看的头脑顽固的人的嘲笑。计算机代替了思想，电子仪器正在越俎代庖，这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

我承认，我们应该遵守某些基本的规则，但首先应该搞清这些规则是谁制定的。

有时，我来到一片荒凉的海滩，倾听滚滚涛声和鸟鸣；我似乎听见它们总是在呼吁，在哭泣。有时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但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一小摊事，害怕站下来听，害怕打碎自己的小天地。

答案就在某个地方。我们需要去寻找。

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必须找到它。

现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老年人都不懂得孩子们所了解的东西——不管这些孩子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多么遥远、多么原始。过去，就一个文化系统内的经验而言，总是有一些老年人比所有的孩子都懂得多。现在这样的老年人没有了。不仅作父母的已不能进行指导，就是找遍国内、国外也没有领路人了。老年人不知道近二十年成长起来的那些人是怎样看待这个养育他们的世界的。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奇怪地被孤立了的一代人，正是这一事

实把我们与年轻人分开了。没有一代人了解、经历或参与过这种迅速的变化：各种能源的开发，各种通讯工具的应用，人性的定义，可探索领域的局限性，已知的、有限的世界的确定性，与生死相关的迫切问题——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对变化的了解比任何一代都要多，但我们也反对与年轻人极度疏远；这些年轻人由于他们的地位所决定，是不得不反对老年人的过去的。

早年的美国人必须使自己明白不要耽于对过去的空想，而要集中精力于目前；他们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幻想而要行动的。同样，现在的老年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过去视为不能下传的经历，并且要求孩子不要问起他们的过去（即使这样做使他们很伤心），因为孩子理解不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人有过我们这样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没有什么“子孙”的，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祖先”一样。

在这两个极为不同而又联系密切的群体间的破裂点上，两个群体必然是十分孤独的；当我们面对面时，双方都知道他们决不会经历我们所体验过的一切，我们也决不会体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带来这种过分变化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不会再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出现了。一旦我们发现这个星球只能由唯一的人类居住，就不能不承认这一论断。对整个世界的存在应负的责任一旦落在我们的肩上，就是无法推卸的。我们可以指望年轻人是准备教育他们的子女去适应变化的。但正因为这条代沟是独特的，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老年人既与前代人脱节，也与年轻人脱节了。

这种距离意识，这种与另一代缺乏活生生的联系的感情，有



时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形式。1968年夏，一群美国牧师聚集在瑞典的乌普萨拉与一位真诚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青年攀谈。这位青年是躲到瑞典来的。之后，这些牧师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相信，这些躲到欧洲来的美国青年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年轻人的文化观念是他们这一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又不得不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当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要相信他们的孩子会离开美国，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过去美国是欧洲人的避难地。他们讲这话的口气就仿佛非要引进一种血型鉴定法才能证实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渊源似的。

在大部分有关代沟的讨论中，往往强调年轻人的被疏远，而完全忽视了老年人的被疏远。评论家们忘记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对话的双方却缺乏共同语言。

我们所熟悉的对话问题是产生在生长于两种极为不同的文化中、说着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如一方是在中国，一方是在美国）之间的。妨碍他们相互了解的不仅有语言，而且还有无法比较的经验。然而，只要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讨两种文化的前提，就能够打开对话的道路。这是能够做到的，但人们又不常去做。

当说话者的文化不同但却讲着被认为是共同的语言时（如英语之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西班牙语之于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问题就更难办了，因为它更微妙了。只有双方都认识到他们讲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某些“相同”的词是有歧义的，有时含义完全不同；这时，真正的对话才有可能。如果他们愿意听，愿意问，他们才能开始谈话，愉快地开始谈话。

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一旦年轻人和老年人真正认识到有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沟存在的事实，交流才能够重新建立。只有成年人象父母和老教师那样认为自己需

要内省，需要用自己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来理解眼前的年轻人，交流才是可能的。

但是，大部分年长者所做的事情仍然是把下一代委托给有关机构，如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学习新思想，老年的科学家把学生送到其他实验室去研究新问题；这些都于事无补。这只不过意味着运用互象征社会的特点，在那种社会里，父母放弃了教育子女的权利，指望他们的子女向其他成年人或较有知识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是在搞发明革新的科学方面，学生也得学习旧模式，年轻科学家也得去填补已获得承认的范例中的空白。虽然在科学超速发展的今天，老人迅速过时，被较年轻的同辈所取代，但这一切仍然跳不出一个权威的框架。

说到底，现在还是与过去一样，老年人仍然掌握着控制权，老年人没有认识到应造就与青年人对话的条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着控制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常常是那些与前几代学生十分密切的人（如教师），现在反而觉得代沟是无法逾越的；他们觉得自己对教学的一片耿耿忠心被不能按旧方式学习的年轻人出卖了。

从一种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成是忠诚危机；由于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忠诚，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忠诚，他们觉得所有的安全感都被剥夺了。我相信，这种忠诚危机至少部分归因于老年人现在对年轻人正经历的一切不如年轻人自己那样了解。苏格兰遗传学家C·H·沃丁顿(C.H.Waddington)曾假设，人类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选择的能力即人类的儿童从长者那里接受是非标准的能力。儿童对是非标准的接受是从属于父母一辈人的结果，这些人是他们所信任、畏惧和热爱的，每一个孩子的生活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但是，

现在老年人对青年人来说不再是确定不移的道德责任的代表了。

诚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父母一代的人仍然靠着一套后象征性的价值在生活着。在这种文化中，孩子从父母那里得知世上有着一些不容置疑的绝对价值，这种学习可能会在以后的经历中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些绝对价值可以而且应该能够重建。排外的迷信，教条式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在后象征文化的崩溃点上会表现得极为活跃，而在较高的抽象层次中发生一系列稳定价值变化的文化中，则很少出现上述问题。

在较老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文化中体现了这样一种设想：不需经过革命而进行变革，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 (social techniques) 来解决经济变革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过时的东西要么被当作幸存的东西，要么被当作受到爱戴的东西，要么被当作遭到反对的东西，这要视情况而定。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当带着急件的信使来到法国后，信件虽然已由邮局送出很久了，但人们仍然忘不了信使的形象。在法国也是这样，皇家的赫赫威仪与国会任命的政府比肩而存，尽管政府早已接替了君主的权力。在瑞典，关于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与最保守的宗教信仰所支持的绝对道德标准并行不悖。

同样，在美国既有人坚决赞同发展性的变化（这被视为进步），也有人总是求助于专制主义（它有许多形式）；既有各种宗教派别，也有各种小的政治团体，它们的主要号召手段就是各自判断是非的教条；还有乌托邦公社，它们总是带有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的特点；还有一种对种族制度的默许，这对我们公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是一种侮辱。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凡是变化来得迅猛、突然、常常很激烈的地方，凡是没有具备有条不紊地进行变革的地方，总是有突然

爆发的可能性存在。这种爆发可能采取革命的形式或反革命的形式——如大部分拉美国家——也可能产生突然的逆转，重新建立保守的正统观念（尽管会采取新形式），不信奉此种正统观念的人会遇到迫害、严刑拷打、被活活烧死。拥护或反对保守的专制主义的态度以复杂的形式在现代青年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共产主义的教条和反动的反共教条对佛教的宽容性的、不求绝对的宗教价值的过分践踏使佛教徒作出了反应，现代青年是以这些佛教徒为榜样的。但是，现代青年的行动也确实与专制系统有相同之处，容不得持异议或不相信的人，因而其教条没有感召力。

对于儿童提出的问题，如“我干嘛非上床不可？”“我干嘛非吃蔬菜不可？”“为什么不许我吮大拇指？”“我干嘛非学会读书不可？”等等，有的父母只是简单地回答：“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因为我说应该这样。”这些父母准备按照在文化中重建后象征因素的办法行事。但这些因素远不象过去那样好驾驭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普遍乐意接受各种观点相互冲突的局面，而不是正统观念。

不过，大多数父母在坚持旧的教条时也不那么有把握。他们不知道如何教诲这些与自己童年大相径庭的孩子，大多数儿童也无法向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父母或长者学习。过去，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恳求他们的移民父母不要在公共场合讲外国话，不要穿他们的外国味十足的衣服。与此同时，这些孩子由于与自己的父母有着割不断的关系，看不惯父母说话和做事的方式而感到羞愧难当。但这些人及时地学会了找新的老师作为指导者，以年龄较接近的孩子为行为榜样，不起眼地溜进了父母较宽容的本地的群体之中。

现在，持不同见解的年轻人很快发现这种方法再也行不通

了。他们与父母间的不合也同样存在于他们和自己的老师之间。在旧书中，在色彩艳丽、内容浅显的新教科中，他们都找不到满意的答案。

一些持不同见解的年轻人在国外找到了榜样。他们迷上了法国小说家阿尔伯特·卡姆（Albert Camus）的作品。卡姆的阿尔及利亚血统与他对法国的理性上的忠诚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他们的某种冲突的感觉；但他已经去世了。他们试图用德国出生的、年事已高的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的话或存在主义者的作品来解释自己的目的。他们对其他青年革命团体的英雄采取了崇拜的态度，为其高唱赞歌。白人学生与黑人自治论者结成了联盟，黑人学生则企图以他们重建过去的斗争来重建现在。

这些持不同见解的年轻人认识到，亟需立即采取世界性的行动来解决那些影响着全世界的问题。他们所希望的是，以某种方式使一切都再从头开始。有秩序的、发展性的变化观念不再为这一代青年人所知，他们不能从长辈那里继承过去，只能与长辈现在所做的一切断绝关系。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次不理智的大失败，而未来的前景则是除了毁掉这个星球外，一无所有。由于夹在了这两者之间，他们准备通过一种社会清除的方法开出一条新路——就象为了修一条通往新社区的路，就得把树木和地面都清除掉那样。由于意识到了危机的现实性（事实上，最准确地发现危机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他们的眼光敏锐、具有预见性的长者），以及青年人的那种认为长者不理解反抗因而不理解现代世界的观念，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对现存系统的有计划的改造竟然变得不可思议了。

然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除非通过他们所反抗的人，是找不

到通往权力之路的。说到底，是男人给了女人选举权；在英国，是上议院投票废止了上议院的权力；十八岁以下的人要获得选举权，得由十八岁以上的人同意才行；归根结底，限制国家主权的扩张也得依靠各国的行动。有效而又迅速的发展性变革不会让任何人上断头台，不会有任何人被迫流亡，它靠的是众多的掌权者与寻求权力的不掌权者之间的合作。尽管革新的观念可以来自他人，但成功的行动的积极性却必须来自那些特权将被废除的人；现在特权已被认为是过时的了。

在持不同见解的年轻人中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父母或代表父母的人——系主任、大学校长和社论撰写人——站到他们一边来，同意他们的主张，或至少向他们表示祝福。在他们要求的背后是他们的希望（即使当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希望学校的校长来和他们谈谈——带上自己的孩子。但也有不抱这种希望的人。

我上面主要讲的基本上是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年轻人，他们或是希望脱离整个制度，或是想把这个制度打烂，重新开始；但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都行不通的感觉更为普遍。那些不大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年轻人中，常常会发生拒绝在学校学习、拒绝在工作中予以合作或拒绝走正常的政治途径的情况。也许最固执的就这一大批人。但在这些活跃分子的身后将定期地出现大批学生，这使人想到，即使是这种广泛的冥顽不灵也能转化为积极性。

青年人中的抵抗也表现为基本不与规章制度打交道，他们认为这些规章制度毫无意义。也许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代代流传的各种教育形式对这些人不再起作用了，他们认为这些教育形式不过是让学生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剥削人的。

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立场，年轻人（他们既不是最理想主义

的也不是最玩世不恭的)几乎都受到了这种意识的影响,即认为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成年人对未来的设想都是不值得一学的。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形势。世界上有两代人,一代是进入新时代的先驱者,另一代就是他们的长者;这两代人尽管对世界的看法相去甚远,但他们仍然能找到一种互相沟通的方法。谁都不知道下几步该怎么走。我认为,认识到局势如此就是找到答案的开始。

因为我相信,我们正处在发展一种新文化的边缘,这种文化的类型与互象征文化大不相同,正如在有秩序(或无秩序)的变化中已经制度化的互象征文化与后象征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那样。我称这种新类型为前象征文化,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与后象征文化不同——在那种文化里,腰直背挺、白发苍苍的老人代表着过去与未来的伟大崇高和连续性——现在,那些已经孕育但尚未出生的孩子必将成为未来的代表。这些孩子的性别、外貌和能力尚不得而知。这些孩子也许是天才,也许严重残缺,但他们会得到富于想象力的、有革新精神的、能体贴人的成年人的照顾,这种照顾是我们今日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关于这些未出生的孩子,我们尚不能确切地了解。靠着戴在我们耳朵上的精密仪器,我们可以说这些孩子活着,心在跳动。更精密的仪器可以在孩子的健康方面提供某些线索。我们可以大体预见他们将在何时出生。我们知道,除非保护和照料好母亲,否则孩子求生的机会将和她一起消失:她如果病了或死去,孩子的生命也会丧失。但其他的一切就不得而知了。

谁也无法预见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的四肢活动的速度有多快?什么能使他们高兴?他们成长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他们是一醒来就活蹦乱跳还是当人们疲倦的时候他们才跳得最欢？谁也不知道他的思维会是怎样——他是否能从所见、所听、所触、所嗅、所动中得到最大的收益？但是，只有了解到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什么是我们无法预见的，我们才能建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是安全的、能够成长的，并能发现自己与世界。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为了保护母亲和难产的婴儿，我们必须掌握熟练的看护技巧，必须有麻醉剂、氧气瓶和血浆。对精神抑郁或受了惊吓的母亲必须有辅助疗法。对无法哺乳的婴儿必须有人造食品。对于那些对声音敏感的孩子，必须有弱音方法。

对于那些向人们伸出小手的孩子，必须带他们——或抱，或扶持，或放在摇篮里——到人群中间去。在他们的眼睛能对色彩作出反应时，必须有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供他们选择，必须提供各种东西供他们分辨，提供许多节拍和悦耳的音乐启发他们跳舞。当他们开始认识世界时，一定要让他们见到其他人所制作的各種东西，要给他们蜡笔、颜料和胶泥，让他们能塑造世界的形象和自己的想象。

满足孩子需要的方式仅举此荦荦大端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孩子在他们对先人的爱、依赖和信任中又是多么受制于先人的方法啊。也使我们意识到，成年人帮助孩子的方法有极大的灵活性，相比之下，孩子依赖成年人的方式就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没有成年人的照料，孩子永远学不会说话。没有信任的体验，孩子就不会变成一个信任社会的成员，不会变成一个爱别人和照顾别人的人。儿童完全是依赖性的，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性，人类的文化才得以确立。几千年来，成人正是通过他们的对孩子的照料才把他们对世界的幻想传给孩子的。正如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



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和沃丁顿所雄辩地表明的那样,依赖性使道德心成为可能;伦理观对性格来说不但不是外在的,相反是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的。

文化的连续性和每一个革新的被吸收有赖于后象征系统的成功,在这一系统中,年轻人的教育是重复他们祖先的生活。随后,由于人们学会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生活,互相走访,互相贸易,不同的后象征文化之间的差别便为变化和互象征文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互象征文化中,以一种信仰形式培养起来的人学会了去适应其他的、但同样绝对的信仰形式。

随后,随着变化的概念在许多文化中表现为一种后象征因素时,年轻人便能从他们的长者那里得知他们应当走出自己的天地,得到更多的东西,去做不同的事情。但这种“走出去”永远得在长者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儿子也许能被指望去渡过父亲从未渡过的重洋。父亲只有小学程度,儿子有可能学原子物理学。父亲站在地面上看飞机,儿子可能会开飞机。农民的儿子成了学者,穷人的孩子越过了父亲未曾见过的大洋,小学老师的儿子或女儿成了科学家。

以依赖性和适应照料为基础的爱与信任使那些在一种文化中培养起来的人有可能进入另一种文化,这种转换无需破坏他们的早期教育。第一代自愿的移民和先驱者对新环境的要求很少有不适应的。他们的早期教育使他们能度过难关。但是,除非他们能将新的东西以后象征的形式体现出来,否则,他们就无法把自己通过早期训练所获得的东西——即向别人学习的能力,传给他们的子女。别人的东西是他们的父母无法教给他们的。

现在,父母无法把自己教不了的子女托讨给“其他”学识渊博的人了,因为这样的人已不复存在。因此,父母们感到不安,绝

望。父母们仍然不死心，他们问：“我们该如何告诉孩子 什么是对的呢？”于是，有些父母试图通过含糊其辞地向孩子提出建议，以期解决这一难题：“你得自己判断这个问题。”而有的父母则问：“其他人是怎么做的？”但是有的父母觉得“其他人”——即他们子女的同龄伙伴——的行动方式对他们的子女来说是不安全的，不值得仿效。有的父母不明白子女搞的是什么名堂。对这些父母来说，那种互象征文化的办法是毫无意义的。

有的成年人依然相信，对他们没有体验过的那种生活，世界上会有一条安全的、得到社会赞同的道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希望在子女身上落空时，便感到怒火中烧，心酸之极。有的父母、受委托人、立法者、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毫无顾忌地指责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本来是把对孩子的希望寄托在学校身上的。

现在，随着对文化发展和传播的迂回曲折的过程理解得越来越深，我们认识到，人身上最富于人性的特点不是学习能力（其他许多生物都有这种能力），而是教诲的能力和将别人发展的及教给他们的东西储存起来的能力。以人类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学习能力是相对简单的。但人类创造复杂的、教育性系统的能力，理解和利用自然界各种资源和管理社会、创造富于想象力的世界的能力才是非常复杂的。过去，人类为了保证文化传播的连续性和体现新事物，靠的是循环系统中最不复杂的那部分，即儿童的依赖性学习。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一过程了解的深入，我们必须培养这一系统中最灵活、最复杂的那一部分——即成年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改变成年人的行为，这样，我们便能放弃后象征性的抚养方法及其中的互象征成份，去寻找前象征性的教与学的方法，它将使我们能够走向未来。我们必须为成年人创造新的模式，使成年人不是教孩子学什么，而是怎么学；

不是教孩子应对什么承担义务，而是使他们懂得义务的价值。

后象征文化把重点放在长者身上，他们学得最多，靠他们的学问他们可以做得最多；这种不断复制过去的文化基本上是封闭系统。现在，我们必须转而创造把重点放在未来的开放系统——必须把重点放在儿童身上，他们的能力尚鲜为人知，他们的选择必须是开放性的。

这样，我们就明确地认识到，引导我们走进现在的那些道路是不能再走的了。使我们到达现在位置的道路已成为过去。旧的文化形式为我们的当代文明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技术和工具。现在，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在不同的道路上从过去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共同体。通向现在的路没必要否定，以前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忘却。但是，所有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必须被当作前辈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象和承认未知的未来，即使对科学幻想小说的预言作家来说也是极为困难的。在《童年的结束》(Childhood's End) 的结尾，英国作家、科学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 写道：“星星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太空歌剧描写了最后一艘破损的宇宙飞船返回地球上的“老家”的情形。英国作家约翰·温德厄姆(John Wyndham) 在他的《米德维奇布谷鸟》(Midwich Cuckoos) 中描写了一些由地球上的妇女养大的奇怪的、金色眼睛的、聪敏过人的孩子被当作外层空间来客而遭杀戮的情形。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 于1968年拍摄的电影《2001年：太空的奥德赛》最后以失败告终。这种极不愿意孩子过于深入未来的心情，使人想到成年人特有的那种想象力仍然被过去所束缚。

我相信，要使人类的想象力从过去解脱出来，要靠发展一种

新的沟通方式，得以与那些与未来关系最密切的人——即那些诞生在新世界中的青年——进行交流。也就是说，解放人类的想象力要依靠那些人的直接参预——靠那些至今尚未接近权力、然而完全可以想象在将来自然会掌权的人。过去，在互象征文化中，长者是逐渐失去对子女的未来进行限制的权力的。据我看，现在前象征文化的发展要靠一种不断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这样，老一代人将接近新的经验知识，没有这种知识便无法制定有意义的规划。只有依靠具备这种知识的青年人的直接参与，我们才能建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未来。

我们不能象毛主义者在中国对青年人的活动所进行的引导那样，将青年人的反抗引向恢复祖辈人乌托邦梦想的方向，我们必须和年轻人一起学会如何走下边的几步棋。他们的新知识中——新世界和我们都是新的——必然会产生出一些问题，要求那些已受过教育、有经验的人去寻找答案。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Archibald MacLeish) 于1928年在《A·麦克利什的汉姆莱特》(The Hamlet of A. MacLeish) 一书中写道：

我们已有答案，所有的答案：

只是该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却不知道。

他送我这部书的时候，我正在阿默勒尔蒂群岛研究马努斯人。当时，几乎可以肯定：那些依然以适应其古老文化为荣的马努斯人，在一个他们既不理解也无法影响的世界中，终将变成教育水平低下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唯一经历过的另一种文明就是与

之相邻的那种野蛮而低下的文化。

四十年后的今天，马努斯人已跨越了数千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在那种闭锁于石器时代的岁月中，在他们抢劫、欺侮那些不太富于侵略性的村落的岁月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他们准备送孩子上大学、法律学校和医学院。他们以前执掌领导权时，是在一个小小的群岛上对一个部落进行不稳定的统治，其组织机构低下；现在，他们把领导权交给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当我又想起上述那段引文时，要是让我来写的话，我就要另写一段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这些掌握着一大堆答案的人有责任回答问题的话，我们至少知道提出问题的人是谁了。孩子们，年轻人，将提出我们连想都不会想到的问题。但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信赖感，这样，老年人就能够与年轻人一起去寻找答案了。正如在一个匆忙按照过时的模式修建了临时抵挡风雨的房屋的新国家，孩子们只会说他们冷，并指出某处吹来了穿堂风；但有技术和力量另盖一种房屋的人仍然是父亲。

前几年，我曾面临着某种我最初称之为诱惑的局面。当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愉快合作时，年轻人有时会转向我，说：“你属于我们。”我觉得这是一种诱惑，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抵抗，尤其是在一个青年人在各方面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庇护者的国度里。因此，我常常这样回答：“不，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之所以认为我属于你们，是因为你现在对我研究过四十年的东西很喜欢。但这并不能使我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怎么能知道今后十年你们不会转而反对这些研究目标呢？”但我想，这个回答是我们的顽固看法的又一个例证。我们坚持认为将来和以前一样，大部分人都要经过反抗和回归的循环过程。过去的经

验可以适用于未来。由于我作出了这种假设，我便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会说些别的东西。正象他们所羡慕的那样，我是由祖母带大的，我的父母没有让我走他们童年的老路。几乎在七十年前我就是新的抚养方法下成长的，正象现在二十来岁的人说的那样，让孩子自由成长，长得高高大大，进入开放而又自由的未来。感谢我有这样一个童年，才使我坚持认为我们能够改变局面，能够有意识地、高高兴兴地进入一个前象征文化，为一个未知的世界而辛勤培育前途未知的孩子。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世界人民必须重新安排未来。对欧美文化来说，未来就在我们的前面，虽然还不是现实，但已几乎伸手可及了。对于许多大洋洲民族来说，未来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面。对巴厘人来说，未来就象是一卷已曝过光，但尚未冲洗的胶卷，正在慢慢地退卷，与此同时，人们站在那里，等着看胶卷上有什么。让我们也用一句形象化的说法吧：“请听我们背后无情的脚步声。”我们要赶上未来。

在前象征文化中，过去与其说是强制性的，毋宁说是有帮助作用的；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前象征文化，则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引用一句那些恨不得马上就建立一个完美世界的年轻人的话，他们说：“未来即是现在。”这句话似乎是不合理的、激烈的，他们提出的某些要求，某些具体细节是无法实现的。但我仍然认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形成思想的方法。我们必须象对待母腹中尚未出生的婴儿那样，把未来置于由男人、女人和儿童组成的共同社会中，它就在我们中间，就在眼前，已经得到了喂养和照料；它已经需要为它诞生而必备的东西，这些东西倘若不事先准备好的话，临时准备就来不及了。因此，正如年轻人讲的，未来即是现在。



## 下 篇

# 七十年代概覽





## 第 五 章

### 代沟的无害化

六十年代，青年人——新一代中的第一批青年人——认为他们在一夜之间便能改天换地。电力和电子时代的儿童习惯于一按开关，灯就亮了。当他们那些刻不容缓的渴望在全世界的上百所大学中爆发出来时，我们这些长者被迫以激烈的反对和压制的态度作出了反应。在某些地方，留长发的青年不准去上学，或在美国城镇的街道上受到驾驶汽车人的威胁。留络腮胡的青年在国外旅行时被某些国家赶了出来。某些有机会与长者共同坐在议事会里的青年则臭骂一场而彻底拒绝这种机会。开小差成了家常便饭，逃避责任的军官只能无奈地挥着手。

某些老年人以程度不同的热情和认同感欢迎这种新秩序，有人宣布了反主流文化的到来，认为这表现了美国的青春活力；于是，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说话方式都模仿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人。人们一则以担忧，一则以希望：他们既为过去而担忧，也希望看到这些已能表达自己意愿的年轻人的抗议会产生什么直接的结果。现在，在更加严肃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对六十年代发生的事进行估价了；可以确定那些忧虑与希望留下了什么；也能够更加充分地审视现在，更加敏锐地认清到底未来有哪些是无法预见的。

在1969年时，我曾论述过造成代沟的可怕的经验，也曾论述过一种认识，即整个世界发生了某种极为广泛而又不可逆转的

事——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星球，我们唯一的家，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互相沟通的整体。在那些日子里——那些日子现在看来几乎就象童话故事里的“从前”那么遥远——读者常常问我：“要是新的技术大变革出现的话，还会有一条类似的代沟吗？”我作出了一个颇有份量的回答：“要是我们的年轻成年人能在月球上开出拓居地，那里出生的孩子从未见过地球，而某种灾难毁灭了地球以致儿童不复再见其往日景象的话，那么，出生在地球上的孩子和出生在月球上的孩子之间才会出现这么巨大的代沟。”有的读者还是不明白，脑子里总是转着那种顽固的信念：事情总会是按老样子发展的。有时，我就用下面这番话使他暂时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如我们这些代沟另一侧的孩子在玩捉迷藏，我们是五个一组地数数——‘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就这么数到五百，然后说‘我来啦’。可现在孩子们是这样数数的‘十、九、八、七、六——’”说到这儿，那位美国读者大笑起来，他体会到了在不同的世界中成长的儿童意味着什么。

有人仍然觉得很难理解这条把所有四十年代中期前后出生的人分隔开来的、世界性的代沟。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恼怒的批评家们纷纷来信，指出他们懂得如何比年轻人多；认为我所谈的是知识与才智，而不是经验的差别。第一代移居美国的人的子女一旦真正在感情上成为美国人后，便很少批评这个国家，他们傲慢地解释说：“我和我父亲就合不来，他和他的父亲也合不来，而我并不指望和我的儿子合得来。这没什么新鲜的。”

我的法国朋友们忘记了他们在1968年5月时的生气勃勃的行动，他们说，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出现一条更大的沟了。

七十年代初，学生运动似乎销声匿迹了。那些与学生共同希

望一夜间就能改天换地的成年人满肚不快，十分沮丧；其他人则暗暗高兴，因为他们相信那些冤家对头已经被纳入了正轨。1970年夏，在美国青年人最后一次在柬埔寨和肯特、杰克逊的屠杀问题上爆发怒火之后，报纸上开始宣称学生活跃精神的终结即是这种精神的死亡。他们没有认识到，代沟不再与大学生在校的年份相一致了。

那时发生的事情很象1945年的情况，那时，原子弹第一次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开始将代沟无害化，对它的重要性不予理睬，使它失去了意义，就象二十五年前我们想方设法不理睬原子弹，使原子弹无害化那样。当原子弹第一次在这个毫无准备的、大吃一惊的世界里爆炸时，美国编辑、批评家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在《星期日评论》上写道：“现代人已经过时了吗？”他充分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也许确实象恐龙一样过时了。过去，我们对于种种事件总是事后才能理解，并给它们加上某种名称，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造出了“原子时代”这个名称。

1945年夏，袭击广岛的消息传来时，我的一本书正写到一半。凡是有眼能看，有耳能听的人无不认为这是文明史上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把完成一半的手稿都撕掉了，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新的原子时代里，我的书中没一句话是可信的了。最先感到张惶失措的是那些感到自己责任最大的人——即原子弹物理学家本人。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中——某些预言家把它扩展到了几个月和几年——社会的负责成员曾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有些人一直认为我们对另一场更糟糕的战争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不定战争会很快结束呢。但我们这些人类学家中却有人使出浑身解数向人们证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

的，不必大惊小怪。“谁知道什么会击中你呢！”这是持乐观态度的美国人对第一批广岛新闻的典型反应。人们根本没有去区分把一大片地区及其居民毁灭掉与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毁灭掉之间的差别。人们在谈着南非的峡谷，边远的孤岛，爱斯基摩人在辽阔的北极如何安全，人类准备再开始一次全面的文化发展。我们面对的是对彻底毁灭的束手无策，面对的是1914年以前形成的军事与外交的传统观念。当铁幕垂下以后，超量核武器杀伤的观点流行一时——倘若他们有足够的原子弹摧毁我们 $x$ 次的话，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原子弹摧毁他们 $x$ 次，再加两次、三次或四次。

随着这种无情的威慑数学的发展，我们中间那些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人开始算计，如果二十年没有核战争的话，我们就能制止它了。这二十年中，在原子弹阴影下进入成年的人学会了理解这一局面。他们仍然太年轻，还不能占据掌权和施加影响的地位，他们中间不会有将军、总统或独裁者。他们的年龄已足以使他们提出正确的问题了，如问一问：“城市被摧毁后，那些设计来摧毁它若干次的武器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六十年代的代沟的先兆。

但这二十年我们必须得熬下来，这就需要一个支持性的舆论气候。我们怎样才能使人类的各集团认识到他们试图防止的是什么？怎么能使他们既有足够的眼光认识到应采取行动，同时又不使这种眼光过份透彻，以致使人们感到一筹莫展而否定一切？当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提醒人们注意新危险的本质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我发现，那些在世界末日的宗教恐惧中长大的人能够容忍、甚至欣赏罪恶世界彻底毁灭的概念。但那些在宗教气氛不那么浓重的环境中——即仍然相信有天堂，但不再相信有地狱——成长起来的人则对面临一次大劫难没有应变能力。在这一

时期中，人们避免让儿童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不让儿童参加葬礼，以否定人体的灭亡。1950年罗马教皇发布教令，将圣母玛丽亚的升天节正式归入罗马教会的教义，就是企图反击那些否认复活和不道德的观念。在老的和平运动中，也有同样盼望狮子和羊有朝一日会和睦相处的绝对观念。讨论核战争或苏联的学术会议很少有人参加。

但是，当五十年代末年轻人开始抱怨长辈的思想时，这也许是第一次证实我们对将会发生新问题的预言是正确的。年轻人抱怨说：“他们似乎相信我们能去销毁原子弹。他们不明白，我们不得不学会与原子弹相处。”他们的长辈把销毁原子弹看得仿佛象解除德国的武装或三十年代几个大国拆毁战舰——继之而来的是修建各种新的马其诺防线——那么容易；与此同时，年轻人却开始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岁月中我们得和原子弹打交道。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大家将失去一切的行动。但人类在其存在的数千年中已经被训练得习惯于面对绝望的局面了，他们学会了通过忘却苦难和抱一线希望而使自己生存下去。随着新一代的成长，关于核武器的争论也在继续，而不可避免会发生一次意外的原子弹事故的预言没有变为现实；一件又一件无法预见的事变甚至使我们的恐惧变得迟钝了，因而也使我们抓住历史上第一次防止战争的机会的行动变得迟缓了。

我们把原子弹无害化了；供飞机起落的基地和保持核导弹的地下发射井迷住了我们的心窍。1966年，两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在西班牙海岸相撞后丢失了两颗氢弹，而一位美国大使对此却不以为惧。三年前，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架设了“热线”，以避免由于在雷达屏幕上发现无法解释的亮点时，原子弹会自动发射从而导致世界毁灭的危险。

在七十年代，美国及其盟国和顾问们非但没有变成世界和平的负责任的保护者，反而不负责任地竞相搞武器装备、原子能设备及可制造武器的核原料的买卖。人们认为原子弹有着明显的威慑作用，并对控制原子弹提出了难以令人放心的保证。这种状况使目前商用钚到处扩散，从而使我们面临着一种极为广泛而又极难控制的危险，不禁使人想起英国小说家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1957年出版的小说《在海滩》(On The Beach)中的恶梦，他描写的末日大灾难的情形又变得可信了。

但七十年代末核战争的危险与代沟有什么关系呢？十年前，代沟问题可以象1945年夏天原子弹所造成的困境那样被说得清楚而又简单。它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由于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整体，因此二次大战后成长起来的所有的人都共享其特有的经验，这种情况把他们与其前辈们区分开来了。大学生在他们的新幻想的压力下突然爆发了反抗。这种梦幻的新奇和共负责任的新伦理观足以使战后的一代疏远既成权力机构——一切既成权力机构。这一代人要求一个变化的世界，就象战前一代在1945年认识到原子弹的作用后提出要求一个变化的世界一样明确。1945年，当第一次原子弹的爆炸永远改变了世界时，我们就曾提出过让世界免遭灾难的要求，事实上，新一代就是那种要求的产物。

代沟在六十年代的出现既是一个在时间上不可逆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个生物学的事件，因为它是在不可避免要老化的人类中发生的。把它置于众所周知的人类历史的背景中去观察，则它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也不会再发生了。这种独特性寓于其共时性。以前也有过同样重要的事件，如贮藏法的发现，随后是如何取火，如何制造杀死远处敌人的武器(箭和标枪)，如何养家畜，如何播

种，如何把讲话写成手稿，如何组织大群的人进入互相依存的都市社会。后来，人类开始学会提出能够由训练有素的观察和实验来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导致技术能力的产生，并作为科学应用在运输、通讯、能量释放、宇宙探险、原材料革命（它给我们带来了人口爆炸）等方面，并把男人和女人从终生辛劳的父母责任中解放出来，为男人和女人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

所有这些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冲击的巨大变化来得都很缓慢，石器工具方面的小发明要经数千年的时间。一次变化只能影响地球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地球上的所有人没有时间互相联络。五百年前，倘若欧洲被毁灭了，都不会在新大陆的高等文化中引起丝毫反响；而新大陆在西班牙征服者带着先进武器到来之前，一直是安然无恙的。

但是，随着四十年代的探索和发明，世界的确变成了一体，每一个民族都受制于其他各民族。现在，一个地区发明的犁会传遍全世界，而全体人类眼下都受着全面核灾难的威胁。

我把六十年代中期的代沟看作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一个决不会以这种形式重现的契机，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重复我们这些早年对原子弹十分关注的人在当时所作出的那种反应。代沟对孤独的老一代是个悲剧，对那些无榜样可循的年轻人来说是可怕的。然而，我却认为它给了我们一次以新方式面对变化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然，我认识到，随着老年人的死去，一批新婴儿的出生，那些把大学搞得天翻地覆的人就会变成成年人了。因此，每一年这条代沟都会给不同年龄人之间带来新的断裂。这就是说，各部分人每年都要变，直到四十年代中期长大的人最后死绝，这条独特的沟才会消失。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在上述情况未发生之前，老一代人仍然会掌权，我和其他许多人只是希望在



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将成为未来几代人的楷模——之间发展一些新的沟通形式。当然，还会继续有很多大的变化需适应。但是，我们希望代沟另一侧的孩子们要理解变化，这种变化无论从质还是从量的角度讲都与他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变化不同。年轻人问我：“我们也会象疏远自己的父母那样疏远我们的孩子吗？”我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把每一个人都囊括在内的世界性的代沟了。以后变化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小，某些地区的变化速度会不同。在目前的危机阶段，你们会对变化本身更为了解，以便你们能够培养出真正对变化有思想准备的儿童。”

当人们问我，我们能够建立起什么样的跨越代沟的交流方式时，问我是怎样才悟出我所讲的这番话时，我便向他们指出了我本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两种情况——一个是我本人被抚养起来的方式，一个是人类学的训练，在人类学领域中能学会跨越数千年的工艺发展距离去倾听人类前进的脚步声。但人类学经验本身过于专业化，不能为现在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提供十分有用的建议，而这一代人本身及他们的孩子大概也没有几个人会当人类学家。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决定写我的自传《黑莓的冬天》(Blackberry Winter)，它记录了如何抚养孩子，孩子怎样理解其前辈所经历的变化；它告诉人们，应当把孩子当作能够直接作出贡献的人，而不应当把孩子仅仅当作不起眼的学习者。正如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五十年后对我说的那样：“在我自己家里，我是个孩子；在你父母的家里，我就是个独立的人了。”

六十年代时，人们曾有过一种殷切的期望：年轻人不会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一夜间改天换地，我们应当把他们团结进来，而他们的见识也会改变我们的见识。两代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难道不能被建设性地加以运用吗？为了理解别人而

穿上别人的鞋是理解别人的最糟糕的方法——难道我们不能抛弃这种信条吗？人们如果着眼于全世界的年轻人，就有可能这样问：“对青年中也存在着的差别进行新的认识时，应当考虑到在青年中存在着一种新的、以共同经验的独特性为基础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以音乐而不是言词相互沟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难道我们不能这样去认识他们吗？”

六十年代，我们也亲眼目睹了那次爆炸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对这样一种信念的认可，即：世上除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信仰外，还有其他高尚的信仰；世界各族人民——由于身体上的差别而被称为“种族”——都同样能够学习和使用其他民族所发明或发现的东西。偏见被抛弃了。把从代沟中表现出来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引伸，超越出从太古时代就流行于世的那些伟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系统的范畴，建立起更广泛的交流基础以沟通那些只有部分人享用的价值，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这就是六十年代末期时以许多相互矛盾的方式所表达出的愿望。人们以火热的激情表达这样一个信念：不负责任的消费社会将消失。这一信念在共产主义中国就表现为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中有前途的、有才华的精华要与第一代革命者中的暮气和官僚主义对着干。这种希望在日本是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日本的工业家们从最坚强的年轻反抗者中吸收有前途的行政管理人員。

在大学中，这是那些职员们的愿望；他们深知我们的大学系统是如何腐朽和不合时宜，教授们无精打彩地哼哼着他们的讲义，照本宣科，毫无创见。这也是那些有识之士的愿望；他们认识到我们的中学已经变成了监狱，为的是不让青少年浪迹街头；而在我们的小学中，想象力被扼杀，必要的技巧再也学不到了。

老一代中成熟的成员的认识方法不同，但往往更敏锐；他们认识到在工业革命期间，社会中的不足的东西、不适宜的东西和不公正的东西未经过深思熟虑便被草率地发展起来了。年轻人非难的眼光反映了他们的怀疑、捉摸不定的心情和他们的拒绝。因此，在世界各地那些有洞察力的、负责任的、殷殷忧虑的老年人奇怪而又突然地妥协了；但也有些人的反应却是恼怒的、常常是充满恶意的，他们觉得自己所珍重的一切精粹将被全部毁灭。

希望与恐惧同样走极端。后果也是过分的。新闻界在1970年夏断定学生运动已告结束，这次学界动乱谈不上是一次有计划的破坏运动，不过是希望落空所致；而尼克松的白宫则宣布年轻人及那些同情他们的渴望的人的言行不会对总统发生任何影响。连那些与年轻人抱有同样希望的大学校长也被华盛顿拒之门外了。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些畅言无忌而又伶牙俐齿的年轻“领导人”试图脱离已显然四分五裂的领导位置，遁入暂时趋于一致的公众舆论中藏身，但美国的宣传工具却在他们身上打发财的主意，从而毁掉了他们。

但是，另外的事却发生了，这是某种需要我们开动脑筋的事，但我们的思想对它却毫无防备。我们知道，代沟的位置是在逐年上移的，代沟那边的人将愈来愈多。但是在战前和战后两代人之间的那条沟消失之前，不仅学生会被卷入其中，就连老师也将被卷入其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首批进入1970年的先驱者中，有人已是助教，他们不仅会象学生一样攻击既成权力机构，而且会以低级教职员的身份进行这种攻击。仅在几年前，全体教职员还都是代沟另一侧的人，而现在代沟就在教职员中间了——他们具有新一代的特点，既年轻又没有地位。

与此同时，代沟也在中学教员中出现。在学校教师聚集的破

烂的小办公室里划出了界线：一侧是年轻的、留着络腮胡的逃避越战兵役的人，另一侧则是充满爱国热情的、曾服过兵役的老年人。地方学校的董事会忘记了人们每年都要长一岁，通过了不再雇用“年轻教师”的禁令。“决不相信超过二十五岁的人”的口号被匆忙改成“决不相信超过三十岁的人”。“络腮胡子的一代”的经历正好横跨代沟，他们开始学起新一代特有的行为了——学他们的音乐、服饰和吸麻醉品——因此，这一代也为新一代和长者之间的稳定合作铺设了道路。这一代人的典型形像是脸边一圈乱蓬蓬的胡子，色彩艳丽的背心紧紧裹在腰上。

这条代沟稳步地出现在职业学校，随后，又出现在最初几年的职业实践活动中。那些一向对年轻人可恶的胡言乱语紧绷着面孔的组织发现，头发短、戴着假领和领带、作派正统的年轻人也表现出了与长发的、不戴领带的年轻人同样的观念。反对一切新自由主义分子的教士们很可能会发现，那些演神秘剧《巴黎圣母院的魔术师》(Juggler of Notre Dame)的青年演员到底还是一度曾聚集在街角的年轻反叛者。当我从美国的一个校园走到另一个校园，从最过激的校园走到最不过激的校园时，我听到人们会在同样的问题上鼓掌或大笑。

那些试图靠在校长办公室里示威或在华盛顿街头示威来解决世界问题的第一代美国大学生，离开了学校并成为年龄较大的群体中——如在法律学校、医务学校或商业学校中——的第一批人，随着他们的离去，校园中冲突的激烈程度逐渐减弱了。在校学生再也体会不到他们的先锋者肩头的那种变革的沉重责任感了。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4月的结束，他们不再面临服兵役的问题和良心的选择了。但他们现在却在新的、陌生的压力之下，如经济日益衰退、年轻学生的数量成比例的缩减等等。工作机会越来越

少，因为现代的竞争者太多了。被医务学校和法律学校录取变得比以前更难了。严峻的谋生问题第一次打搅了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曾一度能够随意选学课程，并觉得有足够的钱用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七十年代美国学生又得按照那套令人不满的、过时的学习方法认真干起来。不久前这套方法刚刚被否认，可现在又得忍下去了。他们的前辈在六十年代中期的那种紧迫感已经烟消云散。美国校园中的各种传统活动几乎难得一见。大学生活又变成了青少年的荣身之阶，对生活的选择成了次要的事，或者说，为了满足未来职业的学术要求，只能进行一种专业的选择。拯救世界的问题就象谋生问题一样可以等以后再说。比如，从法律学校出来后当辩护人，或从医务学校出来后，可以为免费诊所效劳。以后，更关心拯救世界的人可以到华盛顿的环境保护局去工作，或加入消费者利益保护者的行列，或到海外的和平队去工作——现在这个组织更认真，对技术的要求更高了。新毕业的学生不会象他们的前辈那样躲到郊区去。校园看起来更象五十年代，但六十年代校园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仍然存在。

六十年代时，我发现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十五岁的孩子香农·迪克森对责任感的大声疾呼，表达了第一代人在面临着一个他们从未参与创造的世界时所具有的全部强烈感情。在写本书的新篇章时，我又找到了香农·迪克森，想看看他现在的感觉是否和这些七十年代中年龄较大的年轻人所表达的东西同样有意义。下面就是他写的话：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随笔，描述了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看待世界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方法。那时，随着

我们刚刚跳出家庭和朋友的圈子，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在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与我们应当如何感觉之间的严峻的差别支配了我们的脑子。这种洞察使我们深信，我们必须纠正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的严重不平等，并且决不能再重犯我们先辈的那种同样目光短浅的错误。

六十年代末期，我们的强烈信念伴随着一种天真的急躁，这种急躁感源自那种“马上就得满意”的环境，它使我们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能在一夜间改变世界。当我们的想法与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种种全球性问题发生冲突时，这个幻想就被粉碎了。于是，我们的集体激情的爆发也悄悄地转变为个人与另外一些观念的形成的冲突，即追求成功的、令人满足的个人生活。

我们的那种变革的方法论肯定是简单而可笑的；然而，随着我们接近政府、教育和商业的神经中枢，我们那种最初的信仰变得更丰富、更有预见性了。我们认识到：球正在迅速地传到我们的手里，我们将有机会造就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个主要的困难是，随着进入“公认的”社会结构，我们也进入了我们的长辈铺下的职业道路，以完成他们的成功与满足的理想，然而这些理想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差别。

我们这个接班的一代必须改变这一过程。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信念。因为，倘若我们作为个人向不属于我们的老一辈的瞩望低首屈服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类也许真的要短命了。

## 第 六 章

### 代沟的无法预期的反响

六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影响了世界，但这种影响比他们和同情他们的老年人所期望的要温和，更缺少连续性，更间接。只要在代沟的这一侧出现了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如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医生和年轻的政治家——青少年学生就不必有拯救世界唯有靠他们自己的感觉了。但十年时间所造成的差别，无论对第一代以新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来说，还是对他们后边的这批学生来说，都是不清楚的——第一代曾以震惊的眼光看着这个不是由他们造就的世界，而跟在他们后边的学生却在担心地自问，自己是不是变得麻木了？变化的速度使这两代人都颇感茫然，双方都迅速看到了表面的差异，而忘却了相似之处。那些浪迹天涯的西方青年仍然互相唱着同样的歌，但是，那种象1970年伍德斯托克的大型集会，在复旧的成人世界的有组织的敌意中消声匿迹了。

代沟将随着生物过程而有序地前移，直到战前那一侧的人全部死去，这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结局。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一些极其复杂的情况。父母们面对的是令人捉摸不透的、越来越疏远的子女。老师们觉得，他们教得越好，就越遭到否定。那些献身于某种高尚工作的人，发现遭到了自己曾无私为之服务的病人、小学生、委托人或教区居民的反对。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对年轻人或看起来年轻的人既恨且怕，就象电视里演的

那样，一小批学生中的活动分子每天都在世界某地和警察打架；持这种看法的人在迅速增加。这种对活跃精神的反对是许多原因导致的。有成千上万的人靠着辛勤工作和苦苦积攒，刚刚变成了新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希望把孩子送到大学去，使孩子在那里拿到向上爬的凭证，从而出人头地。有的警察不愿意在有女士的场合下使用“糟糕的语言”，然而，他们却碰到了大学女生的极无女士风范的挑衅，而他们本来是希望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些大学里去的呢。还有一些再无升迁希望的中级管理人员，他们完全被十足的惰性控制了，然而这些人眼看就会被长于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人所替代。有的农场主的庄稼被歌舞狂欢的年轻人踩得一塌糊涂；有的农场主被居住在公社里的城市青年当众侮辱，这些城市青年任凭自己养的牛站在牛棚中的深深的泥浆中。有的辛勤劳动的纳税人眼巴巴地看着从舒适的家中走出来的年轻人靠着食品券<sup>①</sup>过日子。还有一些失望的少数民族——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土著居民——他们觉得那些有特权的、中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任性的、暂时的。

那些刚刚摆脱母亲义务的妇女不知道下步该怎么走。那些数量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对自己被搬到一边而愤愤不平，他们不喜欢孩子们的声音，但对喧闹的电声音乐和年轻人的作风、道德也只能眼睁睁闭了。那些在要求严格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心里酸溜溜的中年人对青年人痛痛快快的性生活艳羡不已，而年轻人的性生活则随着最近一个案子的判决达到了放肆的顶峰：在这件案子中，一位法官宣布一个高中女学生被男生强奸是自然而然的

---

① 食品券是美国政府发给失业人员的免费领取食物或廉价购买食物的凭证。这里指的是某些年轻人不劳而获。——译注



事，这要怪当今“姑娘们”穿着打扮的方式！

怒气冲冲的老年人害怕上街的理由愈来愈多；他们害怕遭袭击，害怕小偷。年轻小伙子梳着富于魅力的“女人式”的长发，少男少女们则梳着非洲式的发形，就象是准备搏斗一场的好斗的野兽，而老年人既受他们的诱惑，又怕被他们当众侮辱。由于害怕上街，他们便呆在家里看电视。但电视内容也同六十年代一样，充斥着各种犯罪和暴行。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对电视中被谋杀和强奸的人丝毫没有援手的愿望。过去，当他们读到狄更斯笔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济贫院时，读到伊娃和汤姆叔叔及南方的奴隶故事时，读到那些绝望的人、被追捕的人和被压迫的人的兴衰沉浮时，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震惊的故事曾牵动了千百万人的同情心。但电视观众却没有读者的那种参与感。看电视人的肌肉的一动不动就是人类同情心的一动不动，以至看电视的人面前真的出现了一场谋杀，他也会漠然视之。

同时，许多罪行都是年轻人和青少年干的，正如以前要由成年人完成的、越来越复杂的任务现在都交给年轻人干了。一州复一州，我们的法律和行动总是赶不上变化。有的年轻人到了有选举权的年龄，却拿不定主意是否去割扁桃腺；有的怀了孕，却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流产；有的能驾驶可以毁掉一个城市的轰炸机，却不知道买来一瓶啤酒。有许许多多的无家可归的儿童，被赶出家门的儿童和青少年，而对他们成年人却没有一个真正负责的；私奔者（大部分都是十三、四岁的女孩）的数字仅美国一国就膨胀到数百万。这些孩子的确是危险的。这样的孩子一般是出现在战前，但更多是出现在战后，就象苏联曾出现过的那种野孩子，他们成了秘密警察的候补人选。他们谁都不爱，也从不知父母的爱与关怀是何滋味。父母管束过严会使大部分孩子不时表现

出残忍的感情，但他们的好斗性是“受到约束的，”因为他们也能不断地感受到父母的关怀。现在，有数百万这种无人疼爱的儿童流散在社会中，根本没希望满足被电视煽起的十足的物质欲，他们把所有年纪大的人都视为敌人。老年人害怕遭袭击的感觉不仅仅是他们的妄想狂，而是实际存在的危险。然而，有权的老年人却有成百上千种表现自己的方式，如：在法庭上把改信了某种亚洲宗教信仰的年轻人交给他的父母严加看管；关闭任何一个增加了改良措施的诊所或学校；惩罚那些胆敢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反抗的教师；把学校的教室塞得人满为患；关闭儿童服务设施——但他们却能容忍一种新的、可怕的赚钱方式，即从孩子的买淫中捞钱。

对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暴行的公开发扬已经在全社会引起了反响，美国的许多人不再关心儿童的幸福，转而反对我们的儿童了。当那些为未出生婴儿的生存权而奋斗的人也鼓吹死刑、为接二连三的战——在这些战争中居然往婴儿的身上投凝固汽油弹——而辩护时，局面就更混乱了。

当年原子弹的出现曾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样，代沟及伴随代沟而发生的许多现象也曾带来过一些希望，然而这些希望却奇怪地消散了，变模糊了。当年，年轻人曾被任命为大学管理委员会的理事，但从许多方面讲，这几乎没产生什么差别——大部分事情都使他们感到厌烦。倘若说良好的影响有时似乎能象一剂补药的效力那样迅速遍及社会各阶层的话，那么坏的影响、反动的行为、敌意和对变革的愈来愈强的反对却也象癌扩散那样迅速蔓延。每一种影响都更难辨认，更难应付了。现在比十年前更难发现希望。当新一代的第一批成员发起挑战时，他们相信既成权力机构的成员在错误地掌管权力；这些成员虽然地位强大，但却可以受

到挑战。有希望采取行动消除核威胁的基础，在1945年时看起来是那样简单，而现在则极其复杂了。六十年代中期希望的基础也很简单，新一代人在新罕布什尔竞选总统的初选中支持尤金·麦长锡（Eugene McCarthy），使人们又一次有机会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我们又返回了原地，变化又被视为与六十年代相同的青少年与父母间的冲突，因此，整个情况比以往更混乱了。这不仅仅是一次不满的父母与持不同见解的子女之间的较量，而且也触及到了所有的老年人，触及到了所有年轻人与所有长辈之间的关系。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一些时日。现在，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所有的场合下都是隔着代沟相望。在青少年的这一边，还有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以及小孩子的年轻父母。但是，无论在世界的何处，青少年的父母都在代沟的那一边。在纽约和伦敦，在辛辛那提和罗马，在莫斯科和东京，在爱斯基摩人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民族中，父母和子女都隔着代沟遥遥相对。虽然近十年来的种种变化使代沟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了，但年轻的成年人又成了学生和艺徒的楷模，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变得反而更突出了。在七十年代，这一代沟的存在对父母之道是一个有力的挑战，正如它在六十年代对成人之道的挑战那样。与青少年打交道或作为一个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许多老年人仍然以为代沟停留在原地，即在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和大学校园里。他们以前的同情者为活跃情绪的消失而感到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年青人以某种方式背叛了自己——就象先前那些青年中崭露头角、风云一时的人物纷纷变节一样。但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纷乱的关系仍在继续，尽管代沟本身现在是在二十八、九岁的人那里，而且这新一代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有了

孩子。在家庭中，年轻人和父母的冲突在继续，只是随着校园中动乱的平息，这种冲突已不那么引人注目了。高中学生们谈起他们的父母时，常把父母说成是“学识渊博”；而父母们，尤其是中高级学生的父母现在常常拿自己孩子的古怪行为互相比高低，说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当”，说他们正试验不用杀虫剂培育庄稼，说他们对手工艺又有了兴趣，说他们在修炼神秘的灵性感受。

由于最初的那条代沟不那么惹人注目了，年轻教师 and 老教师之间的界线，年轻政治家与老政治家之间的界线，年轻医生和老医生之间的界线也都不太明显了；因此，青少年与父母间依然存在着代沟的事实，也被视为仅仅是一种人们所熟悉的代与代之间的变化，或寻常的两代人的冲突了，只是其特点带有现时期的特殊性而已。教授和老师所碰到的代沟通常出现在他们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间。现在，他们可以轻松地叹口气了，因为目前那些由校外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支持的学生不那么难教，也容易交谈了。然而，第一次面对青少年问题的父母们仍然在体验着两代人之间的那种疏远，这种疏远曾被冠之以“代沟”的名称。只有当这种断裂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中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象通常的父母与子女的冲突那么简单。现在，代沟在大学里已不复存在，代沟的青少年一侧已有了许多成年人，故此，许多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冲突似乎又成了他们之间特有的冲突了。倘若年轻人把他们的痛苦和忧伤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他们的某些愤懑和不满就能够有所缓解；倘若父母们认识到子女的反抗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因为这些子女与那些刚刚成为父母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代沟的存在，那么，父母们的内疚和绝望也能够得到缓解。

然而，在绝大多数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青少年都不采取

将这种冲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的态度。因此，在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写的有关代沟的文章中，只有一个学生是把青少年的行为当作一种象征而不是当作个人行为来加以讨论的。1977年，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E·斯巴克斯(E·Sparks)写道：

现代青年的许多服装式样和个人外表把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中年人区别开来了。现代青年不管穿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穿，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老年人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想起自己当年只能穿廉价的成衣。由于现代青年比较走极端而且能坚持自己的标准，他们与中产阶级和中年的劳动大军格格不入。青年人的头发是造成这种疏远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觉得，现代青年正在以对头发长度的挑战来进行新的实验……青年人用不着使用大信息量的计算机就能够控制头发……对一些青年来说，头发是实验的手段，是形成差别的手段。而对另一些青年来说，头发则是向中年人的制度进行挑战和反抗的方式。

过去，不喜欢长发的中年人曾试图用非常聪明和狡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三年前，学校才允许学生留长发。学校的唯一工作大概就是教学，而不是为学生规定道德标准。但学校并没有仅以教学为满足。现在，学校相信它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亦即它们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要是你不喜欢它们的方式，并且反对这种方式，校方就会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惩罚这个捣蛋的学生。我上的那所学校就多次因为学生头发的长度而开除学生。可笑的是，关于头发式样的规定一旦被废除，一切

事情仍然照常进行。我想要说的是，个人头发的长度决不会造成智力低下，也不会阻碍学习的进步。

个人对头发长度的选择有什么危险？看来，有的人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是因为其他人告诉他那是错的。于是，这位被认为干了错事的人就得马上迷途知返。这种事情才有许多危险呢！许多父母对他们的男孩子说，他们留长发看起来象女孩子。孩子们常常不知道是否应该和父母谈谈心里话，这不是好事情。许多人说，是缺少交流导致了代沟。我觉得，在头发这件事上还不仅仅是缺少交流，而主要是缺少理解。但希望还是有的。当今许多中年人已经允许头上的毛多长几英寸了。

但是，更多的人所谈的听起来倒象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五十年代那些与老派父母激烈冲突的高中生被一名叫吉姆·斯坦恩（Jim Stein）的学生称为“萧条时代的孩子”：

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许多事情上我的父母和我都意见相左，在某些问题上分歧尤其大，如音乐、汽车和钱。在我们家里，这三个话题构成了代沟的主要部分。我在这些事情上的观点几乎和我父母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与我父母关于现在的一些价值的想法差距很大。

在钱的问题上，我的父母（即萧条时代的孩子）觉得钱应当省下来去买重要的东西或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和重要的事。我父母认为重要的事只局限于大学教育、保险和一

栋房子。我承认每一样对未来都是重要的，但我也生活在现在。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到处旅行。要是我被买房子、买保险等压得喘不过气，我就没有机会多见世面了。旅行和体验新事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或后悔的事。大多数老人告诉我“现在就干吧，趁你还年轻，”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的父母认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但不能经常这样想。我愿意花钱买的其他东西，如立体声设备、枪等等，我的父母也统统看不起。他们觉得在这种东西上花那么多钱(200美元)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把钱派作更好的用场，也就是前边提到的房子和保险。他们说，枪和立体声设备仅仅是我生活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过，我已经挣钱了，我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决定如何花钱的人。

我和我父母意见不同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汽车。我喜欢看上去很漂亮、跑得又快的赛车。他们喜欢经济型的小车。我妈妈希望我买一辆“沃尔克斯瓦根”牌的车，可我却喜欢“卡马罗”牌的。我觉得为了买一辆外型象赛车的汽车而多花保险费和汽油费是值得的。我的父母认为，汽车就是汽车，用不着看起来漂亮。我开车去上学或去工作，在汽车上消磨许多时间，觉得很满足，我就是爱开车嘛。我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车，我就会有自己的选择了。

我和我的父母在音乐问题上总是谈不拢。我父母喜欢格兰·米勒乐团那样的大型乐团演奏的音乐，或约翰尼·凯什那样的艺术家演奏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信不信由你，那种音乐我也喜欢。不同的是，我喜欢疯狂

摇摆乐(acidrock)歌手，如吉米·亨德利克斯的后期歌曲，还有莱德·齐伯林、福格哈特等人。我喜欢听快节奏、大音量的音乐。我妈妈和我爸爸受不了这种音乐和这种音量。他们似乎不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想听“噪音。”我无法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这些原因。我只好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随它去了。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条清清楚楚的代沟。我父母的思想是保守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历过萧条时期。他们认为有保障的未来比眼下的玩玩乐乐要重要。但是，我认为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是重要的。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做以后将没有机会做的事。我相信，要去享受生活，一个人不应当成为未来的奴隶。未来是重要的，但还没有重要到要荒废现在的地步。

再请看帕特·奥弗比(Pat Overby)的评论：

我父母在怎样使用汽车的想法上完全和我相反……

尤其是当我要为自己买一辆好看的“卡马罗”牌汽车时，我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他们管这种车叫“破玩艺儿”。我爱这种车，心里总是放不下它。当然，按我父母的观点，汽车不过就是拉着开车人从A地到B地去的東西。汽车的其他方面，如外观或声音，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我注重的是一辆汽车是否能让人驾驶愉快，而不是其必要性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就算汽车的基本功能是运输，但我相信它还应该有更多的功能，至少对那些希望如此的人应该是这样。我



的车体的喷漆又亮又新，新轮胎，新车轮，发动机值一千五百美元，但我就喜欢它是这样的，这和我父母毫无关系。的确，我父母把他们的车仅当作代步的工具，可我开车的时候却有某种对自己汽车的满意的感觉。开着我的车在城里兜风使我心旷神怡，我乐意炫耀它，乐意开车放松脑筋。显然，我父母在使用他们的车时没有这些打算。

当然，我父母对我的汽车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有一点他们却没考虑。我的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使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业余消遣。可我父亲把我的车仅看作是一个昂贵的玩具。有时我很纳闷，他是否忘记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傻乎乎地围着汽车转过。他当年围着发动机转悠，仅仅是为了想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我很满意我的车，我也尊重我父母对它的看法。只要我有这辆车，只要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家中的代沟就会不断加宽。

六十年代的代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曾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或塞浦路斯的年轻人因争取引进一种对性生活的新的诚实态度和对人体的新态度而发生的一些斗争。但是现在由于两代人的激烈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家庭的解体是一些社会症状——如逃离家庭而带来的少年犯罪，青少年吸毒和青年人的酒精中毒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也许更为突出的是，高中学生从对更广泛的社会冲突的认识，从对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目标

和标准的认识上倒退到了一种对新精神范围的要求。国际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不仅将其注意力从呼吁限制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发展转向了寻找新的价值，而且这一新的重点也渗透了全社会，为两代人的疏远提供了新的内容。

## 第七章

### 新的义务形式

在我第一次系统探讨代沟问题时，曾想象了一个共同未来的图景——因为未来象个正在孕育中但尚未出生的婴儿，故而它是不可知的——这幅图景使我的论述达到了一个美好的高潮。它似乎为我们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由于全世界各民族同时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那么，提出一个能使大家一起重新起步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很诱人的事。假如我们把现代世界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飞机场，从不同距离和不同方向来的飞机都飞进了这个机场，那不管是从1号门进来，还是23号门或2003号门进来的，都得对来自指挥塔的同一个声音作出反应，都得向着同一个未知的未来前进。

我描述了在新几内亚山区所发生的事，那些有抱负的但曾经是裸体的人而今已把他们头上的猪油洗去，走上了政府部门的岗位。他们说：“我们建成了一所学校和一所医院。请给我们派位老师来，派位医生来。”——他们在召唤这个现代世界的使者，他们听说过这个现代世界而且渴望进入这个世界。这种事实际上已经发生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幅图景是真实的。那些只见到过天上的飞机，只听说过了不起的收音机、人造卫星、望远镜、显微镜、发动机和铅字印刷的人，渴望亲自体验一下这些奇迹。只要使这些人具备能力和学习的信心，新几内

而那些割取敌人头颅作战利品的人的儿子就一样能学会微积分，而且决不会比德国北部港口的那些几代都是工程师的人的儿子或四千年前其祖先就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克里特农民的儿子学得差。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所学到的东西，其他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只要尽其个人的能力，也是能够学到手的。世界各地的那些充满渴望的或玩腻了的儿童，有的住在树叶为顶的棚屋里，有的挤在简陋的教室中的长凳上，有的则在美国郊区收费昂贵的、到处都是新奇的塑料玩意儿的中学里打着瞌睡、烦躁不安——所有这些儿童都进入了同一个世界，一个他们的父母在作孩子时决想不到的世界。这些孩子们共同仰望天上的人造卫星，把卫星的运行视为日常之事，因此，十四岁的美国孩子谈论的是长大后要去探索宇宙，而十四岁的新几内亚儿童则想象从卫星上看他们的村子会是什么样子的。

不管他们的父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有过什么经历，他们的孩子却有共同之处。他们可以展望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十二级风暴还是一个政权垮台，抑或是一次政变，都不能再把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儿童完全隔离开来了。从日本和中国，印度和苏联，美国和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地来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不用翻译而靠在黑板上画图来交流，尽管还不知道不按教养程度加以分门别类而举行一次正式宴会能否行得通。他们各自的文化都是在过去两千年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的父母和前辈看待世界的方法千差万别，极为复杂，学者和科学家要想彻底了解另一种文化都得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因此，我们仍必须以这些千差万别的过去为基础而进入一个共有的世界未来。然而，人类不同的过去中有一点是没有这么大差别的，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生物基础。我们都是女人生的，都是女人的乳房或其塑料

替代物(我们通过它吮吸营养物)所喂养大的,我们都得学走路,学说话;都能抓取伸手可及的东西;都能笑,能哭,当然不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而是得在恰当的时候;我们都会准时感到饥饿,在传统告诉我们适合睡觉的时候感到困倦。我们成熟与老化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因为对我们大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单向过程,无情地从生走向死,不管诗人和宗教教义对这一过程的形容有多大的差别。不管婴儿被认为是祖辈的肉体再生还是新的创造,他们的生命都是当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蠕动时被感觉到的;不管是认为老年就是第二个童年,还是一个生命过程的结束阶段,抑或是阳间生活的结束,也不管是否认为婴儿与老人离天堂最近,而成年人离天堂最远,归根结底,人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样的。在高加索的阿布哈兹人(Abkhazians)人中,老年人不必中止任何活动,九十岁的人照样干活、跳舞、做爱、唱歌,就象他们年轻时一样;只是活动的格局在范围上缩小了,如年轻时他们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老了只干两个小时,其他的事也按比例略有收缩。

我们是由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培养起来的,我们的传统是由线性的、表音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并有着共同的宗教信念:每个人只能活一次;因此,欧美人日常生活的希冀和我们的各种宗教信念中所体现的思想方式几乎都是采用独特的线性词语(linear terms)。未来在前面,过去在后面,现在就在我们大家的身边。对不识字的农民来说,或在更深的层次上,对由目不识丁的农妇抚养的儿童来说,世界总保持着某种循环性,即播种与收获和月相变化等自然的周期;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汗牛充栋的文化遗产使我们认为世界是直线性的。我们习惯于认为过去影响着未来,过去是未来的原因。

代沟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与四十年代中期的一系

列变化后成长起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特殊断裂，它与我们探访生活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是一致的。在美国，许多移民是在另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他们到这儿以后刚刚适应环境便去世了，他们的子女是在他们身后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上述两代美国人有较充分的准备来接受这条代沟。“在祖母去世前我们是那样的干。后来就不那样干了。”对于这种第二代人的评论我们已司空见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常常拒绝学习祖母的语言——常常是无法写的地方土语——只学美国英语。

在六十年代，类似的对过去的鄙弃是新一代第一批反抗成员的特点。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不够，在与长辈的争论中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他们使用辱骂代替讨论，决心再也不受那些年岁较大并参与建设了一个无法忍受和无法居住的世界的人们的蔑视。亲如兄弟的关系跨过了肤色的界线，身体特点各异的孩子拒绝信赖任何二十五岁以上的人，他们只相信有共同经验的人——这些就是标准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启示录式的希望风行一时。我们能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真正勇敢的新世界吗？在这个世界中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sup>①</sup>的那些令人萦怀难忘的预言将烟消云散，技术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人类屈从于技术。基督的启示“安息日是为人而制定”<sup>②</sup>能扩大到计算机和火箭发射领域中去吗？即使那些对代沟的力量有怀疑的人从机械的、直观的角度出发也认为，在代沟两边都有一些持相同态度的人——或是反抗的态度，或是保守的态度——这些相同的态度比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更

---

① 乔治·奥维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他的小说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性的毁灭作用。——译注

②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二节至第十七节。——译注

重要。但年轻一代的冷若冰霜的形象仍然不可磨灭。人们总是把他们描绘成迷途的人，而且莫名其妙地指望他们要么就保持自己那些疏远的特点，要么就投降，找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搬到郊区去。

但是，随着六十年代向月球发射飞船越来越频繁，其他的事也在发生，有的引人注目，有的默默无闻。孩子们对宇宙兴趣盎然，这种兴趣很快就被对海底探索的兴趣加以补充。对早期人类和人类诞生以前的历史的兴趣，补充了对描写未来的奇迹或可怕景象的科幻小说的兴趣。年轻人是一个他们未曾参与创造的世界的看门人，他们被一个老化的既成权力机构击败了；为了抵抗这种孑然孤立的意识，他们开始寻找寄托，开始寻根了。目前的建筑似乎是不稳固的，很可能由于基础不合适而倒塌。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千百万老人依然在掌权，他们越来越老但却不肯放权，这很可能使这个世界失去平衡。人们在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如七十年代来得痛切。十五年前，一些年轻的领导人治理着一些新国家，一时间人们激起了对年轻领导人的希望，而面貌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使这一希望变得更加光明。然而，作为青年人象征的肯尼迪却命丧黄泉，随着全世界对他的痛悼，希望之光也愈来愈暗淡了。

我们曾经历过三代一体的世界，在后象征文化中，祖辈人曾一度是孙辈人的盟友，但在美国，老年人已经成了无用的、过去的残存者；在六十年代的互象征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四代甚至五代人活在世上。有四代人同存的情况下，许多老年人的形象垮掉了。在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站在中间的人，他们要为上下两代人负责。在发展中国家里，公共卫生事业的力量全部放在婴儿和母亲的身上。中年人死了，人口的一半都是十五岁以下的，

没有足够的老人挑起抚养儿童的重任。灾难的预言家们对人口危机发出了警告：富裕社会的长寿和发展中国家婴儿不合比例的存活，这两种情况使人们发出了共同的呼吁：人也成了一种污染。由于人们意识到过分拥挤的人口对我们的资源是一个过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绿洲消亡，森林消失，山地水土流失严重，因此，人们既反对过多的老人，也反对过多的年轻人。有人呼吁采用救生艇道德和治疗类选法<sup>①</sup>——要求抛弃毫无希望的人，要求采用无痛苦致死术，关掉身患绝症的病人的生命维持系统。在现代城市的街道上，绝望的、步履蹒跚的、不知姓名的老人遭到袭击和谋杀；在萧索的住宅中，老年妇女注定要死去。

实际上，除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年轻人缺少模式以外，代沟还带来了其他的副产品。许多老年人为了恢复自己慈祥的形象，管住了自己的手，不再去摸他们后代的耳光；然而，当所有年轻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都变成了陌生人时，他们却没有从年轻人身上体会到这种克制。年轻人手中依然无权，依然在这个世界中挣扎，这个世界的缺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许多年轻人的父母恨不得当初就没生他们才好；这些年轻人对老人有着一种冲天的无名火。这种冲突每发生一次都会使局面变得更糟。成千上万的老人在电视机上看到一次谋杀的报道后，一见到街角上的一群年轻人就不由得浑身颤栗。年轻的袭击者残忍无情，倘若他们的受害者奋而反抗，那反抗者就必死无疑。

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不要把对方当作具体的人来看待，因而都认为对方太残忍。当一位二十年来执教认真负责的教授看到学生袭击其他那些从来都不务正业的教授时，他会油然而生一种被抛弃

---

<sup>①</sup> 治疗类选法就是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在战场上决定哪些人优先治疗的方法。——译注



感。他并不这样来看问题：那些搞袭击的学生不是他的学生。因此，他感到自己被彻底抛弃了，遭到学生的仇恨了，被不公正地拒绝了。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的情景吧。人们将如何共享未来呢？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尽管他可能是各方面都很得体的）如果将来生活在一个置孩子于不顾的世界里，他是否能感到满足？也许，我们很难为将来负起责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与自己孩子的联系在六十年代突然地、无情地破裂了——我们堆积了那么多坏废料，它们在今后数千年中威胁着我们的子孙。一个成年人的世界，一个中年人掌权的世界，就象是一个绝了后的富翁们的世界，他们对收取教育税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没有子女。从这个意义上讲，代沟使整个世界绝了后。当我第一次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心中充满了对父母的同情。我认识到，整个人类的努力是由老年人注入动力的；父母们愿意给他们的子女以生命，妇女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育的危险，男人们冒着战争的危险，从事着危险的、消耗生命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我对父母在疏远子女时所产生的敌意估计不足。

英国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曾指出，真正的憎恨是非个人的憎恨，对一个被引为同类的人是根本恨不起来的。但我对此还要补充一点，真正无情仇恨的另一个条件是，当一个人置身于自己所憎恨的人中间时，不管他们是生人还是熟人，都会引起那个人的无情仇恨。这种情况有不同种类。当遗弃妻子或离开丈夫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办不到因而看不到其他出路时，谋杀丈夫和妻子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当两个集团感到他们之间的争斗招来了第三种力量的干涉时，这两个集团间的仇恨就会有增无已，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受到了英国人的干涉即属此例。美国同一个贫民区中的两个少数民族集团如

果同样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之间的仇恨也会有增无已。

代沟的普遍性成了一个樊笼，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都想从这个樊笼中脱身。年轻人到处彷徨，寻找来自另一文化因而能使他们敬畏的宗教教师，老年人发狂似地企图把孩子从那些新的宗教教师身边拉回来。这些宗教教师从年轻人与父母的疏远中得到了好处，但老年人却找不到能够重复他们自己的道路的那种旧子孙了。因此，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一种方兴未艾的新职业，即把疏远父母的孩子“诱拐”回来，给他们洗脑，以便使他们能从某种外来的东方迷信崇拜中迷途知返。

这种疏远感也表现在新一代的内部，那些公社中的年轻人拒绝照料自己的孩子。在约翰·罗恩采尔德（John Rothchild）和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合著的《反主流文化中的儿童》（*The Children of the Counterculture*）一书中，我们找到了一出重现父母拒养子女情景的剧本。新一代人中的父母当年就是出于彻底否定而迫使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出走的，因此，他们反过来向他们的子女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解释那个剧本。

儿童曾是连续性和希望的无可争议的象征，是能将其他一切价值集于一身的某种价值。但是现在，全世界都有一种不断增加的矛盾心理，人们感到孩子太多了，各种境况不正常的孩子太多了——有过多的富裕儿童，在无法补充的资源中，每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消费都超过了 he 或她应得的份额；穷国中的穷孩子太多了，他们国家中生产的每一粒粮食都被这些儿童吞吃干净。因此，儿童不再那么成为聚焦点了。每一个具体的儿童仍然是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但我们必须有一些方法来唤醒所有没有作父母的成年人去照料那些不是他们子女的儿童。

各代人之间的接触是必要的，但在二次大战后的没有计划的、手忙脚乱的世界中失去了这种接触的机会。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文化传统差异极大的民族之间都产生了隔阂，因而都变得极悲惨。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失去接触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

六十年代的公社被成千上万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实验所继承——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短期住在一起，甚至连周末都呆在工作间和群居地中；有迷信团体，有手工业团体，有的生产小底片盒；有残疾人的新型团体，在这种团体里，聋子给瞎子领路。顽强、坚定的人弥补着过分激烈分子的不足，对新未来的寻求与对可靠的过去的寻求难分难解地搅在一起。但所有这一切，这些新的人类居民的生活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这样的启发：我们需要房屋、城镇和城市，但不必采用既定的形式，即在廉价汽油的基础上盲目发展汽车，毫无计划地掠夺农村。我们可以采取使增长和变化成为更可能的形式——试为将来勾画一幅图景吧：增产与变化得到保证，宇宙空间是自由的，新的措施使人们互相联系在一起，城市规划不采用固定的形式，而采用新的、更灵活的形式。

六十年代给世人以一种迅速变化的虚假印象；这种变化有人热烈欢迎，有人则嗤之以鼻。然而七十年代却成了分散实验的年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灾难的年代——许多城市陷入了叛乱，飞机遭到劫持，纽约或伦敦都被一团糟的经济搞得手忙脚乱。局势就好象是一团刚揉好的面，酵母已使面团表面发了起来，但整个面团尚未发起来。然而，这些变化对那些于做面包一窍不通的人丝毫起不到安慰作用。

人们会问：“你干嘛要用这种老掉牙的比喻呢？除了怪人和

没多少饭要做的家庭主妇以外，已经没有人再做面包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女人气十足的比喻，厨房和厨房里的一切都是女性奴役劳动的象征。”但一些生命过程的每一次出现都具有其内在的现实性——如种子发芽，一只蛾子从蛹里钻出，枯死的树叶落下。我们现今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那些对生活有意义的形象比喻，因为人类的某些词汇能够描述某些不存在的东西。

那团刚发酵的面团还没有发起来。我们未曾想象过摧毁既成权力机构，也未曾想象过摧毁这个我们肯定还想居住的世界。只有少数人愿意旅行到月球上去或在人造卫星上度过大部分时间。只有少数人渴望皈依某个在数千年前就已和欧美宗教分道扬镳的东方宗教。也只有少数人想依靠其他收入来源，硬是去过一种较原始的生活，使用久已被放弃的工具。确实，我们仍然处在困境之中，勉强地共享着一个象牢笼似的世界——这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世界，但我们不是这个世界里的公民，这是一个没有人负责的世界。如果我们让铀扩散，那么美国、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就都能够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但如果不这样的话，许多资源和能源就会节省下来。许多人都在苦恼地生活着，在盲目希望与盲目绝望之间徘徊不定；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觉得他们与发展毫不相干，找不到参与改造的道路——这就是一种困境。

我们没有一种具体可见的未来，能使我们集中我们的忠诚，毫不犹豫地为之献身。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很难找到象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那种语重心长的豪言壮语：

“……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将在飞机场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决不投降。”

——1940年6月4日在下院的演讲

但在一个战争不可能打赢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段话。我们现在害怕的并不是——象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恐惧本身；相反，我们似乎已集中了足以导致我们采取行动的恐惧，但这种恐惧尚不足以导致恐慌和麻木。1973年夏法国打算在大西洋试验氢弹时，那些驶进禁区水域的小船发现彼此间有一种新的团结。有数千年历史的本地岛民和后来以殖民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洲人，在一种刚刚出现在大西洋的国际行动中第一次感到他们是同等的公民。然而这次行动并没有死人，只是引起了政治上的麻烦而已。倘若把这支小小的道德船队变成了某种更危险的行动，那就会使这次小小冒险的目标付诸东流了。然而这次小小的冒险是成功的。但这种小小的冒险也许会吃某种苦头，也许会有某些牺牲，也许需要极大的韧心，也许会发生使人烦恼的、不光彩的事。那么让谁去冒这种险呢？在这个儿童已习惯于开水从水龙头里来，只要找到开关就能让电灯亮起来的世界里，谁会采取这种行动呢？

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能记住过去已受够了的痛苦与灾难，以便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使我们再也不受二茬罪；一是如何使人们情愿为某种高于生命的价值而牺牲，或同样为了这个价值宁可活着而不是去死。在过去的历史中，人们忘却痛苦的能力曾使人类在活火山的山坡上重建家园。尽管这种不堪回首的忘却痛苦的能力数千年来对我们很有用，但因此而把医院或核工厂建在一条已知的地震带上，那么这种勇气只是一种犯罪的鲁莽。不过，一个人情愿为“祖先的遗骨和神灵的庙宇”而死的精神却能够使人类建起上千座城市，并曾一度保卫它们，使之免遭毁灭。

现在这些勇气和为信仰而死的古老美德需要使其改变性质：倘若我们不能记住痛苦，就需要以外在的方式提醒我们记住过

去的灾难和有文化价值的遗迹，以便使我们能抵御“忘却”这个古老的生物本能。现在没有能打赢的战争，战争行动不能被当作牺牲的模式。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正是勇于牺牲的精神才可能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改变义务的性质，即将终生不变的义务改变为有限的、暂时型的义务。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欧美人的义务在婚姻中、宗教中和政治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自己能实践“白头偕老”誓言的年轻人愈来愈少。在修道院的授职仪式中，最后的誓约现在已推后了许多年，而且有一个地方专门容纳发过誓约却在良心上不能遵守这些誓约的修士。在制度化的共产主义体系中，义务的丧失可以由从职业政治活动中退休而加以掩饰。

但是，我们尚不知道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能够向过去学习，不管它多么令人痛苦；这种文化还能实现一种不受死的义务绝对约束的生的义务。在一些古代文化中，男人死于战斗相当于女人死于生育。但他们对冒生命危险的方式却有极不同的看法。人们指望男人为保护后代人而死，但却指望女人活着，通过持续而不倦的日常照料来保护后代。也许，当我们有科学手段能使父亲象母亲一样照料婴儿和小孩，而不管失去父亲或母亲，孩子都有同样的丧亲之痛时，我们也许就找到新的答案了。

## 第八章

### 技术带来的希望

在这个奇怪的、非英雄主义的时代，却有许多人作出了英勇的、英雄主义的和自我牺牲的献身行为，这仅仅是因为起火的地方更多了，需要投入消防队员；政治家必须冒更多的危险；需要有更多的值班护士照料被烧伤的儿童；外科医生需要冒更多的危险来做数小时的手术，这种手术在二十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但这些努力还没把其他的勇敢行为囊括在内，譬如：面对劫持者的飞机驾驶员；只身面对暴乱的不屈不挠的领导人；面带微笑的公职候选人从可能藏有行刺者的人群中走过；把有残疾的婴儿抱回家的父母，尽管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意味着一辈子的自我牺牲。然而我们觉得，自利，贪心，不顾及他人的自私，残忍地追逐个人的赢利，缺乏公德、以及普遍缺少更高的人生目标等等，与上述那些勇敢行为不相上下，甚至可能使勇敢行为的努力付诸东流。不仅有组织的工业为了在另一地区行使权力而在一个地区获取利润，而且各种协会和组织，每一个小教堂和俱乐部都打算在与其他组织的竞争中使某些集团获利；如果不是在市场获利就靠政治权力赚钱；要么就打着为了灵魂，为了选民，为了声望的旗号赚钱，在美国则是靠偷税漏税赚钱。在目前这样的时代，没有大战只有小战，即使如此，说它是和平年代也不恰当——也许“战争”与“和平”的确已成了过时的历史名词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

中，缺乏贯穿始终的目标与表面的琐屑、无意义和自我中心正好相等。丧失方向和目标，对个人有利才干也与负责任的公民感的退化和为社团、国家和世界生活服务感的退化形成了对照。遗憾的是，“这不是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

但是，每一个把活的东西弄死的决定都使我们的心变硬了。社会的每一个有意识牺牲其成员的决定——如让穷人挨饿，让老人在凄惨的境况中苟延残喘，对儿童毫无保护地处于时疫流行的危险境地熟视无睹——都会使社会道德的源泉干涸。同样，每一个慷慨的行为都能使社会的道德源泉复苏。因此，以给共同责任留下余地的方式组织人类生活已变成了一个社会任务。人类很少彻底大公无私，也很少彻底自私。在人的一生中，其行为是背景决定的。警察可能是安定的保护者，同样也可能是触发暴乱的人。差别也许就决定于几分钟的事，决定于一小撮失去控制的人，决定于与被推到墙上的惊慌的人群之间的距离，决定于一个被误解的命令。不能自理的儿童贪吃和害怕被大人丢下不管的心理都会激发成年人的耐心和更体贴自己子女的愿望。把人类形容得一切皆好或一切皆坏都会降低社会安排的重要性，都不利于个人、社团和国家的改造。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人口拥挤、相互沟通，并正在出现一个前象征时期的世界中所存在的种种危险，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改进生活方式，在各种技术中有意识地进行挑选；这样，也许我们就能找到那些中心性的目标了。“我们是因为害怕才逃跑呢？还是因为逃跑才害怕？”这个古老的难题仍然解不开。人人镇定，勇气倍增；人人夺路而逃，恐惧就会蔓延。

前象征社会是一个前途未知的社会，前途未知即使不引起明显的恐惧，也会使人张惶失措。儿童至少是更新的秩序的天生成



员，因此他们要多做些准备以面对未知的将来；这种想法可能会使人感到欣慰，带来希望，也可能被歪曲为一种绝望的哲学。但这场斗争可能是很困难的，其副产品可能是极有毁灭性的——这种危险将始终存在，而且比我十年前所认识的还要严重。对未来的希望也必须加以平衡，必须植根于过去的回忆。如果没有这种深深的根，那么无论这株植物开的花有多么美丽，它也会在第一次干旱中枯萎。

希望的另一个特点也必须牢记，正如《圣经》里说的：“希望迟来，令人心伤。”这就是为什么照料小孩会使人精神振奋的一个原因；支撑着女人一生的东西就是小孩每天学到的新东西——回报一个微笑，坐起来，伸手抓东西，模仿声音等等。孩子每学会一个新花样都会使保姆或母亲享受到一种快感，因为这是孩子身上的新东西，几乎就象创造生命本身那样新鲜。观看儿童学习是与规划机械工程设计或建筑家为了说明比例而在图纸上画个人形正好相反的事情。搞规划时我们要应付的完全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如一平方英里内的小圆丘都要铲平，每一棵树都要砍倒，为“发展”留出地方来——对这个被铲平的空地的唯一补充就是一张蓝图，上面有将要建起的“家”。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夷平土地，砍伐树木，建起了许多人造的结构。它们的功能十分纷乱，毫不相干，就象能给人带来温暖感的电梯信号，一旦失火，就毫无用处了。由于设计明智而留有大片空间的新城市一度曾十分吸引人，但由于解决住宅问题而滥建了许多楼房后，就变得令人反感了。

特别是今天，世界掌握在那些必须学会理解它的人们的手中，他们拙手笨脚，刚刚赶了上来，在许多方面都完全是外行。这时，我们需要引进发展的方法，而不是用推土机开路，把风景搞得七零八落，这证明是一种没有独创性的、令人沮丧的、无能的规划。

人类学家格利高里·巴特森(Gregory Bateson)曾强调指出过，这是直线目标的破坏。反抗的年轻人想要白手起家建造自己的房子，他们只会发现这也意味着砍倒树木。

在全世界，士兵与敌人的距离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都增加了。每一个行为都变得更加非个人性，总有一部分是根本无法掌握的。以一国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总是战战兢兢，就是因为人们并没有刻不容缓地需要它们，或者说它们没有责任感。它们的投资从鞋子转向书本，从鞋带转向开瓶器；它们只对计算机化的盈亏纪录作出反应，没有一样东西能获得最佳的使用。在美国生产粮食的中西部，被丢弃的、油漆斑驳的农家房舍象上了年纪的人的鬼魂似地站立在那里。以前，这里的庭院前曾花木扶疏、家禽满圈；现在，大片的、荒凉的、没有树木的平原被施上了化肥，由机械进行耕作。这些机械就象在传送带上生产一种产品似地生产粮食。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决定权掌握在农场主手里，他们伐倒了最后一片树林，土地的规划糟糕透顶；现在决定权掌握在粮食市场和世界各地的驻外办事处的手中，那里考虑的既不是土地的状况，也不是受饥挨饿的人的需求。以前在这些村子里，男人与女人一起播种，一起收获，一起为下一次播种挑选种子。现在，先进的集约化决策意味着把从前这种伙伴关系砍掉了一半；女人不再参与，而是担当起了搞家务的角色。在世界市场上，食物既被当作一种武器，又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无论在何处，我们都能看到这种集约化的进程，看到此国的产品在彼国使用的情况。小汽车、飞机、卡车、拖拉机、坦克、轮船、茶具、汤盘、桌椅被运到设计者从未见过面的用户手中。在最近的十年中，似乎什么也遏止不住这股集约化和非人性化的浪潮。年轻人的反抗就是跑到空无人烟的地方，试图用不成型的

石器舂米，试图返回已被人类抛在身后的数千年时的那种状态。但很明显，我们无法用遥远的过去的那种简单技术供养一个四十亿人口的世界。汽车仍然在无情地四处扩散，挤满了内罗毕和莫斯科宽阔的街道，把伦敦和雅典狭窄的街道挤得走了样。纳税、汽油的价格和不方便都吓不住汽车的拥有者。预言家们对内燃机的发明感到痛心疾首，但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前都被以廉价汽油为基础的技术所支配，能与之争一日高下的只有核能。

到七十年代时，只有少数人的呼吁受到了重视。有人指出，实际上，按目前工业化国家的浪费水平计算，我们的资源不足以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标准。关于代沟的讨论在关于两个极端之间——即穷国与富国之间——存在着的鸿沟的讨论中发生了回响。忧心忡忡的穷国辩护者指出，如果原料价格的提高，穷国所依赖的出口的增加满足了穷国人民维持生活的工资支出，富国也许只有转而生产更多的合成材料。然而羊毛、橡胶、棉花、麻和木材若被合成材料取代，穷国将会比以前更穷。突然间，世界意识到能源和日益增加的污染也应当加以考虑。因此，人们开始认识到（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生活方式，食物生产方式、交通运输方式和遍及全世界的那种城市规划方式正在结束。由于廉价汽油及随之应运而生的一切都将结束，对待距离，对待不必要的规模，对待生活中的非人性化，对待城市的毁灭，对待穷富间令人瞩目的差别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等采取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现在已大可值得怀疑了。

与许多人所想的不同，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被技术所控制；在未来事变的面前，我们不会象小卒一样俯首帖耳，听之任之。然而，能够使生活变得容易一些的发明却可以接受，而且要保留到

更好的发明去取代它时为止。劝说人们不要把烧制不好、易碎的陶罐换成样子不好看然而却耐用的工厂制作的容器，或劝说人们不要把本该五年一换但样子好看的茅草顶换成瓦楞铁板，都是没有用的。那些五千年来在湍急的河流中吃力地用浆划独木舟的人会欢迎艇外推进器的，哪怕没有备件可换，这些推进器只能使用几个月。能把动个不停的孩子裹进风雪衣的拉锁会替代必须一个一个缝上去的钮扣，汽车和电话也肯定会替代马和送信人。

的确，人们曾发展了一些正确的东西。计算机可以使规划者想得更快、更多，这是以前单靠人脑所办不到的。现在，计算机可以进行成本与赢利分析，它表明英法联合研制的SST-协和式飞机是不经济的、危险的，有污染，即使靠国家的威望来平衡这些不足，其成本仍然是巨大的。每逢下雪天，汽车便暂时从纽约这样的城市的街道上不见了，但计算机告诉你，在平静而清新的空气中开车，经济效益是显著的。计算机告诉你，建一座无污染的新木材厂比保持一个过时的老厂要划算。随着计算机应用的发展，成本和盈利分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们是为变化作准备的小小预言家，能使变革少走些弯路。但是，倘若没有廉价石油的消失，前景就不乐观了。能源危机使大规模的工业化可以由矿物燃料提供动力的幻想的破灭成为可能。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转向其他的能源资源，技术将站在劳动生产率分散化和地方化一边。毫无疑问，我们还有着某种技术局限——比如，我们还不能用更大更好的风车和太阳能收集器取代石油——就算底特律的各大汽车公司取消几万辆车的生产，我们也还得用汽油；我们得用矿物燃料的局限性似乎并不是那些大公司强加给我们的。也许取消几万辆汽车对于扭转使用矿物燃料的潮流也会有些帮助——缩减产量本身也是由于意识到过大规

模的生产会使人类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能源危机，许多在旷野里呼吁的微弱声音是否能被人们听到是大可怀疑的。

但即便如此，这场战斗还没有打赢。这些呼吁是要求使用某种安全的、可更新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幅射能等。人们欢迎建立一种世界范围的生活方式，谁使用什么就在他们的附近生产什么，吃什么粮的人就种什么粮，人类的生活应更多样化；抱这种希望的人为能源危机打开了这些机会的大门而感到高兴。但这次能源危机也为莽撞的核扩散打开了道路。

对于用现有的核能来解决能源危机的作法仍有许多争论。比起用煤来作为暂时出路的建议，使用核能的常规污染较少。人们长期以来预言的核灾难尚未发生过。但能找到处理致命的放射性废料的说法尚可争论。控制核装置的人无论在金钱上或政治上都有巨大的利益可图，这种利益不下于核装置本身的规模 and 成本。

现在，我们有一次能够从自二次大战以来就走过来的毁灭性道路上返回的机会，但这仅是一次机会，现有的核问题上的选择会使这次机会的后果变成什么样尚值得怀疑。如果我们朝着技术分散化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挽救局面——那就需要每一个了解和关心这个星球未来的人一起努力。

但是，在一个流行着对下一代和人口过剩的恐惧的世界上，我们怎样做出努力呢？在这个曾把第一颗原子弹从不设防的天空投下去，毁灭了广岛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重提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梦想。以前，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梦想是以突然认识到天空的确是无法设防为基础的。这个梦想是由那些给参加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的人想到的；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开放天空”的讲话。这也是后来一位医学基金会的高级官员弗兰克·弗莱蒙德—史密斯(Frank Fremont-Smith)的

梦想。他设梦，以“儿童是无辜的”这个简明扼要的公式作为与苏联人早期谈判的基础——这句话是每一个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能接受的——让双方都能掌握对方儿童的生死，这样，每一方要么必须保护对方的儿童，要么一切毁灭。这是一种人道的威慑，而重复打击的政策则是非人道的。但是，的确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期人们认为战争的确是不可想象的。随后，我们又忘乎所以，又把人们集中在基地里搞起多弹头重返大气层的研究了。

人们有必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球的大气层，在所有的危险中，一个国家穿过大气层把弹头送到另一个国家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如果我们要时刻不忘那个保护着地球上的生命的薄层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类的战争史，许多帝国的发展，以及那些人类情愿为之牺牲自己生命的价值。

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民族中，人们对不得亵渎的疆域、隐居地和空间有着某种认识。它可能是一块非常小的、简朴的地方，穿过林莽走了一天的疲劳的妇女可以在这里坐一坐，把孩子们聚拢在身边吃晚饭。它也可能是小树形成的一道拱门，那里没有墙，只有沙地上的一片低洼地供一群卡里哈利丛林人(Kalihari Bushmen)歇息一夜。但这种地方却象是某种家，这种感觉也会扩展为某种这是自己的疆域的感觉，或自己的狩猎地，集聚地的感觉。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变得更惯于定居一地，这种自己的疆域的意识就变得更明确了，最终，人们愿意保卫的边界便划定了。保卫边界不但变成了保卫家园，保卫狩猎地、集聚地和捕鱼地，保卫女人和孩子，而且在随后的时代中变成了保卫遗骨和传统、语言、宗教信仰和整个生活方式的意志。世世代代，保卫共有的东西和前人留下的东西的召唤曾使男人甘愿献出生命，女人宁愿让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去死——这也是为了未来。

遍观历史，总是能见到这样的事：贪婪的部落向较弱的部落的边界伸出了手；保卫家园比袭击他人能唤起大的义务感，而践踏当代人类道德标准的袭击会唤起更深的道德沦丧感和毁灭感。侵略战争总是伴随着强奸与纵火。由于敌人要屠杀或掠人为奴，于是，女人便被强奸、俘虏，城市被夷为平地，良田被烧成焦土。而保卫战争——在这里我指的是被认为是保卫性的战争，它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保卫战——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勇气、牺牲和抵抗到底（如美国保卫战和列宁格勒的围困），人们宁愿撤到荒凉的地方去，如果他们相信应当这样做的话。侵略战争也伴随着屠杀——如在南京，利迪策<sup>①</sup>和美莱<sup>②</sup>的屠杀。但侵略很容易被解释成保卫，从而使之合理化；而人们对这种解释又常常陷于思想混乱——这些都说明人类判别善与恶的能力极缺乏透彻性。生物学家不是建议我们去研究人类行为的背景和他们的各种能力，如保护、牺牲、贪婪、破坏或自我中心的行为，而是一个劲地建议我们研究人的本质，研究基因是如何决定利他或自私行为的发展与调整的。对这个问题的每一种断言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比如有人断言人性本恶，应当加以压抑或通过基因工程来改变；而有的人则断言人性本善，只不过是罪恶的制度扭曲了。

但是，倘若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便会发现，同一个人或同一组基因排列相同的人，此时的行为是保护性的、高尚的，而彼时则是破坏性的。倘若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献身的条件和人类能作出什么样的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我们能为把保卫自己团体的英雄式的能力转化成保卫整个星球的能力创造条件吗？”各种伟大的宗教都极为简单，因为当它

---

① 利迪策在捷克。——译注

② 美莱在越南。——译注

们从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传播时，都能够超越对种族、语言、故土和传统的狭隘的忠诚。但当这些伟大的宗教发生正面冲突时，每一个强调人类皆兄弟的宗教最后都诉诸了流血手段；在本宗教中间也常常是这样。每一个宣称人类皆兄弟的集团都为他们“兄弟”的死而祈祷，并向将要杀死这些兄弟的武器表示祝福；从中世纪交战双方的基督徒的祈祷者到二次大战末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情况莫不如此。在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对“皆兄弟”的强调是不充分的。那么，对故土、社团和国家的忠诚怎么能够扩大到把危及人类的种族也包括在内的地步呢？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既需要经济和技术条件，也需要一个新的理想。我们长期形成的愿望有两个分枝，有两个极，当代的预言家不是为这一边辩护就是为那一边辩护，其实，我们两者都需要。

只要人类的安全要依靠大地和海洋，保卫边疆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块土地不能建两幢房子，一个地点不能栽两棵树，一段狭窄的海岸不能同时向海里修两道防波堤，只能容一条船的码头不能同时容两条船避难。尽管我们能成功地把几百万人团结在一个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能与其他的公民有认同感，虽然未曾谋面，意见常常相左，但公民的身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然而，不管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如何处理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中的人们对陆地和海洋资源的竞争呢？要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却要在这个某些地区的战争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的世界里居住，我们是否就不得不让大量的“小”战争出现以饿死或杀死几百万人口，使城市、森林和牧场变为荒地呢？保卫战的美德被弄得一团糟，常常会引起贪婪的侵略战争。难道我们要对这个超级大国全副武装、但冲突双方都在寻求“和平”的世界承担义务吗？

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中出现了。一方面，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在一个互相沟通的全球共同体中保护生命，就需要某种全球的秩序；另一方面，错位的爱国主义却带来了恶劣的现象，爱国者对任何类型的国际主义都表示反对，认为是诋毁或否定他们的爱国主义。

现在，有两个突出的技术方面的机会：一个是能源资源的状况和保护环境的需要使经济的地区化变得必要了；另一个是战争和通讯从大地和海洋向空间的转移。这两个机会使我们有可能解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为难的状况。转移的规模——从巨大的无人管理工厂的产品需绕过半个地球才能到用户手中的状况转变为在使用地点附近生产的地方化生产——会使互相依赖的人类的亲密感增加：人们又住在一个社区中了，又紧密地工作在一起，住在一起了。这样，人们便可以使那种能够从家庭扩展到社团，继而到国家的联系发展壮大起来。空间的极端重要性意味着在反对污染、袭击和宣传方面已无疆界可保卫。它进一步意味着只献身于自己国家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希望转化为对整个星球的保护，这对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儿童有足够的关心，愿意看到他们呼吸纯净的空气；对我们的土壤有足够的关心，不愿看到它被冲进大海；对我们的湖泊、河流和近海水域有足够的关心，愿意保护它们不受污染，使水中的生物免遭死亡；那么，我们也得去保护邻人的孩子。这样，爱国的献身精神与对这个星球的关心将把我们的保卫活动转向国内，不再针对那些曾一度警惕地保卫着边疆的人。只有每一个国家都克制自己，不把可能破坏我们的臭氧层的物质送入空间；只有每一个国家都克制自己，不搞会使气候恶化的事；只有一切国家都禁止向空气中排放辐射性物质，这个星球才能保住。这样，也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从一小群男人保护他们的女人和



## 第九章

### 确保多样性

有的问题远比眼前的危险——如核战争，核扩散，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生活质量的退化——要深刻得多。这些公害是很严重的。防止文明(如果不说是生活本身的话)的毁灭是迫在眉睫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虽然生存对于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经验是绝对必要的，但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生存问题上，热衷于把生存的可能说得越来越少，都会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模糊我们的视线，因为这会使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降低自己的人格。对于这个说法：“人不能仅靠面包生活”，还应该再补充一句：“人不能仅靠生命而生活”。这是一些伟大的宗教一直鼓吹的信条，但这句话在每一个宗教中都受到了其本身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技术条件，它们会给人类带来新的首创精神。但是，如果没有新的理想，就不会发现这种新的首创精神。伟大的宗教曾使用过让一个群体中的人都“亲如兄弟姊妹”的历史性比喻，即对亲族的忠诚。但这种比喻是不够的。正如我的女儿凯瑟琳·巴特森(Catherine Bateson)指出的，一个种群亲如兄弟姊妹的形象化比喻虽然数千年来推动了伟大的宗教信仰向前发展，但它实际上是狭隘的，它忽视了另一个种群，即与自己的种群有通婚关系的那些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同样不能置身其外。

人类古老的理想是：自己家的火，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国家，以及如何让年轻人听从老年人的决定。但是，现在却有更多的凶险的决定要我们来做了。

除非我们能发展一种新的理想，即我们每个人和人类的每一部分——不管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年龄组，不管是一个宗教集团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能够做到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竞争，否则我们就得冒毁灭生命的新风险。现在，我们正在人为地加大这个风险——利用神的名义，制造钚（对此我们尚没有保护性的措施），制造非生物递降分解的化学品，计划把我们在长期生物遗传中所依靠的那种物质改变成未知的、可能是致命的形式。运用权力，追求权力，为权力下定义，这一切都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但这句话却被滥用了。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下：“责任感导致崇高，绝对的责任感导致绝对的崇高。”随着自然科学使男人获得了新的权力——我在这里用“男人”这个词很明智，因为妇女在科学发展中迄今只扮演着极不起眼的角色——我们便面临着这样的决定：是不顾后果地追求赤裸裸的权力，还是作为未来的守护人而运用这些权力？

人类长期以来的斗争都与宇宙有关，他们诉诸于超宇宙力量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设想宇宙中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只要人类尊重这个秩序，就能够安全地生活；他们向神祈求，给神供奉牺牲，寻求神的欢心和祝福，企图逃避天谴；他们发明了神秘的咒语，相信这些咒语能迫使自然界遵从自己的意愿，能诱惑别人的妻子，能使植物生长或枯萎，能祈求雨水或阳光。魔术有时被视为科学的先驱，以至于有的科学家的行为就象术士，这种科学对人类的福祉是有害的。科学一旦变成威力无边的魔法，既不

尊敬生活又不尊敬自然界，这样的科学就是人对上帝的嘲弄。这种嘲弄无疑和乡村术士对一片树叶念下咒语，企图使邻人的甘薯飞进自己的菜园，或迫使邻人的妻子离开丈夫是一样的。

人类可以成为神力支持的寻求者，也可以成为宇宙秩序的尊重者，或成为神秘力量的卑微的被支配者——这三种宗教态度的差别完全取决于实践者的态度。这三种态度常常同时出现在同一种文化里；同一个实践者此时采取这种态度，彼时又采取另一种态度，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追求。行使魔法倾向于在私下进行，秘密进行，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目的。

同样，在科学工作中，有的科学家敬畏和尊重自然界，不愿意当万能者或侵入者；但有的科学家却希望取代宇宙的顺序——这种顺序表现在生物圈的微妙的平衡——企图用人工的控制方法决定整个人类现象的命运；在这些人工控制方法中，他们实际上变成了神。这里面就包含着危险。政治家们对他们施政纲领以外的东西不承担义务，而某些现在已具有毁灭世界的知识的科学家却支持和教唆他们；人们不禁要问：人类有什么力量能与之抗衡呢？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而斗争。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以一个声音讲话，这样，每一个不全面的方法便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了。简而言之，任何完整的系统——如一个有机体，一个岛屿的生态系统，我们的星球，太阳系——都受其本身的不平衡的支配。几千年来，人类以分散的小群体居住在地球上，每一个群体都在为生存而奋斗，在每一群体与其邻居和自然界的平衡或不平衡中都有过失败或成功。干旱和水灾威胁着各个群体的食物供应；地震、飓风和火山爆发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幸存下来的人能够经过调整以改变条件，控制人口的增长，改变他们所依赖的食物种类，向新邻居学习。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这些早期社会的完整纪录，但我们对依靠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民族却十分了解。他们是依靠同样低下的技术而生活的，有着类似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里，对病弱者，个人之间的和解，由于环境不同而收缩或扩张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社会的幸存与任何物种的幸存一样，取决于它们对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反应。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在文化上已程式化的方法为整体的生存作出贡献。

随着文明的发展，群体成员间的平衡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遭到了破坏。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奴役。整个地区由于对森林和土壤的索取而变得一片荒凉。由于人以更大的密度集中在一起，他们更容易遭到瘟疫的袭击，更屈从于内部的政治动乱，一个派别和另一个派别争斗，以便夺取或保住权力。慢慢地，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频繁的变化。火被用来狩猎和开辟田地，矿石被开采出来，森林被采伐后造成了水土流失和港口的淤塞，野兽和植物得到驯化和照料，新的物种得到了发展，它们比其野生的祖先更特化，更脆弱。

在我们学会更象人——也就是说知识和技巧使人的特点变得更崇高——的数千年中，无数人类的群体消失了，他们所依赖的食物和他们所猎取的动物也象他们一样灭绝了。但整个进化过程在继续，任何一部分的失败都不会威胁到整体。

在美洲人中，数千年来纪录的保存、建筑学、农业和星相学都是并行发展的，但控制过多人口的技术却是独立于旧大陆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若不威胁对方，则任何一方都可能被消灭，新、旧大陆上的那些帝国的兴亡亦复如此。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一个全新的、无法预测的局面。同样一系列的事件，使我们有可能发明核力量，探索整个世界，

建立了世界范围的共同体，探索了外层空间，但也造成了代沟，相去甚远的经历把年轻人和老人分开了。从城市化到随后城市化的衰落的过程非但没有使人们形成各自独立的小群体——就象已经崩溃的克里特人或玛雅人的城市那样，建造这些城市人的后代又变成了质朴的农民，无视其先祖的那些文字纪录——反而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社会；这种社会就象所有互相联系的系统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任何地方劫持了一架飞机都会在每个大陆引起反响。一次世界航线的飞行员的全体罢工，会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最大的城市和最小的村庄都会陷入混乱；其结果就象牛痘疫苗没有送到，瘟疫失去了控制，合同未被履行，革命失败或另一场革命成功那样严重。

在这个新的、互相联系的全球系统中，我们的任务是使它更经得起动乱的冲击，既要使它承受得了突然事件，也要注意不去干涉它，因为我们的干涉只能使它变得更单一化，从而更容易受到伤害。

二次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的特点就是单调划一的大流行。几百英亩的土地种的都是一类庄稼，播撒着同样经过人工工程处理的种子，依靠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肉用禽畜采用工业化喂养，在巨大的电子围栏中一旦出现一次失败，便会影响几百万人的生活。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生物学家在生态学方面的发现，我们就会明白，多样化是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对多样化的任何削弱都是危险的。现在，对遗传工程感兴趣的实验者们大谈需要制造多样化，生态学家则利用种子银行和动物园来寻求保存各种各样的、正在消失的野生形式的基因。人类学家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要求用录音、电影和录像来保存音乐与艺术，说话与动作的

各种形式——这些都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现在只存在于那些学过它们的人的脑子里和肌肉中。生活方式一旦变化，所有这些传统形式将永远消失，而那些本应该继承这些传统的人和全世界将变得更贫乏。

但我们还需要某种比多样性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遏制那些任性的、混乱的实验的超验价值，用这种价值来引导实验，不使它夭亡。这种超验价值能使人情愿去攀登绝顶，乘坐第一艘飞船去月球，探索最小的细胞和更远的宇宙空间。禁止这样的探索无异于切断了人类的根，这条根使我们创造出了使我们赖以自豪的各种文明。我们不需要压制科学家和探索者的方法，而是需要能使他们的追求变得崇高的方法。他们的追求应当具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并非只有科学家才须具有，地球上的每一个公民也必须具有这种责任感。

科学的嫩芽造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单调的现代文化，然而，也正是这棵科学的嫩芽刺激了全世界人们参与的要求。这种参与的要求得益于单调划一的技术，但通过这一要求我们实际上可以找到保持多样性的新路；这真令人着迷，各种系统毕竟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前进的。凡是在一个文化中、一个宗教中或一个意识形态中，在一个阶级中，一种性别或年龄组中，控制权在政治家、科学家和教士的手中变得过于特殊化，都会可悲地危及整体的安全。凡是在老年人用鲜花送年轻人参战的地方，凡是在制定法律禁止妇女使用避孕药的地方，凡是在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奖，用大肠杆菌搞基因试验从而危及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的地方，年轻人应该强迫那些鼓励杀人的老人退休，强迫剥削雇员的雇主退休，或强迫敲诈胆小的公务员的少数人退休。事实上，任何一个排他的群体为了一己之利而掌握了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人身



上长了癌瘤一样。生存的平衡不仅要求那些暂时掌了部分权力的人的参与，而且也要求系统各部分的所有人的参与。我们不能根据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有时也叫作“市场的结果”)来建设一个维持生存的政治体制——这些利益集团中的交易都是在寻求特权、权力和国家的赫赫声望。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新阶段中，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产生了分裂，男人与女人之间产生了分裂，即使在最小的、最偏僻的人类群体中也产生了政治认识的分裂。这些新群体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那样利耳而又不负责任。老年人，旧的性别关系、某些种族或民族过去都是很专横的，然而，新群体的呼喊也同样专横。爱斯基摩人要求得到用新式武器捕杀鲸鱼的权利；虽然他们以鲸鱼为食物，但这样做很快就会毁掉所有的鲸鱼。发展中国家的出类拔萃者愉快地欢迎一种有污染的工业。进财容易的承包人宣称色情文学是言论自由——乍一看起来，这是一幅不妙的图景。

在这种要求参与的最初几个阶段，人们强调自己的愤懑不平，其中还掺杂着几分物欲。那些刚刚发现以前的措施全然是压迫的人，充满了怒火与渴望。然而，在这一切的深处，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正在成长。根据这个新的道德伦理，世界每一地区的人，无论东西南北，都要求彼此负责任。

世界人民不仅要求在物质利益和自由方面进行参与，而且要求有参与决定的尊严，以决定个人、亲属、邻居、子孙和继承人的生活。随着参与的要求，也不可避免地使每个人都能对整体作出贡献。要求得到各级政治组织重视的妇女也能为决定食品问题作出贡献(就象她们维持家计那样)；现在，食品在男人的手中，他们缺乏一种保护人、体贴人的素质，而在这方面女人却有着传

统的责任。每个群体的参与——男人、女人、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非洲人、亚洲人、高加索人——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碰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碰面，受害者与从前的压迫者碰面，被推出办公室的人与其继任者的碰面。根据这一要求，人们就会走到一起，共同磋商，互相认识，获得体面的对待，迄今尚被排除在文明的、有等级之差的世界的各种委员会之外的分散群体将会对做出的决策作某些贡献。如果接受每一个群体的独特性，那它们必将互相补充。倘若我们能够获得多样性，那么人类集体行为的完整性——如每一年龄组的、男女两性的和有数百年历史的不同文化的代表的——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一致性的寻求，对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有学问的人与无学问的人之间的以及由智力测试而被分成不同等级的学生之间的不同行为风格的寻求，都将在不同规模的获取或成就方面产生不可避免的竞争。但这些寻求正在被统一起来。这样，每一个参与群体都有内在的多样性，它们将把不同的理想，不同的经验带到世界的各种决策中心。

于是，每一个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对人权的要求，对过去的错误补偿的要求，对纠正以前的错误的要求，对重视年轻人的新奇或老年人的智慧的要求，就都会得到毫无保留的许诺。在为我们这个受到威胁而又互相联系的世界争取安全的最初几个阶段中，这些许诺很难做到明确、具体——但每一个许诺都有助于在这个新的整体中创造平衡。这些贡献可以变得有条理，把一个既有多国合作，又有为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而牺牲全体的武装政权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全球的共同体现在是由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居民组成的，它的完整性与安全靠的就是全体居民。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个人的行动无视全体的需要时，都会危及这个整体。地球好象成了一个由各种形状奇怪的镶嵌板拼成

的球，把它们拼在一起，这个球便能拿得起来；撤掉一块就可能使这个球散开。明乎此理，便能使我们获得力量去使每一块嵌片都各正其位，但这只能是大家全都明乎此理后才办得到的事。当代对参与权的要求甚至能够使残疾人也为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因为盲人尚有敏锐的听觉，聋者亦有超卓的视力。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迄今尚排除在外的人——不管是一个截瘫的人，还是一名妇女；不管是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还是一个来自伊图里<sup>①</sup>森林的俾格米人；不管是一个来自亚马逊丛林的巫师，还是一个来自努比亚沙漠的跳舞者——都团结进这个人类的共同体，我们就会变得更丰富，联系更密切，更富于多样性，我们也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倘若我们知道如何珍视和培育这种迫在眉睫的参与感，直到使它成为人类发展的保证，那么，我们就能遏制那种剥削性的工艺技术和权力的追求、利润的追求、声望的追求——这些东西会产生各种威胁整个星球的、不易控制的反应。为一个群体而牺牲另一个群体将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二次大战期间人类学的伟大发现之一是：我们总得不停地说，不停地写，仿佛每个人都在听似的。现在的要求则是，让每一个人都听，同时也要听每一个人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充满危险的，但有潜在自愈力的世界的希望。

---

① 伊图里在扎伊尔。——译注

## 译 后 记

本书的原名是《文化与义务——论七十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中译本的译名并非译者所撰，而是现在人们对它的流行叫法。由此可见本书还是颇有“知名度”的，仅这一点就说明它值得一译，更何况“代沟”问题是一个大家议论颇多的问题。国内尚未见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那就让我们先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讲的，也许不无裨益——米德博士的笔杆子还是很硬的。

在本书结束时，谨向老友李盛平同志及杨玉生同志致谢，他们给了译者很大的帮助。

曾 胡

1987年8月10日于酷暑中